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E-BOOK**  
内参资料 非卖品

## 前言

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之托，我选编了这本《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本书共收录论文 15 篇，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对邓小平关于当代中国外交的战略思考及实践进行了探讨。其中大多数文章是作者们的最新研究成果。本书的选编和统稿工作由宫力负责。对于入选论文，力求保持原貌，在此基础上，对一些标题和文字作了必要的修改。

本书在选编和定稿过程中，得到每个作者的大力支持；在出版过程中，得到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鼎力相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宫力

1996 年 6 月 10 日于哈尔滨

## 总序

姜长斌 张文达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成就、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风云中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是激发我们写作《当代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丛书》的原动力。而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的出版，中国近几年的外交实践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更是我们编写工作的“加速器”。

令中国人民感到鼓舞的是，中国正在稳步地、不可逆转地步入世界强国之林。这种新形势，相应地要求大力提高国人的外交意识和国际意识水平。

世界科技革命浪潮的持续发展，高新信息手段的飞速进步，正在日新月异改变着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各种联系，地球确实是“变小”了。国际政治和外交舞台上的联合与分裂、纠纷与妥协、胁迫与对话的现象呈现出空前频仍的局面，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正在层出不穷的利益较量中加速推进。每个国家、每个地区似乎都在寻求各自的新位置、新发展、新方向。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时，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对此，我们的理解是：第一，中国要发展，首先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周边环境；第二，中国要发展，就必须更积极地、更高效地吸取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第三，中国要发展，还必须让世界更多地、更切实地了解中国，了解社会主义中国是真心诚意地希望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了解中国坚决反对国际上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目的，只是为了求得世界的安宁、公正与进步。

我们痛感到，在上述三个方面不论是国人还是世人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本质，特别是对中国新时期的外交方针和实践，都还了解得十分不够。反过来，中国对世界的了解也亟待加强。

我们编写的本丛书的出发点可以用邓小平的三句话加以概括：（一）“我是一个中国人”；（二）“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三）“我是实事求是派”。我们正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看待世界、研究世界的。具体他说，我们是站在邓小平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立场上研究“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全方位开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建立国际政治与经济新秩序等一系列原则问题的。

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着使中国的研究工作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历史重任。我们既反对妄自尊大，也反对妄自菲薄。我们有能力、有水平同国际学术界进行平等自由的交流，我们不但能够坚持自己的立场和原则，我们还乐于博采众人之长，丰富自己的知识宝库。

我们这套丛书追求的目标，是向国人宣传、普及中国人的外交思想，使理论原则尽快转化为国人普遍的行为指导准则，使国人获得对世界的更确切、更系统的了解。我们同时追求的另外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能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昭示国外学界，消除他们当中某些人对当代中国的误解与偏见，破除国际上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散布的“中国威胁论”的荒谬论调。

这套丛书的内容重点，完全放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外关系和对各国国际战略研究上面。我们也交代了一些历史背景，但那只是为了服务于“当代”这个主题。

我们这套丛书的读者对象是具有高等文化水平的干部、学生、涉外人员

以及一切对国际问题感兴趣的国人；同时，我们也预期同国外人士开展更多的交流。

我们真诚期待着专家、学者的批评与指导。

1996年11月

## 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 论邓小平的外交 战略理论及运作

姜长斌

《邓小平文选》第3卷所收全部119篇文章中，有97篇谈到了中外关系和国际问题，73篇是同国际或境外人士的谈话，其余是国际问题专论。这些著述说明：第一，当代中国的国际战略理论和外交政策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不可分割的极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二，邓小平提出的关于时代主题的概括和一系列新的国际关系准则，不是只对某些国家适用，而对另一些国家不适用。因为它们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思想界对时代进程、世界格局的变化、世界政治经济矛盾的发展，进行精辟分析的结果，是覆盖“东西南北”的科学结论；第三，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路线已经奠定了牢靠的理论基础，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地研究它，在实践中运用它，发展它。

在我看来，邓小平的外交战略理论与运作可以概括为：以“和平与发展”为旗帜；以全方位改革开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霸反强权为支点的一系列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准则；其运作则是以中央决策层为核心，以智囊库和涉外执行机构为支撑，并有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实现机制。

## 一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中国国际战略的根本原则

“和平与发展”，既是当代世界形势的主流，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际和时代特征，又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客观实际的科学认识的结果，是主观认识能力的集中反映。

这里，还特别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全新认识。

1920—1921年苏俄进军华沙失败和里加条约的签定，标志着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对世界格局和时代特征开始了新的探索。但1924年斯大林发表的《论列宁主义基础》，把时代特征重又概括为“一条世界革命战线，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战线”，即通常所说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这个概括一直被苏共承袭至80年代中期。它的核心是立足于打世界大战和暴力输出革命，并且统帅着苏联的一切内外政策。它僵化成教条主义以后的致命弱点是，完全背离社会主义的本质，严重落后于世界变化了的实际。因此，二战以后，这条路线迅速蜕变成了大国霸权主义和“意识形态至上”的双色硬壳。

直至60年代末，中国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受过这条路线的影响。但从70年代初开始，中国逐步制订了“三个世界”理论和路线。作为国际战略，它突出的是中国的安全利益，甩掉了意识形态至上的包袱。到了80年代初，中国工作重心的彻底转移，促使我们重新认识世界，认识社会主义，并制订相适应的国际战略。我们发现：（一）世界大战，特别是核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二）中苏对立的程度也不如原先估计得那么严重，关系是可以改善的；（三）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强劲的崛起势头，但它们的绝大多数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它们仍陷于发展危机而不能自拔；（四）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与主要任务的全新认识，使我们得出了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当代社会主义中国正处于极其难得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历史

关键时期。

这一系列的新思路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里得到了反复的论述。1985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正式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一国际战略思想。

和平，是相对战争而言的，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危及中国和平建设的大战、世界大战、核战争打不起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入的。一开始，只是提“不是不可避免”，后来提“十年打不起来”、“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再后来提“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希望至少有七十年的和平时间”。当然，大战打不起来，不是消极的、静止的，讲的只是可能和机遇，起决定作用的，是要看绝大多数国家是否真正执行和平的国际战略。二是，就世界范围而言，绵延不断的局部战争和热点冲突仍未解决，仍在给人类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意料不到的悲剧和灾难。这个争取全面和平的问题更为复杂，人类社会必须在长时期内用全新的思路和手段才能解决。

发展，是既同和平相联系，又比和平更艰巨的大问题。人类社会需要和平作保证，作为基本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尽可能快地缩小广大落后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否则前途不堪设想，世界将不会有什么安宁可言。和平是为了发展，只有发展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世界和平。

上述两大问题，被邓小平概括为覆盖世界“东西南北”关系的要害，也被我国领导人反复申明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

中国提出的这一思想，迅速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领导人所接受。特别是在世界两霸之一——苏联衰落解体之后，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和各国领导人都在谈论和平与发展问题。但是，由于各国的利益千差万别，因而动机与目的也不大相同，有时甚至南辕北辙。

无庸讳言，中国所提和平与发展，首先是出自中国自身的利益要求。与此同时，它也在不同程度上符合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的利益要求，即符合当代世界的主要潮流，但是，中国同各类国家存在的诸多利益差距，要求我们在和平与发展的旗帜下，制订出自己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战略。

## 二 中国国际战略的两大支点

### （一）反霸反强权与和平促进多极化进程

两霸对峙格局瓦解以后，世界和中国面对的，首先是多极化问题。怎么看待这个多极化？这里至少有四大因素必须考虑在内：（一）与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格局及雅尔塔格局的定型截然不同，这次两霸对峙是在和平环境中瓦解的，霸权主义虽然还存在，但是美国一家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不可能真正地独霸世界。这就决定了世界必然向多极化发展，而且从总体上说，多极化的定型也只能在和平环境中完成。（二）多极化的具体含义，是指世界利益合理的多极分配，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要建立一种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可以断言，新秩序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必然是长时期的充满曲折与竞争的世界进程。（三）旧格局的得胜霸主——美国，既是这一进程的最大障碍，又是这一进程的最活跃的客观动力。因为，

美国的主观愿望是独霸世界，即它的领导人和精英们公开申明的要“领导世界”。现在世界上不论什么事情，它都要插上一手。可是，它的能力是有限的，管不了那么多，因此它在插手各种矛盾和纠纷时就必然采用压一方、捧一方或控制一方、放纵一方的策略。在客观上，它这是在不断地培植异己力量，而异己力量的崛起同美国的主观愿望适得其反，当然也就有助于多极化进程。（四）中国是多极化的一极，这已没有疑问，但它在多极化格局中的位置和分量还要看它自身的发展情况而定，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用动态的观点看待这一问题，万万大意不得。

总之，中国的最大利益在于，既不使多极化进程变成无序化混乱，让不论什么形式的霸权主义乱中取胜，危害中国的发展与建设；更不可以使中国在这一进程中最终落得无足轻重，中国必须取得同其幅员、资源及其发展宗旨相称的一极位置与分量。我们时刻要注意研究的是：

#### 1. 全方位开放、主权安全第一与建立国际新秩序

这是矛盾的辩证统一。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的最沉痛的教训之一，就是闭关锁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长足进步的最成功的经验，就是果断地实行全方位开放。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

但是我们必须切记，当代中国的全方位开放战略，完全不同于从上个世纪末由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倡议，后被西方列强接受并推行的“中国门户开放政策”或“门户开放主义”。当时，中国积弱累贫，早已是列强瓜分宰割的对象、毫无主权和领土完整权利可言。美国主张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既可充分代表列强中的后起者——美国的扩张利益和价值观，又可充分利用列强在中国你争我夺的矛盾。正如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一语道破的那样，“谁以资本供给全世界，谁就应当……管理世界”。美国的对外和对华战略后来虽然历经变化，但海约翰和威尔逊等人的这套理论至今仍留有明显的痕迹，并在世界范围内拥有相当的影响。

饱尝丧权辱国和闭关锁国两方面之苦的社会主义中国人民，今天在实行全方位开放的内外战略时，牢牢地把握着主动权，非常清醒地、坚决地主张，“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一切其他国家和集团在处理同当代中国的关系时，首先必须理解中国维护主权和安全的民族感情，并同样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今天和以后的全方位开放，贯穿着一根实实在在的主轴，即国家的主权与安全。这根主轴的完整表述，就是中国一向主张并被国际社会越来越乐于接受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世界上一切国家，不分它们大小强弱、发达与否，都会带来长远、的根本利益。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之日，就是国际政治新秩序建成之时。这是其一。

其二，中国的全方位开放战略是要在有限的时期内，首先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论从法规上还是从实际运作上同世界经济接轨，中国经济最终融人的肯定不是已有或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是一种新秩序；因此，中国经济的全方位开放战略是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同步”进行的，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在这一进程中是有自己的“序列表”，即轻重缓急的。我把它称之为“一圈一列一片一点”：

一圈，是指中国的周边国家。中国真心实意地希望同它们永远保持和睦相处的关系，这是中国自身执着追求长期和平发展的目标所决定的。

一列，是指世界上一系列愿意在资金和技术方面同中国交往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投资和先进技术，事实已经证明，中国不是这种交往的单方面受益者，资金和技术输出国同样也是受益者。

一片，是指渴望从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中获益的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处理世界事务时，中国同它们最容易达成共识，最容易用共同的语言说话，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人类的福祉来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同这一大片的关系将会越来越重要。

一点，是指冷战后影响最大的国家——美国。在目前和今后的一段历史时期，挟有雄厚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实力的美国，不仅对整个世界的变化最敏感，反应最强烈，而且对社会主义中国不可避免地会采取特殊战略。这就迫使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制订自己对美国的特殊战略。

## 2. “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

这是中国国策非常形象的概括。中国最大的愿望，就是一心一意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最怕的就是这项事业受到干扰。但是，怕有什么用？！中国整个近现代史都告诉我们：怕，只能把事情搞糟。中国谁也不怕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它从事的事业，不论对谁都不会带来损害，中国发展了，不论对谁都会带来好处。这是第一句话的含义。第二句话是说，中国梦寐以求的是尽快发展自己，这种发展不能靠别人的施舍或恩赐。在当代，没有什么“无私的援助”。但是，中国的发展却必须依靠公平合理的互利合作。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这种互利合作是万万不可或缺的。同谁互利合作都成，只要不损害他人，——这就是“谁也不得罪”的由来，是中国的国际战略无损于他人的真实表露。

如果有人认为“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只是一条消极的、无所作为的外交战略，那就大错特错了。两句话合在一起的中心意思是：为了中国的和平发展，我们的国际战略必须时时处处“趋利避害”。

## (二)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按“一国两制”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 1953 年底由中国首先提出的，至今已有 40 多年的历史了。要着重指出的是，这五项原则不仅得到了国际上广泛的承认和使用，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了如下巨大的发展：

### 1. 搁置争议，寻求共同利益

五项原则提出时，还只是中国同个别邻国就个别问题达成的共识，后来被许多国际性文件所承认。80 年代中期以后，冷战格局行将瓦解和瓦解以后，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与主权争端陡增。如果沿用老办法，动辄使用武力解决这些争端，那么局部战争就会“遍地开花”，世界不但不会安宁，而它面临的主要任务——发展经济、缩小南北差距就更无从谈起了。在那种情况下，中国自身的发展也必然会受到严重的干扰与破坏。为了稳定世界局势，中国首先提出了搁置争议，寻求共同利益的解决争端的新办法。

中国在运用这一新办法处理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经过努力，同周边国家达成的空前和平局面，保证了中国能够把最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国内经济建设上。而对于那些现实的和潜在的争端，中国保持着最大的克制和耐心，有些问题可能要留给后代人去寻求实际解决的

办法。

中国的这一和平外交战略不仅适用于周边国家“一圈”，而且普遍适用于前面所说的“一圈一列一片一点”。

## 2. 一个世界，多种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后，遗留有对港、澳、台的主权与领土完整问题。邓小平是提出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这个问题首倡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中，不是只就中国的内政孤立地谈“一国两制”，他总是把“一国两制”的思路同解决国际问题的通用原则联系在一起。

因此可以说，“一国两制”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最新发展。“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必然延伸，就是“一个世界，多种制度”。这同美国及其他某些人推行的世界必须照搬一个模式，是鲜明对立的。我们的原则是充分尊重各国人民的意志，另一个原则却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历史将会验证这两个对立的原则哪个更有生命力。我们坚信的是“一个世界，多种制度”。

## 三一国的国际战略操作是 一门“艺术”

国际战略理论，不是用于自我标榜的宣传品。它既是一个国家长时期里对外关系的基本行为准则，又是这个国家在国际生活中所起作用的形象标志。它应该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这个可操作性，在当代，只能由一整套分工合理、灵活机敏的机制加以保证。

### （一）必须广泛宣传中国国际战略理论的各项原则

当代中国的国际战略理论和思想来自何处？毫无疑问，来自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不论对内还是对外，我们都应大力宣传这一划时代的、全新的理论和思想。但是，不能不遗憾地说，现在我们连对国内宣传做得都很不够，我们有一些阐述或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文章或辅导教材，很少甚至根本不提邓小平的国际和外交战略思想，似乎这不是邓小平理论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然，在国际上最有力的宣传莫过于中国的外交行为，但是舆论工具也不可缺少。动用舆论工具必须结合实例，有很强的针对性。例如，关于中国领土台湾、西藏等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人权问题、“中国威胁论”问题，通常都是美国的一些人挑起事端，中国进行自卫。对于参与这些事端的人和必须区别对待，有些是诚心同中国作对，有些是跟着跑，有些是不明真相，受骗上当。我们动用舆论进行自卫也必须有理、有力、有节。这一条可以说普遍适用。即使对于那些诚心挑起事端的人或国家，也要讲策略。如果事情涉及中国重大或较重大的合理利益，那就只能针锋相对，分毫不让，但只要事情无伤于中国的筋骨，就让他们叫去好了。这不是软弱，而是表明，他们介入中国内政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只要我们把国内的事情办好，我们的对外宣传就会是强有力的。

### （二）理论必须变成行为指导原则

理论只有成为行为准则才有意义。

我认为，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战略布局和目标产生、形成、发展和实现，都离不开对动态发展的世界格局、国际形势的科学分析以及中国的全面应变能力的增长这两个根本条件。为了使两者相互适应，就必须使当代中国的国际战略和策略，深入人心，在各个涉外领域里成为普遍的指导原则。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们必须具有这个“国际”或“世界”意识，并且不断地提高这个意识水平和应变能力，外交工作极其重要。但是认为国际战略的运作仅仅限于外交机构或涉外人员，那还是很不够的。因为，在全方位改革开放的现代中国，同国外打交道的不可能只局限于职业涉外人员。各级地方领导人、企业家、学者直至普通居民，都有大量机会同国外人士交往。多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没有全民素质水平的提高，正确的决策以及职业涉外人员的努力成果，完全可能被冲销或大大减色。

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应该是现代中国价值观的一部分。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既融入世界，又不被世界“吞没”。

1995—1996年处理由李登辉访美所引发的中美关系的严重波折，就是中国外交贯彻邓小平战略思想的成功范例。毫无疑问，中国今后还会照此模式行事下去。这一事例充分体现了当代的中国实行的是“和平社会主义”国际战略，但是这个“和平”不是一味退让妥协，一旦事情涉及国家安全和主权领土完整问题，中国是坚持原则的。我们衷心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祖国统一问题，但绝不会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 （三）强化智囊库作用，完善运作机制

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国际战略运作机制的突出薄弱环节是智囊库网络和系列不健全，不发达，特别是高级智囊库问题更为突出。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1.底子薄。在闭关锁国时期，对智囊库没有那么强烈的需求。2.而现在，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程序还处于形成之中。3.研究人员流失现象严重。但是只要我们重视，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一提强化智囊库作用，就可能被误解为要另起炉灶，扩充人员编制，重建一个庞大“臃肿”的机构或网络。不是的。这主要指的是外交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建设问题，是个机制转换、体制改革问题，是要求调整并加强各研究机构（基本理论和对策研究）对中央的服务功能。要服务得好，就必须人员精干，覆盖问题面广，反应灵活。最根本的是要进行系统研究，随时反应，并且应提倡“针对一个问题提出多种对应方案”，供中央决策层选择最有利、最合适的方案。

中国的研究人员（除中央职能部门之外）基本上还处于“自由选题”状态，形不成高水平的、足够与发达国家抗争的有力机制。

## 四结束语

“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这是当代中国内外战略的至理名言。专心致志地搞自

己的社会主义建设，充分显示这个制度的优越性，是中国最高最大的利益所在；别国的制度，别人的事情，我们确实管不了。

但是，这个“管不了”，归根到底是最合乎情理、最积极地“管”，正如邓小平说的，中国现在的事业“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然，不是把它搬给别国”。

中国的利益，中国对人类的贡献，就在于此。

（作者姜长斌：中央党校教授、国际政治学博士生导师）

## 八十年代中国调整 对外方针的由来

宫力

在 70 年代的时候，美国由于在侵越战争中失利进行战略收缩，而当时处在军事实力增强阶段的苏联则急剧地开始了它的全球扩张，在这种国际局势下，中国政府从反对霸权主义和捍卫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毅然决然地调整外交政策，实行了“一条线”（用毛泽东的话说，是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欧洲）的联美抗苏的国际战略，组成了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不仅有效地维护了自身的国家安全，而且有力地遏制了苏联的全球扩张势头。事实证明，中国当时所采取的这种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措施，是符合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和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的，也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

而进入 80 年代之后，国际局势逐渐发生了变化。美国由于摆脱了越战的包袱，实力有所增强，特别是里根政府上台之后，提出了“重振国威”的口号，增加军费开支，实行强硬的对苏政策，志在从苏联手夺回世界霸主的地位，为此不惜在地区“热点”搞“低热度战争”，从而加剧了国际间的紧张局势。而苏联由于陷入阿富汗泥潭，四处伸手，又力不从心，逐渐失去了战略优势，形成了美苏对峙、互有攻守的局面，美国在某些方面甚至重新占了上风。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府产生错觉，认为中国的战略地位下降，有求于美国，因此中国可以吞下某些损害中国利益的苦果。特别是 1981 年美国共和党新总统里根上台前后，说了不少有可能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并且在对台关系上，特别是对台销售武器方面显然比卡特走得更远一些。这一切不能不引起中国方面去重新审视和评判对方，并且对双方关系的战略价值进行一番新的估价。

中国政府对于发展中美关系是有诚意的。除了抗衡霸权主义扩张的需要之外，中国正在进行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事业，也需要同美国建立更多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应该说，中国领导人是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中美关系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涉及到中国主权的台湾问题上，中国会因此作出无原则的让步。在美国一再出现违反中美建交原则的言论和行为的情况下，中国方面觉得有必要更加清楚地表明中国政府关于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1981 年 1 月 4 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文斯和共和党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陈香梅时，从世界格局的战略高度，有针对性的就中美关系发表了重要谈话。

邓小平直率地指出：就中国方面来说，我们希望中美关系继续发展。坦率地说，里根先生在竞选纲领中说的有些话确实使我们有所不安。邓小平说，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报刊和一些人的言论大概有这么四种观点，这些观点如果不加澄清，很可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是无足轻重的，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邓小平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对世界力量对比的判断问题。邓小平说，至于说我们穷呀弱呀，我们历来不回避，我们向来这样讲。中国有它的长处，就是地方大、人多，但确实是

穷，装备也确实落后。可是我们对自己也有一个清醒的估计，我们有“块头大”这个好处，还有就是不信邪。邓小平说，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敢于正视现实，用弱小的力量去面对强大的力量。前年我们教训了一下越南。当时人们判断中国惹不起苏联。这件事情是有风险的，有风险中国独立承担。结果我们还是做了。据此，邓小平认为，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

第二种观点，说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美国报刊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种议论。邓小平指出，中国是很穷，但有一个长处，就是中国本身的生存能力比较强，还有就是穷日子过惯了。邓小平说：“最典型的是我们的延安时期，吃饭穿衣都困难。包括那时我们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我们都能够生存。现在如果一切国际通道都切断了，我们也能够生存。即使现在世界发生大的动乱和各种难测的变化，中国自己也能够活下去。”因此邓小平警告美国，以为中国有求于人的判断，会产生错误的决策。

第三种观点，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吞下去。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吞不下去，不会吞下去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去。中国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我们说中美关系停滞不好，倒退更不好，但是一旦发生某种事情迫使我们的关系倒退的话，我们也只能正视现实。至于倒退到什么程度，那要看导致倒退的来势如何”。邓小平指出，既然中美和中日关系正常化都是在解决了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后实现的，那末，以后能否继续发展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关系，这个问题是焦点。邓小平还强调，我们注意到，有的议论说，里根先生可能采取向台湾派总统私人代表的形式。今天我坦率地说，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认为这是什么私人代表，而是一种正式的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果出现了这样或类似的事情，我们肯定会认为美国政府的决策已经改变了中美建交公报和上海公报的原则。它的性质不仅是使中美关系停顿，而且使之倒退。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邓小平认为，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 80 年代的观点，也不是 70 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 60 年代以前的观点。

邓小平指出：“我们真诚地希望中美关系不但不要停滞，而且要发展。我们对竞选期间和总统就任以前的言论是很注意的，但我们可以对这些言论作某种理解，我们重视的是美国新政府上任后采取的行动。我刚才说的都是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我认为，使美国朋友们清楚地了解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这是很重要和很必要的”。

邓小平的这番讲话，不是一时的即兴之谈，而是经过前一段时间对中美关系进行认真观察和缜密的思考总结出的结论。它表明，中国政府在维护中美战略关系的同时，也决不会拿原则作交易，更不会吞下有损于民族利益的苦果，只有中美双方共同遵守中美建交协议的各项原则，中美关系才能不断向前发展，否则，只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停滞，甚至倒退。对于这一点中国方面已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是郑重的，不容忽视的。

邓小平的这些重要论点，为稍后中国调整对外方针奠定了重要基础。

就在美苏关系趋向紧张，中美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波折的同时，苏联的对华政策开始出现某些积极的变化。1982年初以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和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先后就中苏关系发表谈话，都强调苏“不寻求同中国对抗”、愿意采取“具体步骤”同中国改善关系。苏方还提到以科技交流、互派留学生和恢复边界问题谈判等建议相配合。这是一种新的动向。

1982年3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表示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从而把苏方的意图表达得更为明确和具体。从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来看，在对华问题的语气上是历年来最为缓和的。过去勃列日涅夫谈到中国都是以攻击为主，偶尔也顺带说一下苏联主张同中国“关系正常化”，但显得毫无诚意。这次讲话则以强调同中国改善关系为主，侧重点与从前有所不同。勃列日涅夫还表示愿与中国“商定双方都能接受的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中国方面注意到了这个讲话，并以此为契机提出了双方举行磋商的倡议。经协商，中苏确定在北京和莫斯科轮流举行两国副外长级特使的磋商，讨论和解决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问题。

中美苏三角关系的这些微妙变化，使中国方面在外交上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原来所奉行联美抗苏的“一条线”国际战略已显然不适应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从1982年下半年起，中国在对外方针方面不再公开提及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实质是结成最广泛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取而代之的是，中国方面更加强调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更加强调发展同第三世界的关系。这样，美国也不再被列入反霸统一战线之内，相反，中国在同苏联举行副外长级磋商的同时还恢复了对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批评，并且声称不与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任何一个结盟。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对来访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说：“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1982年8月22日，中国外长黄华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中国不会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不会打‘美国牌’去对付苏联，不会打‘苏联牌’去对付美国，也决不允许任何人玩‘中国牌’”。考虑到当时中苏关系尚未正常化，这里所说的“中国不会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主要是指美国而言。中国对外战略的这种变化有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也有利于保持世界战略力量之间的平衡。

随后，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大会上，中国外交的新战略正式确立。9月1日，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了中国外交调整的方向，他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这后一段话显然是针对前一段的中美关系有感而发，邓小平进而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从而表现出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生活方式的警惕。最为重要的是，邓小平

---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5页。

《人民日报》1982年8月23日。

在提出党和国家在 80 年代的主要任务时指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 80 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由此点明了中国外交战略的根本目标，是为国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接着，胡耀邦在代表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以“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为题，全面阐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原则。应该说，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的一贯立场，但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中国所强调的独立自主有一个新的内容，那就是“不结盟”。胡耀邦明确指出：“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我们同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的关系。”在谈到同美国的关系时，胡耀邦认为，中美两国自 1979 年建交以来，发展了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关系。但是“两国关系中一直存在着阴影”。胡耀邦认为产生这种阴影的主要责任是在美国方面。这是因为美国“通过了一个违反两国建交公报原则的‘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把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对待。”胡耀邦指出，“中美两国政府经过将近一年的谈判，不久前发表联合公报，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作出了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的规定。我们希望这些规定将得到切实履行。中美两国关系只有真正遵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才能继续取得健康的发展。”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胡耀邦在谈到中美两国关系中的阴影之后，引人注目地提到了中苏关系改善的可能性，虽然这种可能性的前提条件是要求苏联“采取实际步骤”消除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此举既可相对缓和对苏紧张关系又可牵制美国，是很高明的一步棋。胡耀邦在政治报告中还表现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倾斜，他认为：“第三世界在战后国际舞台上的崛起是我们时代的头等大事”，他指出，“今后，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将不断扩大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友好合作。”

胡耀邦的上述讲话表明，为适应新时期的新情况，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对外方针在十二大之后将更加强调“独立自主”，不再同任何国家结盟或结成战略关系。由此出发，同美国的关系将会拉开一定距离，不再形成一种战略关系去对付苏联。中美关系要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正常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将发展经济建设作为解决一切国内外问题的基础，中国将避免同苏联的关系过分紧张和恶化。当然，在苏联把改善对华关系的言论变成行动之前，中国对美、苏两国的态度并不完全是等距离的（虽然胡耀邦在报告中把他们同称为“超级大国”），事实上，在强调“独立自主”的总前提下，中国重视中美关系仍然甚于重视中苏关系，这除了中国此时仍对苏联怀有戒心之外，还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这当然也是一种出于战略方面的考虑。

---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 页。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1986 年出版，第 42、48、49 页。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1986 年出版，第 44 页。

中共十二大所强调的“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在同年十二月召开的全国五届人大会议所通过的新宪法中得到确认，成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一项基本国策。这部根本大法的序言指出：“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宪法中有关中国外交方面的这些规定，有助于中国在新的形势下突出自己不受大国约束的独立自主的地位，并有利于中国改善同受美苏影响较大的国家的关系，从而真正作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

（作者宫力：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法学博士）

## 从国际战略的角度看 “一国两制”的构想

刘建飞

“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为解决中国历史上遗留的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而提出的战略方针和决策。如果我们将视野从中国移向世界，就会发现，“一国两制”构想还具有深远的国际战略意义，它不仅是依据当今世界的现实而提出的，而且对现今和未来的国际政治和战略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 一 “一国两制”构想产生的国际背景

任何重大理论建树和战略构想的形成，都是同当时的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分不开的。诚然，“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主要是依据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中国的现实情况，从解决台湾和香港澳门问题出发、尊重台湾和香港澳门的实际和中国大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而提出的，但是，当时国际环境的特点也是提出这一构想的重要依据。可以说，“一国两制”构想也是尊重了当时的世界现实。概括起来说，当时国际环境的特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体系谁战胜谁的问题一时还难以解决，两种制度将在同一个地球上长期并存。社会主义制度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因此，它一出现就遭到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反对和攻击，因而发生了对苏俄的武装干涉以及后来的祸水东引和遏制政策等等。而社会主义是以最终战胜并在全球取代资本主义为目的，因此才有了各种世界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然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较量，双方谁都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从资本主义这方面来说，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由最初的直接出兵进犯的“热战”到实行遏制的“冷战”，这一转变本身就表明它对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之强大无可奈何。“冷战”虽以苏联东欧集团的失败而宣告结束，但社会主义制度仍在一些国家生存下来，尤其是占世界人口 1/5 的中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显示出了蓬勃的生机。从社会主义这方面来说，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始终没有出现，而且资本主义还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了自我调节能力，生产力在某一阶段还能出现高速发展的势头。就两种体系的力量对比来说，资本主义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上都占有明显的优势，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才能在综合国力上赶上或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局面的客观存在，使得两种体系各方的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家以及战略家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如何处理两种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当年“冷战”的主要鼓噪者、“铁幕”政策的发明人丘吉尔，在临退出政治舞台前就曾大声呼吁要尽快结束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尖锐对峙的局面。“一球两制”已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地成为现实。既然两种社会制度能够在同一个地球上长期存在，那么“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两种社会制度在同一个国家内并存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尽管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先例。

（二）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主题。

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后，帝国主义的本性

和特征决定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会十分尖锐，进而会发生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而帝国主义战争会引发无产阶级革命。所以，从本世纪初开始，世界的时代特征是“战争与革命”。两次世界大战都引起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0几年间，虽然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战争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全世界人民头上，“冷战”几度险些转化为热战，而且局部战争不断。

到了本世纪70年代，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发展本国的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的首要任务，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为了巩固民族独立的地位，振兴本国经济，改变自己贫穷落后的面貌，迫切需要集中精力求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要想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更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就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不使自己在世界竞争中被挤出先进行列，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也需要不断发展自己。而要发展，就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战争是发展的最大敌人。战争不仅破坏有关国家的发展环境和条件，造成资源、能源和人力的浪费，而且还会使发展计划中断；即使是战争的威胁也会使相应国家分散精力和财力，甚至制定出畸形的发展规划。前苏联大力发展军工和重工业，将之放在优先地位，最终使经济发展比例失调，缺乏后劲就是例证。

另一方面，到了70年代末，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与和平形势有了重大转机，在这种背景下，“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按照邓小平的分析，这种转机主要是由四个因素引起的：第一，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都拥有相当数量的核武器，一旦打起核大战来，双方将同归于尽，因此谁都不敢先动手；第二，由于苏美两国的霸权主义政策和扩军备战活动遇到了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和执政当局的抵制，使得两个超级大国进行全球战略部署的努力受到了挫折，一直未能完成；第三，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第三世界、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以及美国和苏联的人民都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第四，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使得世界任何国家包括美国、苏联在内都不得不认真对待。

上述两方面情况的出现，使得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世界时代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时代主题变换要求任何国家的执政党包括无产阶级执政党在制定内外政策时都要考虑时代特征，因为时代潮流是不可抗拒的，顺之者则兴盛发达，逆之者则衰败没落，这是一个十分简单而又重要的真理。

为了适应时代主题的变换，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内外政策和方针进行了重大调整。对内将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对外则由“一条线”战略转为实行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

---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与这些转变相适应，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则“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提出了和平统一的方针。而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出发，“一国两制”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最佳方案。这一方案不仅照顾到了国内大陆和台、港、澳各方的利益，也能使与统一问题有关联的外国的利益不受损害，从而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三）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正在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在世界近代史上，欧洲一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第一、二次科技革命都发生在欧洲，世界列强主要在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逐渐强盛起来，取代了欧洲的世界经济重心的地位，然而欧洲仍然保持着其发达的经济水平，北大西洋两岸成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进入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迅速，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地位越来越重要。首先是日本崛起，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并超过欧洲诸强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随后，亚洲“四小龙”腾飞起来；近十多年来，东盟七国经济发展迅速，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尤其是拥有十二亿人口的中国已实现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经济实力有了明显提高，经济总量已名列世界前茅。更重要的是，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趋势还相当强劲，而相比之下，美国和西欧的发展势头则比较软弱。连西欧和美国的学者也都承认，到下个世纪，亚太地区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1996年春的亚欧会议就表明，欧洲国家已开始重新认识亚洲并重新确立它们同亚洲国家的关系。这种局面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遇，因此，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就显得更加重要。台湾、香港和澳门都地处亚大地区的中心地带，而且经济都比较发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在实现祖国统一的过程中，保持这些地方的和平与稳定是中国共产党及有关政治力量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中国人民和整个亚大地区人民共同的愿望。为此，在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时就应该尽可能采用和平的方式，而要实现和平统一，就应该充分尊重这些地方的现实情况，允许它们保持现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实行“一国两制”，就如邓小平所讲的，“采用‘一国两制’的办法，不仅解决了中国的统一，而且对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稳定，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 二 “一国两制”的精神 实质是和平共处

“一国两制”构想是依据世界现实提出来的，它反过来又对国际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称这一构想是“最富天才的创见”。美国的半官方机构兰德公司认为“一国两制”构想是在某种意义上超过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国际战略，而且是不动一枪一炮不花一分钱的超级战略。

---

《人民日报》，1979年2月1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7、101页。

如前所述，“一国两制”构想是在世界时代主题转换为和平与发展，中国外交总方针变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因此贯穿其间的一个总的指导思想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

和平共处最早是由列宁提出来处理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关系的原则。当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而且在总体实力上处于劣势。社会主义国家急需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因此列宁从策略上考虑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得到了很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认同。实践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处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好方式，也是处理相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关系的行之有效的方式。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

“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对和平共处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将原来用于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拿来解决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他指出：“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可见“一国两制”构想与和平共处原则之间有着有机的内在联系。“一国两制”构想所蕴涵的精神实质就是和平共处。

两种社会制度可以在一个主权国家内和平共处的思想，反过来又强化了在处理国际关系上应该运用和平共处原则的观念。邓小平论述道：“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在这里邓小平以无产阶级大战略家的雄伟气魄，总结了20世纪的国际政治和国际战略，指出了以往各种国际战略模式所存在的弊端，提出了和平共处原则是处理国家之间关系最好方式的结论。这里，邓小平已不再把和平共处仅仅作为一个策略原则，而是上升到国际战略的高度。这对指导中国的外交政策，开阔人们的视野，改变传统的以“进攻”或“防范”为基础的对外政策思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国两制”与和平共处确实是一个“超级战略”。

### 三 “一国两制”构想为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新思路

国际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利益不同的国家、民族构成的，在相互交往及各自发展过程中，难免产生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和争端。自有人类社会以来，战争往往是解决国际冲突和争端的最终手段。然而，战争是残酷的，它是以无数人的生命和巨大的财产浪费为代价的。而且战争往往并不能使争端得到有效的解决，反而会加深有关国家和民族的仇恨和隔阂。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武器得到不断改进，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破坏性也愈来愈强。到了核武器时代，全人类都面临着被核

大战毁灭的危险。全人类的生存危机促使很多有责任感的政治家和国家领导人去思考、探索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邓小平这位爱国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实事求是派”，从中国人民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来建设国家的实际出发，从维护世界和平这一全人类的利益出发，从国际政治的现实出发，提出了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这就是“一国两制”、和平共处。邓小平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如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我上面讲的这类的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

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从全人类的利益出发，提出了解决国际争端、稳定世界局势的新思路、新办法，这是他对国际社会的一大贡献，是他的“最富天才的创见”。

在诸多国际争端中最重要、最常见的就是领土和边界争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不仅在理论上勇于探索，提出了新办法，而且在实践上也作出了表率。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中俄哈吉塔五国边界问题的解决。1996年4月26日，上述五国元首在上海正式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协定规定：双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双方不进行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限制军事演习的规模、范围和次数；通报边境100公里纵深地区的重大军事活动；相互邀请观察实兵演习；预防危险军事活动；加强双方边境地区军事力量和边防部队之间的友好交往等。这一协定是亚太地区第一份多国双边政治军事文件，它的签署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中国与前苏联有着长达7000多公里的边界线，60年代，苏联推行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在中苏及中蒙边界上陈兵百万，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而且还一度在局部地区爆发了武装冲突，使中苏边界局势异常紧张。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三国边界问题的解决，使中国东北和西北7000多公里的边界线处于长期稳定的和平安宁状态得到了协议保障。不仅如此，五国边界问题的解决也促进了中亚和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甚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行动本身为今后世界各国通过和平谈判、协商解决边界问题及领土争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同时也说明了和平共处原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和平解决领土和边界争端问题上，邓小平还有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共同开发”。他说：“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些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他在列举了钓鱼岛问题和南沙群岛问题后说，解决这些问题，“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搁置主权问题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充分显示了“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坦诚胸怀，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和平外交方针和路线。

---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

总之，“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就是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在正确把握时代主题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既是解决国内统一问题也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新办法、新思路，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将证明这一构想是科学的、符合实际的。

（作者刘建飞：中央党校副教授，在读博士生）

# 邓小平时代中国 外交形象的战略思考

李向前

1985年，中国决定裁军100万。这项重大举措，震动了世界。引人瞩目的，邓小平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对百万裁军的战略意义作了下面的阐述：“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以树立“和平形象”为一个大战略的立足点，是耐人寻味的。它同当代中国的外交战略演变之间形成了至关重要的联系。

所谓“外交形象”，无非指一个国家要向世界表明什么，以及经过某种预定的政策和外交行为，为世界留下特定的印象等等。如同人们在社会公共关系中需要一个与其内在特征相符的形象一样，国家也需要以完美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丑陋、偏私与凶恶必定为人们所疏远和唾弃；而公正、美好和善良，也必定会得到广泛的拥护和友谊。

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国。维护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良好形象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这种对美好目标的追寻，往往要历经坎坷。因而对新中国外交形象的历史性考察，将有助于对确立中国“和平对外形象”这一重要命题的理解。

## 一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

长期以来，国际上总是流行着一种“中国好战”的观点。显然，这是一种使中国外交形象深受伤害的舆论。对于居心不良、有意中伤者，中国领导人曾多次予以严肃批驳。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产生这种舆论的国际性原因，认真研究造成这种现实状况的国际国内背景。

在很大程度上，“好战”的舆论同中国曾经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某些不尽确切的表述和观点有密切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坚持着“由于帝国主义的存在，由于世界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特别是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我们不仅认为世界性的大战不可避免，甚至感觉它已迫在眉睫：“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这种概括和其后社会上广为使用的一个口号：“团结起来，准备打仗”，把战争可能性及备战气氛推向了一个炽热点。

同时，在“战争与革命”的问题上，我们也坚持“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的观点。而且，在宣传上更侧重革命的因素在增长：“越南南方、老挝、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勒斯坦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武装斗争日益壮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日益为广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所掌握。”因而，“全

---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以下凡引邓小平的话，均出自《邓小平文选》第2、3卷。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69年4月1日。

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迫切任务，就是联合起来，埋葬帝、修、反和一切走狗！”这种并不确切的语言的使用，无疑给我们的对外形象带来某种不利影响。

事实上，“中国最希望和平”。中国需要和平的外部环境来建设自己的国家，中国也需要世界性的和平，使整个经济落后国家获得发展自己的机会。那么，上述极端的语言和过于绝对化的判断是怎样发生的呢？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形成了我们长期以来对形势的严峻估计。先是美国在朝鲜、台湾海峡发动战争，制造紧张局势，继而它在日本及东南亚对中国形成包围，最后在越南挑起了一场热战；其后是前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对中国构成直接的战争威胁。60年代末，前苏联发动了对同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捷克的军事入侵，并在中苏边境的东部和西部挑起武装冲突；70年代后期，苏联煽动地区霸权主义者入侵柬埔寨、直接出兵阿富汗等行径，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警惕，从而对可能针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作出准备。

但是，毕竟我们作出的分析只是指出了它的可能。事实证明，针对中国或世界性的大战并未爆发，这就有可能使我们从另外的方面考虑问题：1.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采取的战略是直接侵占还是军事遏制？2.美、苏两国是否真的会冒打核大战的风险？3.我们是否对国际形势作了“过火”的反应？4.当今世界的诸种矛盾是否已经达到必然引起大规模热战的程度？换言之，这个世界的主流究竟是战争还是和平？

显然，我们当时的答案不够精确。首先，美苏两国对中国的主要战略方针是“遏制”，而非大规模的侵犯（不排除某种程度上对中国进行小规模“偷袭”），至少现有的材料还不足以证明上述两大国有全面进犯中国的战争计划。其次，如同现在人们所认识的那样，核武器的存在，一方面造成了战争的危险，另一方面却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战争的发生。因为当人们意识到核战争的结果只是导致地球的毁灭，而不再分得出胜者和败者的时候，原子弹也就仅仅成为一种制约性的力量了（当然，这不等于说，世界人民已无需承担制止核战争的义务）。第三，危险和威胁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作出估计。胡乔木认为，从50年代至70年代，我们对国际环境的恶化程度估计过高，作了“过火”的反应：当时“中国感觉全世界似乎都在打算围困和扼杀剩下的仅有的革命圣地”。因此我们极力与之抗争，极力试图消除这种危险，从而造成了我们国际国内政策中的“左”倾错误。最后，世界性大战至今未爆发这个事实说明，50年代至70年代的世界尽管动荡不已，但其基本矛盾并未激化到将要引起世界性大战的程度。因此，即使在当时，世界也仍然是存在着战争与和平两种可能。老一代外交家王稼祥早在1962年就指出过这一点。他当时预言，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并不必然导致世界性战争。因而，“不要笼统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世界战争来说，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这些观点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并进一步证明了，和平的可能性

---

1985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提出只有美苏两家有资格打世界大战，但“谁也不敢先动手”。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

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20年的“左”倾错误》，《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5期，第3页。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0页。

远远大过了战争的可能性。

至此，研究已经揭示，那些曾经造成我们对外形象中过于绝对化和极端性的“客观”危险，并不像描述的那样严重。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更深的层次上，说明我们的“过火”反应。

胡乔木在他的上述分析中指出，正是我们所处的“某种封闭状态”，造成了20年来的“左”倾错误。而恰是国内政治和理论意识形态方面的“左”，又使我们越加封闭，越加对“战争与革命”问题作出过于绝对化和激烈的判断。两者互为因果，“交相放大”。

准确地说，夸大“国际阶级斗争”，正是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产物。例如，我们曾长时期地坚持认为，当今世界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因而“广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这两个群体概念被看作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化身——笔者注）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际资产阶级的化身——笔者注）的斗争”，已成为时代的主流，两大阶级的决战已不可避免等等。显然，这是将国内阶级斗争的基本概念推及到了国际，并据而判断，世界无产阶级战胜国际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胜利，已为期不远了。

这种夸大国际上战争与革命的可能，夸大国际革命的意义，夸大战胜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现实性的“左”倾错误，同1957年后国内政治中“左”的东西的滋长，在时间上大体相平行。本来，1956年党的八大已宣布了阶级斗争的基本结束。但不久出现的反右斗争，却又被认为是国际和国内阶级斗争开始激化的证据。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代表了一种对共产主义空想式的追求，从而也扩大了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大同”及战胜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信念”。胡乔木称之为“中国发生了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狂热”。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国的对外宣传口号中出现了诸如“打倒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将世界革命进行到底”的不恰当的口号，并在实际中支持了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政治斗争。

极左的错误到“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极致。在国内动乱最严重的时刻，中国外交机构基本陷于瘫痪，驻外使馆人员公然起来造驻在国的“反”。1967年8月，北京竟出现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恶劣事件，造成严重的国际影响。这一切都是在“革命”的口号下付诸行动的，都是在“打倒帝修反”的狂热气氛下进行的。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盖洛普测试机构分别于1966年和1972年对美国公众关于中国的观感进行了测试，其结果是：在1966年的主要印象值中（取两项最高值参数），肯定（努力工作）和否定（好战）面各占其一；而至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的主要印象值中，肯定面（“努力工作”和“进步性”）则占100%。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明，中国的对外形象同我们国内政治形势及外交战略的相关变化呈对应关系。

造成我们主观上易于偏激处理对外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50年代中后期开始形成，60年代及以后表面化的中苏两党意识形态论争。这个论争的焦点，主要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如果说，我们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始终坚持“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只要国际剥削者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的观点，容易造成我们更强调“战争”的印象的话，那么在激烈争辩中的固

---

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20年的“左”倾错误》，《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5期，第3页。

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20年的“左”倾错误》，《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5期，第3页。

科林·麦克拉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页。

执己见，以至最后演化成为的严厉批判，则又加重了我们思维和言词的片面性。这表现在，当我们高声呼喊“打倒帝国主义”、“支持世界人民革命斗争”时，却忽略和淡漠了对世界和平和全球性稳定的争取。当时的逻辑是，只要强调了“和平”，就是“妥协”、“右倾”，甚至是“修正主义”。这犹如一场阵线分明、非此即彼的战斗，没有退让软弱可言。正是在这种针锋相对、鼓角齐鸣之中，减弱和模糊了中国外交政策中本应充分强调的“和平”性质。

由此看来，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要改变中国对外形象是不可能的。因为，很难想像在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背景下，我们能够树立起“和平和发展”的旗帜。

毫无疑问，外交形象受到损害所带来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60年代中后期，我们不得不在极其困难和危险的局面下面对世界，不得不在孤立的状态下勉力支撑我们的外交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已无法利用外部环境积极开展对中国具有绝对意义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这种状况直到1971年打开对美外交之后，才发生了转机。但真正的历史变革，出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我们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理论 and 实践，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而迈出了当代中国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整个战略中心的转移，为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观察与判断，提供了新的思维。而邓小平正是这个思维的倡导者，也是新的外交战略的总设计师。

关于和平问题，是邓小平在80年代初那篇题为《目前形势与任务》的讲话中最先提出的。当时他指出：“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随后不久，他又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冷静地判断国际形势，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是可能的。”那么，就当时的世界形势而言，这可能争取到的不打仗的“一点时间”究竟有多长呢？邓小平在1982年8月同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那个著名谈话中提出：“中国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如果考虑到我们实现现代化第二个目标的时间表，即用30年到50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水平，那么就需要“再加30到50年，就是说我们希望至少有50年到70年的和平时间”。邓小平当时还以极其肯定的口吻告诉这位秘书长：“有人说中国好战，其实中国最希望和平。”

但是，世界毕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整体。不仅霸权主义对别国的战争威胁不会因时间的变化而消失，各个国家之间领土、边界、主权等等的争端，也将会在很长时间内存在。如何看待这些可能引发战争的潜在问题，怎样认识和处理这种现实性的矛盾，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对外姿态。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的学者时，谈了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他认为，到目前为止，采取“一国两制”这类办法解决上述问题“是可取的”。他说，对于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而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可以避免“始终顶着、僵持下去，甚至发生武力冲突”的情况，他说，要“解决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而这样做的全部目的，“是要把世界局势稳定下来”。因为，“中国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关心和平和国际局势

的稳定。”可以说，这是当代世界政治家中最富于建设性，也最能赢得真正热爱和平声誉的精辟之见。

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认识的重大改变，酝酿于1984年至1985年之间。而这个理论判断性的重要更改，是在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仍然对中国构成军事、政治威胁的情况下作出的，这正是它的极其可贵之处。因为它表现出一种对世界形势发展底蕴所进行的精确研究和准确把握。1984年2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指出：对于国际局势，我们总的看法，战争的危险始终存在。前几年毛主席在世时和整个70年代、80年代的头一、二年，我们强调战争的危险。现在我们感觉到和平力量在壮大。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的谈话中再次讲到：“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所以，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后来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同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时再次指出：“我们对战争的看法有了变化，现在我们的看法大概一致了（指原来关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争论）……今天分析，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是可以避免的。”以此为标志，我们对世界性战争可以避免的判断趋于明朗化了。此后，由邓小平提出和确立的中国对世界形势的总看法，采用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表述。可以这样说，这是当代中国对外战略思想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它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深刻把握世界和平力量正在稳步增长这一历史性潮流的同时，中国先后进行了多次外交努力，以推进世界和平的发展进程，同时在世界面前牢固地树立起自己“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的形象。这些重大举措包括：同美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实现同前苏联关系的正常化；同周边国家如印度、韩国、越南、蒙古等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巩固和发展同欧、亚、非、拉丁美洲各国的友好关系，寻求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互惠互利；积极加入世界性组织，参与国际性多边合作，并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裁军百万，以此向世界“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新形象，就是这样在历经了深刻反思、冷静判断和果敢抉择之后，才最终树立的。然而，一国形象问题所包含的内容和涉及的方面仍要延伸到更为广阔的历史空间，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它作进一步的探讨。

## 二 结盟与战略相处

事实上，不管维护怎样社会制度的国家，都必须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它生活在集体相处的国际大家庭之中。于是，就有了大家庭成员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由于各自需要和战略利益的不同，各国间关系的性质也表现出色彩纷呈的面貌。而一个国家的形象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为人们所理解和认定。

新中国 40 余年的外交实践,在根本的意义上奠定了中华民族从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中重新崛起的大国地位和形象。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在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和确立自己国际形象的过程中,仍然历经了几次重大的历史性变动。大体上,我们可以确定这些变动为“结盟——强调战略关系——全面实行独立自主”等三个主要阶段。

#### (一) 关于结盟关系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们必须结盟。对于饱受战火摧残,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并受到国际帝国主义势力敌视的新生政权说来,采取“一边倒”政策,不仅仅是意识形态规定性的需要,更是保卫国家安全,展开国内经济建设所必须。应该说,这是在那个历史环境中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但结盟也有许多弊端。首先,我们自身的角色被严格限定在了极端分明的对抗格局之中。这里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我们必须无条件地置身于同另一阵营的激烈斗争,以逐渐削弱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其二,必须无条件地(有一个时间过程)维护和保持本阵营内部的团结、统一,以壮大阵营自身力量。显然这在两军对垒中也是绝对必要的。然而,也正是这种结盟的规定性,限制了结盟者自身处理国际事务的灵活性,削弱了他们的自由度(在以原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是严禁“自由”的,一切服从纪律,一切服从大家庭,违者甚至有被“革出教门”的危险)。因为大家都要按照同一个指令和同一个方案行事,需要遵从一个共同的纲领,于是也就有了同一种面貌和同一种形象。

但事实上,这种绝对的“统一”是不可能存在的。各个国家对世界形势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理解和对各自国家利益的追求,都存在着相当差异。因而表面统一的阵营,实际潜伏了许多深刻的矛盾。

尽管中国共产党在诸如 1948 年共产党情报局处理南斯拉夫问题,以及在其后对待若干重大国际事务的行动中,同苏联保持了相一致的立场,但实际上,新中国的外交目标并非刻板地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所谓“同一性”,而是谋求同一切愿意与中国友好相处的国家和人民建立联系。在这一点上,中国同东欧许多国家有重要区别。正如毛泽东在宣布“一边倒”的同时向世界声明的那样:中国是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在外交实践上,我们在建国初先后同印度、瑞典、丹麦、缅甸、瑞士、芬兰等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确立了在通过谈判手续之后同更多非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的政策。这一切都是在中国宣布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与苏联结成战略同盟的情形下进行的,它为新中国树立了既严守独立自主又不失政治原则的国际形象。

然而,五六十年代激烈对抗的世界冷战格局,毕竟使我们在意识形态和现实外交选择方面受到一定程度的局限,特别是当国内政治中“左”的错误越加滋长时,我们处理国际问题的态度也出现了片面性。那种过于强调世界大战的迫近性和不可避免性的提法,那种着重强调和支持世界革命的不切实际的宣传,都影响到中国作为追求世界和平和寻求睦邻友好力量的最初形象。

值得研究的是,中国同苏联结盟关系的最终走向破裂(这种破裂首先是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某些人顽强地企图以“家长”自居,对别国主权和

内政施以粗暴干涉的结果。中国与前苏联的“闹翻”，最根本的是反对“老子党”对中国主权的干涉），造成了中国对外方针的两个重大变化。一方面，我们独自更高地举起了反帝和革命的大旗，成为在政治上反对帝国主义阵营的主要力量。这一形象事实上表现为对原本社会主义阵营政治立场的执著坚持与追求；另一方面，我们对世界政治力量作了新的划分，相继提出了“广大民族主义国家有可能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中间立场”，“中间地带仍然是帝国主义相互争夺的中心”，以及最后形成的关于“第二世界”、“三个世界划分”等重大的理论观点。

应该说，同苏联盟友关系的实际破裂所产生的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的变化，给当代中国外交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其意义在于，在摆脱了原有的“集团政治”性的所谓阵营之后，使我们有可能更为广泛地接触和团结民族主义力量乃至第二世界的政治力量，建立起国际统一战线，向着压迫、剥削别国的主要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抗争。这个反帝、反霸的国际统一战线为新中国赢得了很高声誉。正是在这种坚决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坚持一切国家应当享有平等权利的正义斗争中，中国争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信任和好评（1971年中国终于在无理地被排除20余年后，重返联合国）。同时，在世界从此由两极走向多级化的意义上，中国外交所促动的全球性战略格局的变化，对战后历史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由此看来，因实质上并不平等和由更多意识形态色彩维系起来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政治家寻求和开拓中国新的外交战略，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性联系。在新的对外政策调整中，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是，更加务实和采取一种战略相处式的关系，从而使中国外交形象有了新的意义上的改变。

## （二）关于“战略相处”关系

所谓国家间的战略关系，是指人们基于某种战略需要，或从某种战略角度出发，建立起来的比较紧密的相互关系。它不以相同的意识形态作基础，也没有相互间必须承担的盟约义务，但在对付共同的敌人和危险时，会采取相配合的战略姿态。

70年代初期，中国打开对美外交，实现了中美关系的缓和，这代表了中国外交同大国建立战略相处关系的开端。毛泽东曾形象地称这种战略关系为“一条线”、“一大片”。即为了对抗苏联霸权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中国主张建立一条经过日本到西欧，再到澳大利亚、新西兰，最后到美国的联合战线，并团结这条线周围的国家（“一大片”），共同遏制对全球和平与安全形成巨大威胁的苏联扩张主义。在实质上，这是一条“联合反霸”的统一战线。

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建立“联合反霸”的战略关系，有效地遏制了苏联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政策，对推进全球的稳定和进步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国内政治经济政策和对外战略的调整，原来的“战略大三角”关系开始改变了自身的态势和意义，中美间的战略关系也随之变化。在这种国际关系复杂演变的转折点，中国的战略地位问题和它所代表的对外形象，也需要重新予以厘定。

首先，维护战略关系，但不能受制于人。80年代初，中美关系出现了一

定程度上的倒退。其原因是美国决策者中形成了四个错误的观念：1.认为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是无足轻重的，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2.认为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而美国却无求于中国；3.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吞”下去；4.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大约与此同时，美国对台湾政策严重逆转，发生了售台武器和试图建立美台官方关系的严重问题。显然，这些事件不能不极大地涉及到中国在战略关系中的地位和形象。

台湾问题无可争议，任何企图向台湾出售武器和妄图改变台湾政治地位的作法，都是对中国主权的干涉。对此，中国作出了强烈反应。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向世界斩钉截铁地宣布，如果认为“中国出于反对苏联的战略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这不可能”。同时，邓小平对上述涉及中国战略的重大原则问题一一申明了坚定的立场：第一，中国愿意维护同美国的战略关系，但并非有求于美国，我们是从制止霸权主义，反对扩张的全球战略意义上着眼的。早在中美两国关系解冻之初，中国政府就反复向尼克松总统说明，中美关系缓和是全球战略的需要，因而也是美国利益和中国利益的需要。邓小平指出：“正因为如此，我们很欣赏尼克松总统到北京来向毛主席讲的第一句话：‘我是为美国自身利益而来’。中国同美国打交道，发展贸易关系，但并不抱什么幻想。因为中国同美国没有关系的时候，日子也过下去了，而且还过得不坏。”邓小平严正指出，因此，那种认为中国有求于美的观点是危险的，因为这首先就破坏了全球战略。

其次，如果国际上的政治家、活动家把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的作用估计过低，就不会对世界形势作出正确估计，也不会有正确的政策，更不符合事实。邓小平指出，中国本身落后，军事装备更不先进。但中国也有一点长处，中国不怕包围，有长期进行持久战的经验，有用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作战经验。中国地方大、人多。有“大块头”这个好处。还有，就是中国人“不信邪”，“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敢于正视现实，用弱小的力量去面对强大的力量”。10年来中美战略关系的历史也说明，中国不是“一块豆腐，拿指头一戳就垮了”，否则“为什么能够形成一条线”呢？这些强有力的申明，澄清了战略关系中一系列深刻的道理，为我们维护战略关系而又不受制于人奠定了政策和策略基础。

确立反霸战略关系中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这种关系不应损害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一般说来，发达国家都有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殖民侵略和掠夺剥削的不光彩历史。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它们怀有警惕、鄙视的心理是正常的。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一员，在处理同发达国家的战略关系时，对第三世界所形成的影响常常处在很“微妙”的状态。这其中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我们在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确立战略关系的同时，不应轻视、缩小和疏远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其二，进行反对前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但对第三世界各国却不能“以苏划线”。显然，这两种关系处理得是否妥当、适度，将直接涉及到中国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地位和形象。

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当我们需要同发达国家建立紧密的战略关系时，就容易产生同发展中国家疏远的印象；当我们强调“三个世界”划分中

---

参见邓小平 1980 年 12 月 25 日同巴基斯坦外长夏希的谈话；1981 年 4 月 6 日同英国前首相希思的谈话。  
参见《邓小平谈中苏战略形势和苏联的全球战略问题》1980 年 6 月 3 日。

“制衡”的思想，更侧重于宣传联合反霸时，就容易忽略反映第三世界的要求；特别是当我们感到苏联威胁增大而霸权主义确在进行对第三世界的争夺时，就容易造成“以苏划线”的倾向。对于社会主义的中国说来，这些问题都带有重要的“原则”性质。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外交政策策略的一些偏向进行了及时纠正。1982年底，中央明确提出，不能只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而丢掉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旗帜；对第三世界的正义斗争和合理要求要旗帜鲜明地支持。1982年4月，中央提出，我们要利用美苏矛盾，侧重反对苏霸，在有些问题上也要侧重反对美霸。“一边倒”不利于利用美苏矛盾，不利于反对霸权主义，对中国在世界的形象也是不利的。上述这些论断不仅确立了我们在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关系中所应坚持的立场和态度，更重要的是，它已酝酿了对外战略方针上的一个重要转变。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明确提出中国要树立自己作为和平力量和制约战争的形象，并在实际上担当这个角色。的同时，也正式宣布，中国将对自己的外交政策作出重大调整，这就是放弃使用“一条线”的战略策略，而真正将对外方针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

无庸讳言，现存国际政治关系仍是一种持久和稳固的体系。因而，在全球范围内，人们不应过于意志化地追求某种结构性和制度性的变革，而重要的是寻求作为主权国家同别国的和平共处，保持独立自主的精神和权利。对于这种历史性的昭示，邓小平曾赋予了它经典性的断语：“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历经了国际舞台上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之后，我们今天更加成熟。这成熟意味着，我们应该把“和平共处、独立自主”更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的形象长久地坚持下去。

（作者李向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 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初探

张中云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其中，基本理论中的有关当今的时代、时代主题、世界矛盾、世界结构、世界格局等几个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 一 当今的时代

时代问题是国际战略中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是观察国际问题的立足点。国际风云的变幻，都是特定历史时代发生的现象，只有弄清时代的根本性质、主要内容、发展方向以及历史背景等，才能从规律上对它作出解释并加以把握，从而正确地制定自己的战略策略。

当今人类社会处于什么历史时代，这是近年来人们有争议的问题，也是非常敏感的、不易取得共识的问题。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在《资本论》所揭示的，列宁在《帝国主义论》进一步加以发展，并由十月革命胜利和二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得到证明的论断，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了由资本主义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的历史时代。当然这个历史时代，要延续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而且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任何历史时代它“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这就是说，作为历史的大时代，是不可能直线向前发展而没有曲折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有关国际问题的论述，虽没有明确肯定或否定党历来关于时代问题的论断，但从他考察和论证当今社会主义的意义和人类历史发展前途中就能发现，他完全立足于我们正处于这个新时代。否则，我们就不能把握和理解邓小平有关社会主义一系列论断的时代背景和时代意义。

邓小平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就是在已经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发生的合乎规律的现象，它使这一历史总进程的标志更加明显。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5 周年庆祝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35 年来，我国不但完全结束了旧时代的黑暗历史，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所谓“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就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邓小平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证明，已经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他在 1987 年同来访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代特劳加尔的谈话中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

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邓小平清醒地看到，这个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还只是刚刚开始，由于整个帝国主义仍然十分强大，由于人民还缺乏经验，因而前进中碰到逆流，发生曲折是难免的，但是人类历史前进的这一总方向是不会逆转的。邓小平针对 1989 年“六·四”风波说，“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苏联、东欧发生演变后，在一些人看来，社会主义“不行了”，“没有前途了”。邓小平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指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是道路是曲折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邓小平正是把握了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性质、特征和发展方向，才满怀信心地宣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始终是站得住的。”

## 二时代主题

这是指历史大时代的核心内容。

本世纪前半期，马克思主义者把我们所处时代的主要内容即主题，概括为革命和战争。认为，这是由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的现实特点所决定的。1918 年，列宁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一文中说：资本主义已经“使生产力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人类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过渡到社会主义，要么一连几年内，甚至几十年地经受‘大’国之间为勉强维持资本主义（以殖民地、垄断、特权和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作为手段）而进行的武装斗争。”

这一基本观点一直被共产党人继承下来，直到 1977 年党十一大仍然沿用这一基本提法，说：“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绝不会有什么持久和平。”作出这样的判断主要是以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当时国际形势的实际发展为依据的。事实上，在人们作出这一判断时期内，世界确实长期面临着战争和革命两大问题。远的不说，最近发现的前华约集团的军事地图、演习计划及报告的秘密材料也能证明这一点。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并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持久和平，而是面临新的战争危险。第三次世界大战逼近的最危险时刻是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当时形势十分紧张，华约组织的备战已到这种程度：17 万民主德国军队可以在 2 小时内应战。华约海军

---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9、225、311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83、321、346 页。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 2 版，第 20 卷，第 325 页。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第 33 页。

舰只在 1 小时内可以出动，预备师在 2 天内即可组织好。完全是处于临战姿态。此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也并不是停留在“冷战”上，它们随时准备由冷战转变为热战。

马克思主义者将革命与战争联系起来，也是根据历史的经验，因为战争会激化社会矛盾，并导致革命。例如 1870 年的普法战争引起 1871 年的巴黎公社革命，1904 年日俄战争引起 1905 年俄国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和挣脱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建立。

尽管以往人们在革命和战争程度的估计上，有估计过高的偏误，也有把时代的性质和主题本来是不同的两个东西等同起来的不确切的定式，但不可否认这两大问题始终是人们一度面临的迫切问题、主要问题。

70 年代初期以后，情况开始有所变化，然而在“友”的指导思想下，人们看不到或不承认已经出现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从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国际形势的变化，1984 年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邓小平把和平与发展提到世界两大问题的高度，无疑就是时代的新内容或称之为主题。这是对新形势作的新的科学论断。

邓小平的这一科学论断是以事实为根据，包含着极其重要的思想：1. 突出了时代新的主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内容。邓小平认为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平与发展已成了当代世界的“主要”问题，“非常突出”的问题、“真正的大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这就是说，在历史大时代不变的情况下，时代的核心内容已由革命和战争，转变为和平与发展。2. 纠正了我们对战争的过分担心，要求集中精力于经济建设。还在 1982 年，他就说：“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 10 年打不起来。”3. 断定世界制约战争的力量有明显增长和东西方国家关系得到改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邓小平说，过去鉴于“核武器谈判，外层空间武器谈判，看不出有什么进展。所以，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險。但是，现在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險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日本人民不希望有战争。欧洲人民也不希望有战争。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希望自己发展起来，而战争对他们毫无好处。”4. 强调发展问题不只是南北经济关系问题，而且是世界发展的问题。邓小平说：“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世界发展问题。我曾多次对一些外国朋友讲，这个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困，而相对地说，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南方要改变贫困和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还有什么市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因此，“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

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

### 三世界矛盾

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漫长的历史时期，在当代世界上，矛盾很多，各种矛盾都起作用，不过作用和影响大小有所不同。邓小平全面分析了历史和现状，反复强调和论述的主要问题和矛盾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因为，当前全世界人民受到的主要威胁，解决世界面临的许多问题，特别是解决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根本阻力是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实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由此可见，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美国等西方少数几个国家推行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与世界各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的矛盾。邓小平谈论国际问题时，出现频率较多的词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虽然没有用这是“主要矛盾”这样的概念，但是意思是清楚的，它占有最突出的地位，制约和影响其它问题或矛盾的解决。

第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人民的一项重大任务。邓小平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提出的中国人民在 80 年代的三大任务，可分为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其中两项是国内任务，即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另一项是国际任务，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国内和国际任务是互相制约、互为条件的。若不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祖国统一就难以顺利进行。而且当刚刚进入 80 年代时，邓小平就已提出：“反对霸权主义这个任务，每天都摆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他还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我们的“国策”、“总政策”。可见其所占的位置。

第二，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要问题的对立面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邓小平说：“霸权主义过去是讲美苏两家，现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也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西方七国也就是西方七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过去都是老牌的帝国主义，现在又搞新殖民主义。二次世界大战后，它们的力量虽有所削弱，但仍占主导地位，而且本质并未改变。邓小平指出：“中国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就强调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并认为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始终在横行，现在它们又打出“人权、自由、民主”的旗号任意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所以“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第三，现在世界上同时要做的建立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这两件事，所遇到的阻力就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当前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要求是，在和平与发展的形势下，建立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但是，困难重重，

---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6 页。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40、345、104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45、383 页。

阻力很大。帝国主义旧殖民统治是瓦解了，然而原来的旧秩序并没有被摧垮，原来的宗主国以种种理由和借口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竭力维护旧秩序。只要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消除，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就难于建立。

第四，占世界经济主体的西方大国竭力奉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对外政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几个大国，控制着世界经济的70%，这是它们奉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经济基础，这一实力基础在短期内不可能发生明显的变化。而且奉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是某届政府的政策，而是由这些国家社会制度本质所决定的。

#### 四世界结构

世界结构，即是世界划分的状态和形势。对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弄清楚世界的结构，也就是弄清楚世界上敌友我的阵势，做到心中有数。只要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没有结束，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国际上敌友我三方都是客观存在的，无法抹煞的。

关于世界结构或划分，列宁把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划分为两个阵营，也即两个民族：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6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普遍认为，世界形成为两个对立的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

60年代国际共运大论战，终于引起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到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正式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不再使用原先两个阵营的提法。毛泽东提出：第一世界，指美国和苏联两个具有最强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在世界范围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第三世界，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第二世界，指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同年，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国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观点和政策。他还对超级大国下了一个定义：“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邓小平当即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决不做超级大国。

在《邓小平文选》第2卷中，曾多次提到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并给予高度评价。邓小平指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它为我国去争取有利的国际条件“开辟了道路”；它“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和战略思想，明确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团结谁、争取谁、反对谁的基本问题，摆正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位置，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这在今天仍然有指导意义。

《邓小平文选》第3卷虽然没有出现“三个世界”的概念，但是他在分析国际问题时，反复使用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中的三个基本概念及其含义，即霸权主义、第三世界，发达国家，并与中国的外交战略和策略相联系。如，在界定世界的和平力量超过战争力量增长时说：“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

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这个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真要打仗，他们是不干的呀！”此外，邓小平还认为，我们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是同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的基本态度和立场是相一致的。他在1986年3月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说：“我们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我们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改善关系，但是他们哪件事做得不对，我们就批评，就不投赞成票。我们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去。我们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苏联发生变化后，还有没有第一世界？是不是还存在三个世界？回答还是肯定的。只不过是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成员有所变动。美国依然存在，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已扩大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邓小平在1989年11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霸权主义过去是讲美苏两家，现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也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无疑，在第三世界和七国首脑会议之间，还存在一批发达国家，也就是第二世界。今天三个世界的理论和战略仍不失其意义。

## 五 世界格局

世界格局随着主导和影响国际秩序的力量变化而发生变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改变了原有力量平衡的体制，形成了凡尔赛体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建立了新的雅尔塔体制。这两次格局的变动，都是世界大战的结果。80年代末，随着苏联的衰落和最终解体，宣告以美苏两极主宰世界事务的雅尔塔体制的瓦解，世界各种力量发生分化和重新组合，出现新格局的趋势。

邓小平十分重视世界格局的新旧交替和最终形成。因为，一定的世界格局决定或影响着国际事务的处理和发展，每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都会受到这种格局的牵制。每一个国家在世界格局中占有的地位，关系到自身在国际上的作用。

在当今世界格局的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

第一，格局的变动，会引起世界新的动荡不安。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与此相联系，国际形势出现新的动荡，旧格局下掩盖的一些深刻矛盾便会逐步暴露出来。新动荡便在情理之中，动荡中，什么矛盾又会突出起来，新；日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需要多久，邓小平对这些问题没有急于下判断，需要我们作“冷静观察”。

第二，世界格局正在向多极化过渡，形势对我们有利。世界格局向多极转变，是国际形势发展中的积极因素。世界多极化，意味着决定国际大事的参与者更多，可防止少数大国专权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世界各种力量互相牵制，世界和平更有保障。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

---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156、345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

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

第三，中国是世界向多极格局转变中的一极，应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世界究竟向几极格局转变，众说纷坛。邓小平认为，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中国不做超级大国，但决不关心自己在未来多极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有自己独立的对外政策，有自己判断国际是非的标准和行动的准则。任何其他各极不能不考虑中国的立场和态度。中国在国际中的作用发挥越大，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也就越有保障。

（作者张中云：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国际政治学博士生导师）

## 邓小平“一国两制” 构想的形成和发展

谢春涛

“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解决台湾和香港、澳门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战略构想，也是党和政府确定的一项基本国策。多年来，它得到了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广泛赞同和支持，在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历史地考察这一构想的形成和发展，对于进一步理解它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大有裨益。

### 一 “一国两制”构想的历史借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解决台湾和香港、澳门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提出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等原则设想，为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1949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崩溃，大量国民党军政人员逃往台湾。12月，国民党政权正式迁往台北。此后，中国便形成了国民党政权偏安台湾、与大陆新中国政权相对峙分离的局面。对于台湾问题，中共中央开始打算以武力方式乘胜解决。1949年10月和11月，人民解放军先后发起攻击金门岛和舟山登步岛的战斗，因缺乏有力的海、空军配合，严重受挫。此后，放慢了攻取台湾的步伐，转而以很大精力加紧建设和发展海、空力量。1950年5月，海南岛和舟山群岛相继解放，台湾战役进入战前准备阶段。然而，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国宣布出兵朝鲜和台湾，中共中央不得不中止了乘胜夺取台湾的计划。

朝鲜停战以后，由于美国支持法国进攻越南，对中国造成了新的威胁，中共中央没有马上重新提出解放台湾的计划。1954年7月日内瓦会议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后，毛泽东等担心美国和台湾间正在进行的关于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会导致以法律形式将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固定化，决定重新提出解放台湾的问题，以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1954年七八月间，先在政治上发起了解放台湾的宣传攻势。接着，从9月开始，又进行了炮击金门等一系列军事攻击性行动，引起了美国政府及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慌。在对国民党集团进行了沉重打击，表明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占台湾和分裂中国的决心后，鉴于攻取金门和台湾的条件尚不成熟，而且国际社会，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担心台湾海峡事态扩大会影响世界和平，中共中央适时地采取了缓和紧张局势的措施，并在英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国的促成下，从1955年8月开始，在日内瓦与美国举行了大使级会谈。会谈虽然长期没有在台湾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结果，但毕竟使双方有了一条正式的外交接触渠道，为日后两国改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前提条件。

在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1955年5月，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亚非会议情况时指出：“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

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1956年6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重申了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代表中国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7月，周恩来在接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时，又表达了与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的愿望，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毛泽东在几次会见外宾时，都提出要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还明确提出应当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我国的领土台湾。

但是，台湾国民党当局不但顽固拒绝中共的和平建议，而且，还不断派兵对大陆进行骚扰。在此情况下，为了惩罚台湾当局，打击美国的侵略，支援中东地区阿拉伯人民的反美斗争， 1958年8月23日，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突然开始猛烈炮击金门、马祖等岛。并出动海军封锁金门等岛与台湾岛之间的海上运输，使国民党的陆、海军力量遭受了很大的打击。在觉察出美国以使国民党军队放弃金门、马祖为条件换取中国政府在台湾海峡停火，企图以此将大陆和台湾分开的阴谋后，中共中央决定让金门、马祖留在台湾当局手中，并对其进行象征性的炮击，以战争状态保持海峡两岸的接触。10月6日和25日，中国政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先后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和《再告台湾同胞书》，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 中国政府用特殊的方式维护了一个中国的局面，奠定了祖国统一的政治基础。

此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些具体办法。他表示，台湾如果回归祖国，照他们（蒋介石等）自己的方式生活，水里的鱼都有地区性的，毛儿盖的鱼到别的地方就不行。但是美国不要蒋时，蒋可以来大陆，来了就是大贡献，就是美国的失败，毛泽东还请人转告台湾当局：蒋介石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蒋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他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他的一套。关于军队问题，毛泽东表示，可以保存，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后来由周恩来归纳、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包括：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由蒋决定；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由中央拨付；台湾的

---

《人民日报》1955年5月14日。

《人民日报》1956年6月29日。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四十年的回顾与思考》，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07页。

《人民日报》1958年10月6日。

《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5日。

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协商解决；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除作出上述表示外，中共中央还采取了释放国民党战犯等措施，来和缓海峡两岸的关系。但是，这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没有得到台湾当局的响应。1962年，趁大陆出现严重经济困难之机，国民党军队还在“反攻大陆”的口号下，对东南沿海地区发动了较大规模的武装袭扰，为大陆军民所击退；由于这种气氛和中国共产党党内不断发展的“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进入60年代中期以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有所减弱，“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宣传口号反而大大加强。1972年美国尼克松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由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转变为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使台湾问题的自主解决出现了一定的转机。但是，由于美国政府迟迟没有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在与台湾的关系方面采取断交、撤军和废约等措施，仍然顽固地坚持要以中国政府保证不以武力手段解决台湾问题，作为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先决条件，从而使中美建交遇到很大阻碍，台湾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香港和澳门问题则是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及强行租借过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曾宣布不承认关于香港、澳门问题的不平等条约，声明将在适当的时机收回主权。但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保留与西方交往的国际通道，暂时维持现状，没有立即收回香港和澳门的主权。1957年4月，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阐明了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政策。指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

从以上考察可以看出，在建国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共中央是打算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并为此而提出了比较现实的解决办法，对香港和澳门也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尽管这些和平统一祖国的设想有一些不完备之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不可能产生很大的作用，但为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 二 “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

“一国两制”构想的核心内容，是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美正式建交前后；在考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逐步提出的。它的提出，有着重要的背景。

一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决定和影响党和政府在内政外交等方面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的转变。为了使全党和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和国内环境。这样，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

廖心文：《1958年毛泽东决策炮击金门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第36页。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3、355页。

实现祖国统一成为党和政府的理想选择。

二是中美正式建交，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中美两国迟迟不能正式建交，主要障碍是台湾问题。1978年，卡特政府改变了过去的立场，表示愿意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的建交三原则。经过近半年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下述协议：（一）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二）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于1979年4月1日以前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完全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约》；（三）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尽管谈判中双方在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和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表明美国没有完全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打算，但中美建交毕竟消除了中国在实现国家统一问题上的最大障碍，使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有了可能。

在中美谈判建交的过程中，邓小平逐步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设想。1978年10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文艺评论家江藤淳时指出：“如果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在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比如说，美国在台湾有大量的投资，日本在那里也有大量的投资，这就是现实，我们正视这个现实”。11月14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时又指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11月27日，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邓小平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并指出，我们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美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决定正式建交，正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全会正确地估量了中美建交对中国统一进程所产生的影响，适时地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任务。全会公报指出：“全会认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全会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建设事业继续作出积极贡献。”

1979年1月1日，在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告台湾同胞书》表示：“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告台湾同胞书》还建议尽快实现通商、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工艺观摩。”同日，为了给双方的交往接触创造必要的前提

---

《邓小平等关于“一国两制”的论述选载》1978年10月—1990年9月，《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第15页。

晓晴：《“一国两制”的构想与邓小平的思想特色》，《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第25页。

《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3日。

《人民日报》，1979年1月2日。

和安全的环境，中国政府还以国防部长徐向前的名义发表声明，宣布从即日起停止对大、小金门等岛屿的炮击。

邓小平在 1979 年 1 月下旬访问美国期间，反复阐明了中国政府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方面的方针政策。他指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

“一定考虑到台湾的现实，重视台湾人民的意见，实行合情合理的政策。”

针对美国方面希望中国政府作出不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承诺这一情况，邓小平特别强调：“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当然力求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但是究竟可不可能，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承担这么一个义务：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来实现统一祖国的愿望，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反而会妨碍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个良好的愿望。”

由此可见，早在中美建交的过程中，邓小平就提出了尊重台湾的现实和现行制度、力争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一设想作为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得到了正式宣布和说明<sup>①</sup>。应该说，此时邓小平已经讲出了“一国两制”构想的核心，“一国两制”构想已基本提出。对此，邓小平曾在 1984 年 7 月同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的谈话中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而是几年以前，主要是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

### 三 “一国两制”构想的正式形成

1979 年以后，随着和平统一祖国大业的推进，特别是 1982 年开始的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不断取得进展，邓小平对“一国两制”构想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化和具体化。1984 年春夏，邓小平正式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并对其含义进行明确阐释，这标志着“一国两制”的构想正式形成。

1979 年 12 月 6 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谈话中，比较清楚地表达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他指出：“我们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要从现实情况出发。对台湾，我们的条件是很简单的，那就是，台湾的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与外国的民间关系不变，包括外国在台湾的投资、民间交往照旧。”“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可以拥有自己的自卫力量，军事力量。条件只有一条，那就是，台湾要作为中国不可分的一部分。它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拥有充分的自治权。”此后，“一国两制”的构想进一步具体化。1981 年 9 月 30 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其中，最有关键性意义的有以下四条：（一）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

---

<sup>①</sup>《人民日报》，1979 年 2 月 1 日。

<sup>②</sup>《人民日报》，1979 年 1 月 6 日。

<sup>③</sup>《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7 页。

<sup>④</sup>《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06 页。

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二）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三）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四）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

不久，在修改宪法的过程中，“一国两制”构想的核心内容又被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为1982年12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所正式通过。宪法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至此，“一国两制”构想的实质内容被法律化，为祖国和平统一提供了法律依据。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首次明确提出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后在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他指出：“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这就把“一国两制”构想实施的范围由台湾扩大到了香港。

随着和平统一祖国大业，特别是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谈判不断取得进展，邓小平对“一国两制”构想的认识越来越深化，语言表述也越来越明确。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说：“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还说：“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布热津斯基的谈话中，第一次使用了：“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提法。他说：“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4月28日，在会见美国总统里根时，邓小平又说，中国政府为解决台湾问题作了最大努力，就是在不放弃主权原则的前提下允许在一个国家内部存在两种制度。这里，邓小平又将“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提法，改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使之更具有普遍意义。5月27日和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对台工作座谈会，也重申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此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便成为党和政府解决台湾和香港、澳门问题，实现祖国统

---

参见《人民日报》，1981年10月1日。

参见《人民日报》，1982年12月4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49页。

《人民日报》，1984年4月29日。

一方针的正式的概括性语言，也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一项基本国策。

1984年6月22日和23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人时，全面阐释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他指出：“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10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至此，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正式形成。

#### 四 “一国两制”构想的继续发展

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对于党和政府确定更加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促进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解决，起到了重大作用。1982年9月开始的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于1984年9月和12月先后草签和正式签署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6年6月至1987年3月，中葡两国政府进行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于1987年4月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海峡两岸的关系也有了很大改善，特别是1987年10月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后，两岸的交流与交往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总之，和平统一祖国的实践证明了一国两制构想的成功。

在“一国两制”构想的正确性得到实践检验的同时，1984年到1987年，邓小平又在理论上进行了多次总结和阐述，进一步发展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

第一，说明了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原因。1984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指出，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是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香港问题，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台湾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只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而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要考虑到中国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中国人民能够接受，英国人民能够接受，香港人民能够接受。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香港人民不会接受，英国人民也不会接受。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即使不发生武力冲突，香港也将成为一个萧条的香港，后遗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香港。所以，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

第二，阐述了在实现祖国统一后保持香港、澳门和台湾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的根据。邓小平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说，1997年后还要保持香港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中国要真正发达起来，接近而不是说超过发达国家，那还需要30年到50年的时间。如果说在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实行开放政策，那么在下个世纪的前50年内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离开这个政策，离开了这个政策不行。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所以我们讲‘50年’，不是随随

---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8、59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03页。

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同样地，到本世纪末和下一世纪前 50 年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台湾。……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世纪前 50 年不变，那么到了后 50 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

第三，强调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把中国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视为实行“一国两制”的基本前提和首要条件，他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指出：“‘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10 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地区是 10 亿人口，台湾是近两千万，香港是 550 万，这就有个 10 亿同 2000 万和 550 万的关系问题。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 10 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他还在 1987 年 4 月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说：“‘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否则怎么能说是‘两制’呢？那就变成‘一制’了。”

第四，认为解决国际争端也可以用“一国两制”的办法。邓小平在 1984 年 10 月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说：“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他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指出：“我认为有些国际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是可能的。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争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

第五，提出解决台湾问题不能排除使用武力。邓小平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当然，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们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邓小平上述五个方面的基本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使其成为一个比较系统和完备的理论。

## 五邓小平“一国两制”的 构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版，第 101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版，第 103、219、96、68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86、87 页。

“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整个中华民族统一大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这一构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重要的深远的意义。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首次提出了在同一个国家内社会主义可以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思想；它创造了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的新模式，使香港和澳门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也为台湾问题的解决开辟了一条现实的道路；它还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新思路，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邓小平提出这个为国内外有识之士所广泛称道的创造性构想，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多方面的重要原因。综观“一国两制”构想形成、发展的过程，以下几方面因素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对此，他在1984年12月会见撒切尔夫人时也曾说过：“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如果考虑中国统一问题不从香港、澳门和台湾长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实际情况出发，那就不可能提出比较现实的能为各有关方面可能接受的统一方案。”

第二，考虑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一直把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看作是“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认为“台湾回归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在邓小平看来，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然我们可以利用国内的公有制以外的其他各种经济成份，也可以开办经济特区，大量引进、吸收国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当然也可以在长时期内更大程度上保留香港、澳门和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以便更多更好地利用它们的资金、技术、管理以及与西方的联系等多方面的优势，为大陆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因此，可以说，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是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认识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发展基本上与改革开放方针政策的深化同步，邓小平把开放政策长期不变作为论述统一后保持香港、澳门和台湾现行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的根据，也都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着眼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如何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宁，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是邓小平考虑较多的问题。1984年2月，他在会见布热津斯基等人时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是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用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方式解决台湾和香港问题，“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如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我上面讲的这类的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1984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挪威首相科勒·维洛克时还说：“为了完成现代化战略发展目标，国内条

---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0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99——

件是全国上下 10 亿人口一心一意搞建设，不受任何干扰；国际条件是要求有一个和平环境。我们是根据要有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样的原则解决香港问题，也是根据这一原则力图用香港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因此，也可以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也与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总方针紧密相关。

总之，“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为实现中国统一而提出的创造性构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这一理论体系中最有中国特色的理论。

1995 年 1 月 30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提出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八项看法和主张，使“一国两制”的构想进一步丰富和具体化，也更有现实可行性。有理由相信，“一国两制”的构想将在和平统一祖国的进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作者谢春涛：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法学博士]

# 从“战争与革命” 到“和平与发展”

柳建辉

任何政党、国家在发展对外关系时，必须对自己的国际战略有一个较长期的、全局性的宏观考虑。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曾用了很大的精力去分析、观察世界形势的变化，探索自己的外交战略方针，以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但由于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在对时代特征问题的认识上，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演变过程，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基于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逐渐对当代世界主题作出科学的概括，从而继承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 一 建国后党对时代特征 问题的认识及其曲折

总体而言，建国后党和毛泽东对时代的判断基本沿用了列宁、斯大林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提法，立足于战争与革命。然而，时代特征的某些具体内容必然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呈现出时代阶段性的特点。由于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对国际形势的客观影响，加上各国共产党人主观上对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致使中国共产党对时代特征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这期间，毛泽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提出了一些符合历史现实的战略构想，但也得出了某些与实际不符的结论，教训深刻。

（一）由于美国侵越战争的升级和中苏关系的恶化对中国形成的威胁，60年代以来党和毛泽东改变了建国前后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估计，越来越强调世界战争的不可避免。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对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标志之一，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形成与对立，以及后来逐渐形成的以美苏两大国的争霸为主要特点的两极世界格局。战后初期，两种意识形态和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与斗争，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美国称霸受到阻碍。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上升为另一超级大国。于是，美苏两霸相争成为世界局势动荡不宁的主要根源，并对中国的周边环境造成相当的威胁。新中国成立之初及此后的许多年中，面临的就是这样一幅世界时局图。

战后帝国主义的依然存在和后来美苏两国的军备竞赛，以及第三次世界大战能否发生的问题，一直为各国的政治家所瞩目。建国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更为关注，并提出自己的战争和平观。早在1946年8月，毛泽东在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提出著名的“中间地带理论”时曾认为：战后由于美苏两国隔着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美国还谈不到进攻苏联的问题，因此，当时政治斗争的中心是美国反动派与世界人民的对立，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1950年6月，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虽然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突出强调

的是：“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此后，毛泽东及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多次的谈话、讲话中，不仅指出了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但他们要打世界大战并非易事，因为世界和平民主力量在发展壮大，而且突出强调中国人民渴望和平，中国的建设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争取和平必须认清和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以两手对两手，“和平为上”，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总之，此时党和毛泽东并未对世界战争的到来作出过急过快的估计，实践上更未提出具体要求。

进入6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国际形势对中国周边环境的影响，加上主观指导上“左”的思想的发展，党和毛泽东对新的世界大战曾一度认为“迫在眉睫”。1965年7月在拟定第三个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党和毛泽东就提出要以国防建设为中心，并从应付帝国主义早打、大打出发编制规划。尤其是1969年3月苏军数次入侵珍宝岛地区的突发流血事件，更加重了党内关于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苏军对我国的大规模入侵随时可能爆发的“左”的估计。于是，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4月28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再度要求全国各地做好反侵略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准备；6月间，林彪提出“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中央军委办事组座谈会为此提出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10月17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局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在苏州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引起各方面的极大震动。

由于对国际形势的误断以及对战争危险性的估计在时间上预料过快，以致盲目地搞“山、散、洞”、“一线、二线、三线”建设，不仅耗费了大量人财物，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经济建设，而且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恶化也产生了消极作用。这种认识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峰。在此思想背景下，全党执行了一条全民皆兵，时刻准备打仗的行动路线，只讲战争、革命，在事实上忽视了和平与发展，未能抓紧利用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一心一意地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在总结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时说：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争取较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是可能的。因此，“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

（二）由于对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党和毛泽东在坚决支持民族独立的革命解放运动时，又强调推进“世界革命”，并承担了过重的国际主义义务，外交工作也受到干扰。

战后，社会主义超出一国范围，形成一个新的阵营；而帝国主义的后院则频频告急，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于是，人们认为帝国主义会从此一蹶不振，寿命难继，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日益逼近。出于这种过于乐观的预计，1961年苏联《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把当时所处的时代表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中国共产党接受了这种观点，并在60年代重新表述为“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

溃和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70年代又进一步提出：“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毛泽东在著名的《五·二 声明》中进一步断言：“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上述提法，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历史发展“大时代”的长期性、曲折性缺乏清醒的认识。

由此可见，党内“左”倾指导思想产生，不仅根源于对中国社会主义所处发展阶段的错误认识，而且还根源于对人类社会当前所处历史发展阶段的错误认识。争取民族独立的反帝民族革命，这是现实的。但在所谓战争与革命的风暴中，随时准备迎接和支援世界革命高潮的到来，希图通过推进世界革命，摧毁帝国主义，以致犯了以世界革命观念干扰外交、以备战干扰正常经济建设的错误。不顾国力实际情况，承受在物质上支援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重担，违背了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这一切，都是在中国国内经济建设陷入困境，正在进行调整和恢复中进行的。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等同志在1962年上半年，多次谈到对国际问题和调整对外方针的不同意见，并联名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信，力图纠正党内在世界战争、世界革命、民族解放运动、对外援助方面的一些片面观点。提出不要过分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而应该是“动员人民群众提高警惕，加强斗争，克服战争危险，争取实现持久和平”。对和平运动要予以适当的估价和支持，并进行某种合作。“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并且“在和平组织中，不要把民族解放运动讲得超过了和平运动”。为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方针，而不是采取加剧紧张的方针；对外援助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等等。上述建议是对“左”倾偏差的一种纠正，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建议当时并未被全党所接受。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关于当代世界主题的新结论

80年代，随着东西方国家关系的调整和殖民体系瓦解后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历史任务的完成，和平与发展实际上已经成为时代的基本特征。邓小平在80年代中期的多次谈话中，深刻指出了国际形势这一变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科学论断；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概括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新结论；十四大又将其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外部条件），纳入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中，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战略转变。

### （一）两大主题提出的主客观依据

8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标志，是世界格局出现由两

---

《人民日报》1970年5月21日。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44、445页。

极化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关注。1984年5月17日，在会见厄瓜多尔总统时，邓小平提出：“世界上最根本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个是南北问题。”5月25日，在会见巴西总统的谈话中，邓小平又重复论证上述观点，并用“和平”二字概括第一个问题。10月31日，在与缅甸总统谈话时，邓小平从全球战略的高度强调，“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1985年3月4日，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邓小平更为明确地阐述了他关于当代世界主题的观点：“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直到1992年初，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他更直截了当地告诫人们：“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党和邓小平在判断时代主题的过程中，主要是从国情和世情两个方面，得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的。主观上，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党的思想路线回到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能够立足于时代反思以往，用务实、冷静的战略眼光观察世界的新变化，摒弃以“世界革命”干扰外交的观念，对战争与革命、战争与和平等问题提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观点。同时，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邓小平提出必须创造和维护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也就是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客观上，党和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全局进行战略性判断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依据对当今国际关系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终将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仍然是我们时代的真正大趋势，列宁关于人类社会正处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没有变。但必须看到，时代特征的某些具体内容必然随着世界格局的发展而变化，呈现出时代中的阶段性特点。第二，依据对当今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和世界人民面临的战略任务的判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和历史性竞争的现实说明，在世界范围内尚不存在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形势。当今世界，战争与革命不再是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和平与发展却成了世界的两大主题。第三，依据对当今国际竞争重点变化的分析，即当今国际竞争的重点由军事领域日益转向经济技术方面。正是从这个角度，邓小平强调发展是一个战略问题。第四，依据对当今国际关系中各主要战略力量的分布和相互制约关系的分析。世界和平力量的空前发展和壮大，使制约战争的愿望成为可能，世界和平前景广阔。因此，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 （二）两大主题的基本思想内容

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是世界人民面临的两大战略问题，二者不可分割。和平是外部条件，发展则是核心问题。

1. 世界正处于和平发展时期，两大主题互相联系，共同影响着人类前途。

---

《人民日报》1984年5月28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96、105页。

首先，和平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没有和平，难有发展，而世界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又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根本。其次，和平与发展推动着世界格局的变化，直接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以及军事战略态势的均衡。再次，争取和平与发展，规定着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斗争的主要内容。

2. 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70年代，毛泽东曾指出，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是世界战争的主要危险。邓小平据此对当代世界战争根源问题进一步作出科学论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霸权主义是世界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根源。”由于战争是同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讲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别人没有资格”。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深入剖析了当今世界战争与和平力量的消长对比，认为制约战争爆发的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通过对当今世界战争策源地的剖析和维护世界和平力量现状与发展趋势的估量，邓小平明确肯定：“过去我们曾经对战争有较大的忧虑。70年代以后，我们改变了观点，发现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力量。”“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苏东剧变后，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否已经改变，世界大战的危险是否荡然无存，邓小平认为没有。因为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和平与发展问题至今一个也没解决。因此，我们仍须冷静观察，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并对不同形式、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局部战争保持应有警惕。

3. 发展问题是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人类社会走向和平与发展的根本之路，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又必须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这是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国际战略及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条件下的新发展。

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第一次提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问题，同年底，他又进一步阐述说：“目前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时期。国际政治领域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为缓和，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因此应该提出一个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理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按照邓小平的思想，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就是改变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局面，结束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绳，通过南北对话，推动世界

---

《人民日报》1979年3月1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27页。

《人民日报》1988年5月16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127页。

《人民日报》1988年12月3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

各国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以保持长期和平。这里“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改变目前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实际上的不平等经济关系；要通过南北对话，逐步建立起平等互利合作的南北关系；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国家之间的合作。1989年9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进一步明确指出：“霸权主义和集团政治已经行不通了，现在不仅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且也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解决国际政治问题和国际经济问题的准则。”事实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最好方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综合上述，国际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到80年代已集中反映在东西南北关系上。邓小平从战后的历史事实出发，审时度势，果断提出和平与发展这两大全球性战略问题，从而精辟揭示了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和主要问题，明确了新时期中国的战略任务。根据这一新的时代特征的总概括，中国共产党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出发。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适时进行了外交方针的两大战略性调整，标志着中国对外战略的重大转折：第一，从过去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转变为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因而更加强调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第二，从过去“一条线”、“两角争”，联合美、日、欧着重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政策，转变为不和任何大国结盟，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更加突出独立自主，“真正的不结盟”。在国际交往中，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而是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概言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以时代主题判断为核心内容的国际外交战略思想得到了全面的丰富和发展。

（作者柳建辉：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

## 邓小平与中美建交的历史进程

宫 力

自从 1972 年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之后，最终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任务已经提到两国政府的议事日程。虽然因台湾问题，中美尚未建交，但两国领导人都表现出要克服这一难题的诚意。1973 年 2 月，尼克松曾派基辛格访华，向中国方面表示，美国打算削减在台湾的军事力量，并准备在尼克松第二届任期的后两年用“类似日本的方式”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所谓“日本方式”就是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同台湾保持民间关系。然而，正当尼克松踌躇满志地准备实现他的宏伟目标之时，一场由“水门事件”引发的政治危机极大地损害了他的政治地位，使他再也无法兑现其在第二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诺言。水门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束缚了尼克松的手脚，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正常实施，致使来自美国方面的推动解决台湾问题的积极性逐步消失，从而加大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难度。这时，随着邓小平在中国政坛的再次复出，对美谈判的艰巨任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

1974 年 4 月，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利用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会议的机会，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讨论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但基辛格搪塞说，美国正在研究如何实现“一个中国”的设想，但尚未想出办法来。对此，棉里藏针的邓小平不失分寸地表示，中国希望这个问题能较快地解决，但也不着急，此时，处于岌岌可危地位的尼克松已失去了往日的魄力，不敢在台湾问题上迈出大的步子，因为他不希望得罪国会中那些与台湾关系密切的保守派议员，这些议员曾是他的主要支持者。不仅如此，尼克松为了避免招致那些亲台势力的攻击，还开始加强美国同台湾的关系。这包括美国有些快得异乎寻常地任命了一位高级外交官昂格尔去出任驻台北的新大使，而不是让那个大使馆由一名代办负责；允许台湾在美国开设两个新领事馆；以及向台湾再次出售潜艇和军事装备。显然，这些举动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是背道而驰的。

然而，这也没有使他的处境改善多少。到了 1974 年 8 月，尼克松不得不辞去美国总统之职。值得一提的是，尼克松当初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的时候，实力强大的右翼势力是反对这样做的。然而正是由于尼克松本人一贯以“反共”著称，他才敢于挺身而出，冒着极大的风险，推行同中国和解的政策。假定没有水门事件掀起的狂澜，以尼克松的胆识和远见，他是能够兑现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诺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尼克松的辞职对于中美早日合理解决台湾问题是一个很大的不利因素。

水门事件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是深远的，继任总统福特在其就职的时候说：“这是一个使我们的心灵感到创痛的历史时刻”。虽然福特总统上任后一再表示，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变，美国将“继续信守上海公报的原则”。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由于共和党在水门事件中大伤了元气，他所领导的政府从一开始就处在一种软弱无力的地位，根本不敢在台湾问题上有所松动。

1974年10月21日，美国新任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什飞抵北京，在谈到妨碍美国和中国最终建立外交关系的台湾问题时，他说：“就此事的紧迫性来说，就此事是否需要大大加速进行来说，我认为我们有很大的余地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考虑和这个国家的政府的考虑而定，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并不十分忙。”但他又说，我们愿意看到中美关系“继续改进，这就是我的目标”。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拖的方针，以维持中美关系的现状，构成了福特总统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

同年11月，已担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再度访华，但在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已失去了往日的热情。他在乔冠华外长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只是用最一般的词句谈到中美关系，但他强调了与中国领导人举行定期会晤的重要性。

由于周恩来此时已发现癌症住院治疗，邓小平副总理作为中方的主要代表与基辛格举行会谈。随着会谈的深入，双方的态度都变得严峻起来。基辛格提出了一大堆困难，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处境与其他国家不同：一是美国同台湾订有《共同防御条约》，二是美国国内存在着一股亲台势力。因此，基辛格表示：一、美国愿意按“日本方式”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但要在台湾设“联络处”；二、美国将在1977年撤完驻台全部美军，但还没有找到妥善解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的方案，希望中国政府声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以便美国考虑放弃美台“防御关系”。很明显，美国在台湾问题的立场比起尼克松在任时的承诺已有很大的改变。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从本质上说，这不是“日本方式”，而是“一中一台”方式，在建交问题上无非是一个“倒联络处”的方案，中国不能接受；至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根据《联合公报》的原则必须加以废除；在美国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后，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那是中国的内政，用什么方式解决也是中国人自己的事。邓小平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的坚定性，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加大，基辛格的这次访问只能是空手而回。基辛格本人也表示，他这次访问的任务也只是为了“再次肯定美国对外政策的既定方针”。事后双方发表了完全是礼节性的仅有四句话的公报，除了宣布福特总统将于1975年访华之外，什么具体的协议也没能达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由此陷入了僵局。

1977年，卡特总统上台后，开始寻找解决台湾问题的新途径。同年6月30日，他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他说他希望美国能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一项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而又仍然保证台湾人“维持和平生活”。为此，他决定派遣国务卿万斯对中国进行一次“探索性”的访问。

1977年8月23日，万斯在北京同中国外长黄华举行正式会谈。万斯说：只要我们能够寻求一个基础，不致危害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景，并能使（美国同台湾）非正式的接触得以继续，那么，总统就准备使（美中）关系正常化。上海公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因此，我们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万斯代表美国政府声明，美国同台湾的防御

---

即在北京设大使馆，在台北设联络处的方案。

《参考消息》1977年7月2日。

条约即将“终止”，美国将从台湾全部撤退其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但是万斯提出，中美建交后“必须通过一项非正式协定，让美国政府人员继续留在台湾”。万斯解释说，这种人员不具有外交人员性质，也没有国旗和政府印鉴等大使馆的特征或权利。万斯还表示，在适当的时候，美国将公开声明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希望中国不发表对美国政府声明的声明。万斯的这个方案与中方的要求仍有较大的距离，没有为中方所接受。黄华坚持中国关于中美建交的三项基本条件，并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讲话。

8月24日，中方决策人邓小平会见了万斯一行。邓小平认为万斯所阐明的美国立场，是从上海公报后退。他对万斯念了一段过去中美会谈的备忘录，指出基辛格曾承认美国欠了中国的债，并说正常化将依中国的条件实现。邓小平还提到福特总统1975年访华时曾经说，在1976年选举之后，他将处在较好的地位，可以按照日本方式来实现正常化。邓小平认为，万斯提出的所谓美国政府人员“在非正式安排下”留在台湾，是一个没有标志或大门上没有国旗的大使馆，这是中国方面所不能接受的。接着，邓小平阐明了中国的原则立场，那就是，如果要解决，干干净净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为了照顾现实，中国还可以允许保持美台间非官方的民间往来。至于台湾同中国统一的问题，还是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我们中国人民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

这次中美会谈虽然没有能够就台湾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对双方熟悉和了解对方的立场是有帮助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美国政府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作出较大让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 二

1978年春，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出现了新的转机。这首先是由于美苏关系出现了波折。苏联利用“缓和”稳定了西线，又开始向非洲渗透。继安哥拉事件之后，1977年苏联通过古巴策划建立“红海邦联”，受到抵制。苏联于心不甘又利用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在欧加登问题上的争端，推行支持埃塞俄比亚反对索马里的政策。直至出钱、出枪支持埃对索作战，终于迫使索马里军队于1978年3月从欧加登地区撤退。从此，苏联在埃塞俄比亚建立了自己的阵地。这就向美国提出一个问题：苏联利用第三世界的地区纠纷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与美国所指望的固定世界现状的缓和原则是相容的吗？由于苏联核力量有迅速增长的趋势，而在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中却没有体现出诚意，美国国内的舆论中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观点认为，苏联因“缓和”单方面获利，而美国却吃了亏，从而对美国的对苏缓和政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怀疑。这种情况促使美国政府重新关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因为，在美、中、苏战略三角关系中，虽然中国的力量最弱，但却能起到重要的“平衡”作用。为了对付苏联，美国需要再次打“中国牌”。

中国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又开始重提“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准备大量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对于美国无疑是有吸引力的。但中国优先同已建交的国家发展贸易，并与日本和欧洲

---

在这里万斯有意不用“废除”一词。

万斯：《困难的抉择》（中译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82、83页。

共同体签订了贸易协定，这对美国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作用。因为，日本和欧洲共同体在对华贸易方面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并且已经捷足先登，美国如再不采取行动，就有可能被排除在中国市场之外。据美国报刊统计，仅 1978 年上半年，欧共体向中国出口就比美国多 3 倍。面对这种局面，美国方面决心通过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来推动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

1978 年 5 月 17 日，卡特对即将访华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下达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指令：“美国的决心已下”，已经准备积极协商向前推进，消除正常化的各种障碍。卡特让布热津斯基“不妨非正式地向中国人表明，美国正在打算在今年进一步减弱它在台湾的军事存在”，最为重要的是，卡特授权布热津斯基转告中国方面，美国接受中国关于正常化的三项条件（断交、废约、撤军），并重申尼克松和福特政府以前声明的五点（1977 年布热津斯基曾敦促卡特加以重申这五点，当时没有结果）。但总统又认为，接受中国的三项基本条件并不妨碍美国坚持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美国将保留向台湾提供武器权利。卡特指示布热津斯基应当向中国申明，美国将坚持这些条件，并探讨若干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由于有了这份条件明确的指示，美国总统特使布热津斯基，于 1978 年 5 月下旬访华，向中国方面表示，中美关系是美国全球政策中的一个中心环节，美国政府已下决心要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并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与台湾断交、撤军、废约），但希望（而非作为条件）在美方作出期待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表示时，不会明显地遭到中国的反驳，这样美国国内的困难将更容易解决。对此，邓小平回答说，双方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美方接着提议，双方下个月开始就中美建交问题进行高度机密性的磋商。邓小平代表中方接受了这一建议。

从 1978 年 7 月起，中美开始在北京举行建交秘密谈判。中国方面的代表是外交部长黄华，美国方面的代表是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在谈判中，中国方面表明的基本立场是：一、台湾问题是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是美国政府派兵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干涉中国内政造成的，“解铃还需系铃人”。二、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须同台湾断交、从台湾撤军、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三、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可以同台湾继续保持民间来往，可以在台湾设立民间机构，但美国不应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四、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

美国方面的谈判策略是，逐渐表明立场，先解决一些容易达成协议的问题，然后再解决比较困难的问题。但中国方面提出要了解美国全盘的立场到底如何。于是美方陆续提出了他们的基本立场，即接受中国关于断交、撤军、废约“三点要求”，但在此基础上坚持要中国保证以下三条：一、美国在正常化时刻发表关于台湾和平解决的单方面声明中国方面不予驳斥。二、美国将在非官方基础上保留与台湾的全部经济、文化及其他关系。三、美国可以继续出售武器给台湾。

由于中美双方的立场尚有相当的距离，谈判进行得非常艰苦。黄华和伍德科克第一回合的谈判从 7 月 5 日起到 9 月上旬共进行了五次，双方的立场

---

《美中建交前后——卡特、布热津斯基和万斯的回忆》，时事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8、49 页。

谈话内容详见，《美中建交前后——卡特、布热津斯基和万斯的回忆》，时事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5、56 页，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8 章的有关部分。

都已清楚。有些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除此之外，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先后与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韩叙、柴泽民也举行了多次会谈，沟通情况，加深理解。在中美第一回合的谈判结束后，美国总统卡特于9月19日，利用中国新任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向他递交国书之际，强调了美国希望尽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愿，并希望中国谅解美国在关系正常化后，仍想经过审慎选择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的立场。卡特保证所出售武器在性质上决不会损害该地区的安定。在此前后，为了表明美国对中国的友好姿态，卡特下令采取措施放松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并转告其盟国，他们是否愿意销售军事装备给中国，是他们自己决定的事。

经过多次谈判，中美双方的立场有所接近。1978年11月初，伍德科克在与黄华的会谈中，提出了美方拟定的建交公报草稿，其中建议把1979年1月1日作为中美正式建交的日期。在这之后由于黄华外长生病，中方改由韩念龙代外长与伍德科克举行谈判。中国也提出了一份建交公报草案，其中含有同意以1979年1月1日或3月1日为正式建交日期的内容。

这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都要求中美两国领导人抓住时机，早下决断。当时由于中越关系急剧恶化，苏越又签定了同盟条约，中国已在考虑对在边境不断挑衅的越南采取惩罚性的有限反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牵制苏联，中国需要加强同美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就政治局根据邓小平建议提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为随即召开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的准备。至此，邓小平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已经巩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已如箭在弦。从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来看，中国需要加强同美国的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此前中国曾邀请一批美国大公司来华为自然资源开发，重工业建设以及石油开采等领域提出建议，表明了对美国技术和资金的兴趣。而美国也迫切希望打进具有巨大经济潜力的中国市场。这些因素都增加了中美尽早完成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决心。

在中美建交谈判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于1978年12月15日会见了美方代表伍德科克，并与他就建交公报草案进行了讨论。鉴于美国要求于1979年底按条约规定期满“自动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邓小平要求美方在该条约仍然有效的最后一年里不要再向台湾出售武器。邓小平还代表中国方面爽快地接受了卡特总统请他访问美国的正式邀请。这意味着历时半年之久的中美建交谈判终于取得了“突破”。这是中美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邓小平和卡特总统的决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1978年7月到12月，中美双方进行了近半年的艰苦谈判，最后达成以下协议：一、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二、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在1979年4月1日以前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完全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约》；三、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

从中美双方达成的协议来看，两国都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首先，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上，中国原来坚持建交前必须废约，后来体谅美方困难，同意美方在法律生效期满之时终止该项条约。第二，美方原来要求在建交之际将单方面发表声明，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而中国不要予以反驳。后来双方通过协商，决定各自都可以发表声明陈述自己的立场。中国方面后来在声明中指出：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完全是中国内政。不过中国方面也表明了愿意采取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第三，在最棘手的美国对台出售武器问题上，双方决定保留分歧。中国保留以后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权利，美方则表示相信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将会逐渐出现有利于讨论这个问题的气氛，以暗示美国对台出售武器将随着这一地区紧张局势的继续缓和而减少。

在达成上述协议的基础上，中美两国于 1978 年 12 月 16 日（美国时间 12 月 15 日），共同发表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同一天，中美两国还分别就台湾问题发表政府声明。

美国政府的声明指出：1979 年 1 月 1 日，美利坚合众国将通知台湾，结束外交关系，美国 and 中华民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也将按照条约的规定予以终止。美国政府还声明，在四个月内从台湾撤出美方余留的军事人员。“今后，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将在没有官方政府代表机构，也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保持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美国政府的这一立场，以变通的方式基本上满足了中国一再坚持的“断交、废约、撤军”的建交条件。这是值得肯定的。但美国政府声明，它将“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期望台湾问题将由中国人自己和平地加以解决”。这又为其以后再度插手台湾问题留下了一个伏笔。不过，美国政府单方面的这一声明对中国没有任何约束力。中国政府在同一天声明中对此作出了相应的回答。

中国政府的声明指出：台湾问题曾经是阻碍中美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根据上海公报的精神，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现在这个问题在中美两国之间得到了解决，从而使中美两国人民热切期望的关系正常化得以实现。至于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这段话既肯定了中美两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达成的共识，又针对美方声明“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恰当的回答。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由于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所倡导的反对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扩大了，中国的外交基础由此更加巩固，这对于遏制当时苏联的扩张势头和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起到了有力的作用，对维护和加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美关系正常化也是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中美关系从此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随着联结两国关系纽带的恢复，两国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乃至军事上的交流与合作都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全面发展。这不仅为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也为美国重整国力赢得了时间和回旋的余地。这对于中美两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979 年 1 月 1 日，随着新的一年的来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

---

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1971 年 7 月—1981 年 7 月），时事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37 页。

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1971 年 7 月—1981 年 7 月），时事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9 ~ 30 页。

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正式建立起全面的外交关系。在此前一天，台湾当局的“国旗”在数百名面色阴沉的观众面前，从台湾驻美“使馆”最后一次降落。

### 三

根据中美建交谈判时达成的协议，为了进一步巩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成果，增进两国政府之间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互相沟通，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于1979年1月29日开始对美国进行为期一周的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高级领导人第一次正式访问美国，意义重大。由于苏联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加剧，引起了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关切，遂使邓小平的这次访问远远超出了一般性的外交活动，从而成为中美之间的一次重要的战略对话。

在这次中美会谈中，双方主要就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邓小平副总理指出，今天的世界很不安宁，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第三和第二世界应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这一反霸统一战线，坦率地讲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对付苏联称霸世界，美国理所当然是一个主要力量，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在尽自己的责任方面有某些不足。苏联在世界各地扩张，特别是利用古巴在非洲插手，支持越南侵柬，没有受到应有的遏制和惩罚。结果，世界形势可以说一年比一年紧张。苏联终究是要发动战争的。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可能推迟战争爆发，如果无所作为，形势会更加复杂。我们希望同美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做各自应做的工作。卡特承认从东南亚到印度洋到非洲，许多地区形势不稳，苏联的军事力量在迅速增长，这些都是国际形势中的不利因素。他也同意中美应加强合作，在一些麻烦的地区协调行动。但是，他强调美国及其北约盟国的力量正在加强，苏联面临许多困难，在国际上处境更加孤立。中美双方还讨论了南亚、中东、印支、朝鲜以及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等问题。邓小平表示希望美国扎扎实实地援助巴基斯坦，以免巴感到孤立，走上依靠苏联的道路；在中东帮助萨达特，对以色列施加恰当的压力，以免苏联钻空子，使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伊拉克更加靠近苏联；在南朝鲜撤出全部美军，为恢复朝鲜南北谈判创造条件。对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邓小平说，我们不反对美苏签订这种协议，但我们认为它管不住苏联，不相信它会约束苏联的扩张政策。重要的是要做扎扎实实的工作，这就是说，中、美、日、西欧以及第三世界要联合起来，破坏苏联的战略计划。

关于台湾问题，邓小平在会谈中和许多不同场合，反复阐明中国的愿望是力求和平解决，但是声明中国决不能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邓小平说，如果我们束缚自己的手脚，反而会不利于台湾与大陆的和平统一。邓小平希望美国不要做使台湾当局翘尾巴的事。

中美会谈的结果表明，双方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看法比较接近，特别是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扩张方面具有共同点。而这恰好是中美之间进一步发展关系的基础。与此同时，由于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以及在世界政治中的出发点不同，中美两国在处理国际关系，包括对苏联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又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这是正常的，对此，中美双方采取了求同存异的态度。在中美建交后的台湾问题上，邓小平所阐明的中国政府的立场合情合理，

解除了一些美国人对所谓中国坚持“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疑虑，同时也剥夺了亲台势力对此大作文章的借口，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当然，中美之间关于台湾问题还有分歧，要使美国真正尊重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还需要经过不断的斗争。

邓小平访美的目的除了同卡特总统就紧迫的国际局势交换意见之外，就是要全面推进中美的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为中国刚刚兴起的改革开放事业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1月30日邓小平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等团体举行的招待会上指出，中美建交“为促进中美人民的了解和接近，为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开辟了新的广阔的前景。今天，中国正在加快现代化建设。我们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对于双方都有好处。”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在访问期间，邓小平副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卡特总统代表美国政府签署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方毅副总理、普雷斯总统科学顾问签署了两国在教育、农业、空间方面的合作的谅解的换文。方毅副总理、施莱辛格能源部长签署了两国在高能物理方面的合作协议。黄华外长、万斯国务卿签署了关于建立领事关系互派和互设总领馆的协议。中美双方还同意为互派常驻新闻记者提供方便；并同意签订贸易、航空、海运协定，双方将就此进行商谈。这些协定的签订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有利于美国加强同中国的交流，它们是中美之间30年来签订的第一批政府对政府的协定，标志着中美之间的合作展开了一个新的时代。

（作者宫力：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法学博士）

## 邓小平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战略思考与实践

王红续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香港问题采取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始终没有把解决香港问题提上日程。但是，直到逝世前几年，他还惦记着这件事。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于是就把收回香港的历史任务交给比他和周恩来年轻的人来完成。在1974年5月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毛泽东曾有意让邓小平担负起这项使命。当时邓小平复出不久，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在欢迎希思的宴会上曾侧面谈到香港问题，表示在将来的适当时候解决它。

从1979年起，中英两国政府开始了解决这一长期遗留问题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的每一阶段，邓小平都给予了精心的战略指导，对香港问题的顺利解决，作出了最杰出的贡献。

### 一从战略全局角度考虑香港问题

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是大战略家。两位伟人都具有非凡的战略眼光，处理任何问题都着眼全局，决不就事论事、走一步看一步。他们在处理香港问题时，从国际战略全局和国内经济建设全局出发，眼光远大，堪称外交战略的大手笔。

建国前后，中共领导人否认英国强加的不平等条约，把收回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坚定不移的原则立场。但新中国把它作为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一方面始终强调自己对香港的主权，另一方面又在收回对它的主权的实施步骤与方法上，采取灵活机动的态度，采取了保持现状、长期打算的方针。毛泽东、周恩来关于香港问题的战略，正是通观外交战略全局、中英关系全局以及新中国经济建设全局后下的一着妙棋。

首先，保持香港的现状，可以利用和扩大英美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努力克服冷战环境下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政治孤立、军事包围的企图。英国很快承认新中国，主要是为了保全在香港的利益，保存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殖民地位。香港是大英帝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在这个范围内，美国和英国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因此，在对华政策上也有极大的分歧和矛盾。美国要蚕食英国在远东的政治经济势力范围，英国要力保大英帝国的余辉。那么，保住香港，维持对中国的外交关系是英国在远东的战略要着。与英国企图促使中国与苏联拉开距离、利用两个共产党大国间的矛盾分歧的策略一样，毛泽东、周恩来也充分利用英国与美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以便分化西方阵营，保持中国在东西方阵营中的有利地位。为达到这一战略目的，重要的一着，就是把香港留在英国手中。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中国反而主动。可以通过香港抓住英国，使其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部署跟得太紧，靠得太拢。这样中国就可以扩大和利用英美在远东问题上对华政策的矛盾。可见，毛泽东制定的对港政策是全局战略部署的一部分。

其次，保持香港的现状，避免了中英矛盾的激化。英国历来极其重视香港，把维护自己在香港的统治作为一个坚定不移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前，它

决定“不借一切代价保卫香港”。五六十年代，英国的殖民地纷纷独立，但英国依然决心保住香港，甚至认为香港永远属于英帝国。1960年5月23日，英国著名元帅蒙哥马利访华途经香港。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及香港地位问题时曾顽固他说：“香港地位并不是可以讨论的问题，香港为英帝国的一部分，与中国无关；如果任何人企图侵犯香港，我敢保证将引起战争”。1967年以后，英国决定从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撤退，将其防卫力量集中于欧洲和北大西洋，但对香港的政策维持不变，英国的大臣们仍然不断重申维护英国在香港的权力的决心。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香港，必然导致中英之间激烈的军事冲突。虽然中国可以凭武力收回香港，但会使英国变成像美国那样的新中国的死对头。维持香港现状，使这个本来会变成中英关系热点的问题平淡下来，避免了中英公开冲突，有利于安定人心，保持与英国的对话关系，为重建中英关系创造了良好的气氛。

再次，保持香港现状，充分利用它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局作出了独特的贡献。50年代到60年代末，中国在国际上遇到严重的经济封锁与军事压力，香港作为中国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的渠道，开展进出口贸易的窗口，沟通中外民间（包括同海外华侨）往来的桥梁，其作用无可替代。中国通过香港取得所需的西方的商品，更重要的是，可以从香港取得巨大的贸易外汇和非贸易外汇。建国以后，中国外贸逆差的很大部分都是靠从香港取得的外汇弥补的。据估计，如果没有内地与香港的贸易所带来的收益，中国外贸逆差将增加一倍。中国利用从对港贸易赚取的外汇，以供进口西方的机械、仪器、原料、科技乃至谷物。周恩来谈到这一点时说，中国大陆“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所以“保持和扩展香港这个阵地有好处”。因此，采取搁置香港问题的政策，对保持和扩展香港这个特殊阵地，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和禁运，促进国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中国不仅充分利用了香港的经济价值，而且利用这个自由港的特殊条件，做了许多在国内不能做或不方便做的事情。可以通过它与未建交国家和地区发生多方面关系，包括同台湾进行联系。香港成了中国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成了中国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

邓小平在处理解决香港问题的战略和实践的过程中，也是把它置于国际战略、祖国统一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之中考虑的。1980年1月，邓小平提出80年代主要做三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件事就是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件事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他将香港问题与这三件大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香港问题与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紧密相联。他要通过妥善处理香港问题，来显示中国要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议热点。中国要通过成功地解决香港问题，既收回主权，又照顾英国的特殊利益，使之成为中英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在处理香港问题时也充分照顾其他国家在港投资和贸易利益，这又为发展与这些国家的良好关系提供了新的共同点。“一国两制”

---

卡特伦：《中国与香港（1945—1967）》，美国哈佛大学1971年博士论文，第104页。

李宏：《香港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页。

《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2、354页。

政策及其在香港问题上的成功运用，获得了世界各国的一致好评，大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

中国进入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后，香港的作用不但没有降低，相反更加重要了。邓小平非常重视香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他后来解释中国承诺香港现行制度在回归祖国后 50 年不变的根据时说，“五十年不变不是为了安定香港人心，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发展战略所需要的时间是下个世纪五十年。现在不仅有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他在另一个场合又说：“五十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五十年不变，这是同中国需要五、六十年才能实现现代化联系起来考虑的。”可见，香港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是多么重要，二者的关系，密不可分。

邓小平是从中国统一这个全局出发，通盘构思解决台湾、香港以及澳门问题的。因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针是一致的，都是采用回归祖国、保持现状的现实主义灵活政策，实质上就是后来明确表述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战略。1979 年 1 月 18 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特别任务小组议员团时说，台湾回归后，首先它的社会制度不变，它的生活方式不变。他接着指出，我们对待香港问题、澳门问题的政策也是如此。“中国人考虑问题总是从整个角度，政治的角度来考虑的”。当然，台湾回归与港澳回归之间具有很大的区别。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纯粹中国内政问题，后者则涉及到中英、中葡两国关系。

邓小平虽然把台港澳问题统筹考虑，但并没有把它们等量齐观。台湾回归，一直被当作三者之中最重要的，香港问题排在第二位。因此，中国对台政策支配着对港澳的政策。同时，邓小平又实行“中间突破”，把妥善解决香港问题作为顺利解决澳门和台湾问题的先导和典范。他意识到，解决台湾问题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邓小平在中英联合声明草签后说，国家的统一，从解决香港问题做起，现在已经走了重要的一步。香港问题的解决会直接影响到台湾问题。他告诉参加国庆观礼的港澳同胞，1997 年以后，台湾在香港的机构仍然可以存在，他们可以宣传“三民主义”，也可以骂共产党。但是在行动上要注意，不能在香港制造混乱，不能搞“两个中国”。

有一个外国人间邓小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是不是同对香港的一样？他回答说：更宽。所谓更宽，就是除了解决香港问题的这些政策可以用于台湾以外，还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但是，在解决台湾问题方式上，中国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但是始终不作放弃非和平方式的承诺，不能排除使用武力。“这是一种战略考虑”。邓小平还指出，“解决香港问题的经验如果用于台湾，将对大家都有利，对美国也有利”。“解决了台湾问题，中美之间的阴影也将消除”。香港问题的谈判解决，更为中葡两国顺利解决澳门问题提供了榜样。中国在解决香港问题上取得了意义远远超出问题本身的全局性战略胜利。

总之，在邓小平胸怀的全局里，香港问题被摆在了一个绝妙的位置，成为一着内联现代化建设、外接国际关系、打通祖国统一道路的活棋。

---

《邓小平论祖国统一》，团结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6 页。

《邓小平论祖国统一》，团结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0、34、39，47 页。

## 二回应英方的试探，稳定 投资者的信心

随着“新界”租期日益临近届满，从70年代中开始，人们尤其是香港的投资者对香港前途问题越来越关注。因为到了1997年新界租约期满，香港将回归祖国，所以投资者都作尽快归本的打算，而对于长期性的投资没有兴趣。到了70年代末，香港的前途仍然不明朗，中外投资者更加持观望态度。地产业的投资者受影响最大。依照英国的法律，香港所有土地，都属于英国皇室所有。居民想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必须向港英政府提出申请，并支付一定的偿金，政府才按一定年限批给土地。由于“新界”是租借地，其土地的批给年限就要受租借期的脑制，一般是批到租借期届满前三天，即1997年6月27日为止。由于批地年限越来越短，而土地投资通常需要较长年限才能获益，所以中外投资者愈来愈裹足不前。

批地收入是港英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投资者的观望心理和行为，使政府财政收入大为减少，同时也对香港整个经济的发展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这种情况引起了英国政府的重视。在与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商讨之后，英国政府得出结论：“情况很清楚，由于批地租期日益缩短，香港政府无法批出跨越1997年的土地，很可能阻碍投资，损害人们的信心……如果不采取措施来缓解1997这个年限带来的不明朗性，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就会开始出现信心迅速崩溃的后果”。了解中国政府对于“新界”租借届满究竟采取何种态度，进而与中方谈判以达成协议，是解决1997年带来的不明朗性的唯一途径。英国政府决定采取各种方法试探中国领导人在香港问题上的政策。

1978年12月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访问香港时，向港督发出了邀请。李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式访问香港的第一位部级官员。李强对香港大实业家们说，希望他们“帮助加快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计划”。在总督府记者招待会上，李强向世界银行家们宣布，中国“需要几百亿美元的外汇来支持实现现代化计划，香港这方面会发挥作用的”。他在总督府午宴上邀请麦理浩访问北京。李强返京后，又向港督发出正式邀请书。麦理浩欣然应允。

1979年初，英国外交部研究了麦理浩访京试探中国的几种方案，以及中国领导人可能作出的回答，英国政府认为，最好的结果是中国表示同意可以由英国在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港；如果中国1979或1982年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也许是最坏的事情；但最糟糕的局面，是中国政府拒绝讨论香港前途问题，而在1997年甚至1996年突然宣布让英国人滚蛋。英国在香港的管治是成功的，香港也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英国至少应该有条不紊地、光荣地撤出这块模范殖民地。同时，英国还有个想法，就是希望采取澳门形式，因为葡萄牙想把澳门交还给中国，中国不仅没有接受，还请他们再管一个时候，所以，英国想同中国“续约”。在访问北京之前，麦理浩曾对向邓小平提出香港问题的意义表示怀疑，他认为一旦得到否定性的回答并被公诸与众，后果将是“危险的”。当时的外交大臣戴维·欧文马上告诉麦理浩，他计划4月访问北京，准备同中国领导人讨论香港前途问题，争取与中国达成让英国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港的协议，因此希望总督

对北京的访问能起某种探路的作用。然而，英国外交部最终下的指令是，麦理浩访问北京时不直接试探中国领导人对香港前途问题的态度，而仅仅提出新界的土地租期问题，也就是只提出一个商业性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并强调英国此时不想谈 1997 年之后英国的管治问题，而只是试图从香港的利益出发促进对其长期的投资。麦理浩还询问，是否土地租约的 1997 年 6 月 27 日的到期日可以由“英国管治这个地区的期限内”有效的声明来代替。确定港督访华试探中方关于香港问题态度的策略后，英国外交部又要求对访京的内容绝对保密，以便防止万一邓小平否定英方的要求给香港带来严重后果。

1979 年 3 月 24 日，麦理浩离开香港，经广州于 26 日到达北京。随行的有港督夫人、港督政治顾问魏德巍（即以后的港督卫奕信）和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简悦强。在北京的前两天，麦理浩的活动包括会见康世恩副总理、宴请中国外贸部部长李强等，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举行了欢迎港督的宴会。

麦理浩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根据《拓展香港界址专条》，英国租借新界为 99 年，将期满，英国希望中国 97 年以后继续租让。”外交部对此没有一点准备，请示中央后，才答复他说：“中国要收回香港。”3 月 28 日晚，中方通知说，次日邓小平副总理将会见港督，并希望他会见邓小平时，不要向邓小平提出这一问题。

第二天上午 10 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麦理浩一行，李强和港澳办公室主任廖承志也在场陪同。出乎港督意料的是，寒暄之后，邓小平就直截了当地谈起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态度。他说：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将来谈判解决香港问题时，前提是香港系中国的一部分。但我们将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来处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而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希望麦理浩鼓励香港实业家到大陆投资，特别要帮助发展深圳，使深圳变成一个大城市。他再次申明，即使香港回归祖国，它仍然享有特殊地位。中国尚未决定何时恢复对香港的主权，也许 1997 年前收回，也许下个世纪才采取行动。但不管中国如何决定，香港都会保持现状，投资者的利益都将受到保护。

此时，麦理浩趁机提出英方关于土地租期问题的方案。他对邓说，1997 年的逼近使英国只能批出日益缩短的土地契约，新界的投资者因而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他提出英国解决这个似乎是纯商业性质问题的方案：消除土地契约中 1997 届满日期，代之以“只要英国管治这个地区”就有效的办法。

邓小平没有正面回答英方提出的这个老谋深算的问题。他机智他说，告诉投资者“放心好了”。

麦理浩并不死心，继续提出英国的方案。他说，虽然邓副总理的保证值得欢迎，但这并没有解除人们由于土地租期日益缩短而产生的忧虑；要消除这种忧虑，就得消除 1997 这个截止期限。

邓小平对港督的再次挑战作了更加深思熟虑和字斟句酌的回答。他说：不管怎么去说土地租期，但必须避免提及“英国的管治”。说未来的香港“将保持不变”，并不是指其政治状况，而只是指未来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将保持不变，同时投资者不受损害。

港督与邓小平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虽然英方没达到预期目标，但至少

从邓小平的谈话中得到了中国政府关于香港经济前途的极其重要的保证。回到英国驻华使馆后，麦理浩看到来自伦敦的电报，送来不好的消息：工党在英国下院选举中受挫，外交大臣欧文取消4月份访问北京的原定计划。当天下午，麦理浩会见中国外交部长黄华，黄华说，向邓小平提出土地租期问题是“不合适的”。总督则认为这个问题必须提出，中方应该给予明确回答。黄华外长说，邓小平的保证就足够了。晚上，麦理浩会见廖承志，没有获得新的信息。

3月30日，麦理浩一行离京去西安、兰州。4月4日，港督乘坐第一班穗港直通客车从广州返回香港。6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这是一次友好访问，并非为了谈判或草拟协定，而是为了通过接触获得一个概括印象：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香港在中国现代化计划里将担任何种角色，以及这种计划又可能怎样影响本港。至于香港前途问题，邓小平副总理郑重其事地“叫香港的投资者放心”。

港督访问北京带回来的讯息，在香港引起了良好的反应。各报迅速以头版头条报道麦理浩访华的结果。中外投资者的信心大增。1979年香港民用楼宇的平均价格上升幅度达到67%，1980年又上升30%。恒生指数1979—1980年间几乎翻了一番。

1979年6月13日，英国下议院就麦理浩访华一事辩论时，工党议员马丁询问，麦督访问北京时是否讨论过香港这个时代错误的产物，1997年是否归还中国？外交及联邦事务大臣布雷克回答时强调，香港并非时代错误的产物，而是一个成功的典范。他还说，麦理浩这次不是为谈判香港问题而访华，因为这并非讨论香港问题的适当时机。

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在这年秋天访问英国时，再次谈到中国关于香港问题的立场。10月7日，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北京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香港前途问题可以由北京和伦敦通过磋商解决。中国会考虑香港投资者的利益。北京对1997年后香港的现状能否保持的问题，立场是“非常明确”的，租约虽然到1997年才告届满，但中国早已不再承认此项租约。10月28日，华国锋偕同外交部长黄华等到达伦敦，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华国锋在与撒切尔夫人举行的会谈中也提到香港前途问题，双方均同意维持香港的繁荣和安定。11月2日，黄华外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就关于香港的投资问题回答说，新界1997年到期，现在还有时间。中国的根本态度是：在将来解决新界问题时，要考虑到投资者的利益不受损害。他还透露，昨天在中英双方的会谈中也涉及这个问题。双方同意就这个问题保持接触。华国锋关于香港问题的表态并没有超出邓小平3月对麦理浩的承诺。

这年12月，黄华在伦敦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时，仍然称邓小平3月作出的关于香港问题的“权威性表态”足矣。1980年5月英国前首相卡拉汉访问中国，会晤邓小平和华国锋。他曾提出中英就香港问题展开讨论，但发现中国对此问题并不着急，更不将它当作迫切问题而列入优先处理及解决的议事日程之中。卡拉汉印象是，中国有许多内部重要问题比香港的前途更具有燃眉之急的意义，需要全力应付。1980年8月初，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大臣布雷克访问北京，又与华国锋和邓小平讨论了1997问题，并提及香港

---

李宏：《香港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46、147页。

《人民日报》1979年11月4日。

政制改革及前途。但布雷克没有得到进一步的信息。

1981年3月10日，港督麦理浩在伦敦会晤外交大臣卡林顿时说，英国新国籍法已使香港产生一连串恐慌浪潮。他促请英国政府从速处理香港新界租约问题，以挽回投资者的信心。卡林顿很重视麦理浩的建议，不久即飞赴北京，与中国领导人讨论香港问题。

邓小平4月3日会见卡林顿。这位外交大臣告诉邓：我来前在香港逗留了两三天，离开时我有一个感觉，因为我们英国是依靠法律办事的，也许有点过分，所以尽管你作出保证，1997年这个日子仍使香港的人感到不安。你和我都认为这种担心不必要，但事实是，由于1997年这个日子日益逼近，人们签订房地产契约和抵押契约时，必须要考虑期限和合同合法性问题，这将会碰到不少困难。我不想夸大这个问题，但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利的。我曾经向黄华副总理提议过，我们双方是否可以就此问题进行讨论，提出一些建议。我们将认真考虑中国在这方面的明显利益和重要立场。邓小平说：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说更多的话，但我们可以郑重他说，我在1979年同麦理浩爵士谈话时所作的保证，是中国政府正式的立场，是可以信赖的。你可以告诉香港的投资者，放心好了。至于其他的话，现在不能说的更多。不能说别的，我们要考虑中国有10亿人民。卡林顿表示：我可以澄清这一点，英国政府和我本人对你所作的权威性的保证毫不怀疑。我们要求中国政府仔细考虑香港难于捉摸的舆论。邓小平不愿继续探讨此问题，就坚决地回答道：“我们了解这一点。但我们不能说更多的话，已经说得不少了”。外交大臣只得作罢，调转话题，同邓小平谈起中英双边关系中的其他问题。

至此，尽管英方多次试探中国政府的态度，所得的信息仍然没有越出邓小平1979年3月与麦理浩谈话的范围。显然，从1979年至1981年间，中国政府没有把解决香港问题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因为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方面，都有更为重大更加急迫的问题需要处理。内政方面如调整中央领导班子，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和对毛泽东的评价，拨乱反正，调整国民经济等；外交方面如对越自卫反击战，发展与西欧的关系，中美关于台湾问题的纠纷，开始中苏谈判等。只有在完全或部分解决这些关系中国前途命运或外交全局性问题之后，中国政府才可能腾出手来处理香港问题。英国政府继续试探中国对待香港问题方针的新发展。

1982年1月4日至8日，英国副外交大臣兼掌玺大臣艾金斯访问中国，会见了赵紫阳总理、姬鹏飞副总理和张灿明副外长等。艾金斯发现，中国开始把解决香港前途问题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并提出了处理香港问题的进一步政策。赵紫阳对艾金斯说，中国将收回对香港的主权，但保持香港的繁荣。香港继续保持自由港和商业、金融中心的地位。赵告诉掌玺大臣，中国打算与香港各界讨论香港问题，考虑港人的意见来修改自己的方案。

英国获得了中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新态度后，立即决定当年秋撒切尔夫人访华与中国领导人讨论解决香港前途问题。为慎重起见，英国政府又请邓小平的老朋友、前首相希思专程访问中国，进一步了解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

1982年4月6日，邓小平会见了老朋友。希思回顾了1974年5月毛泽东同他会见的情景，对邓小平说：“那次你也在座，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反正要到1997年，还早哪，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现在离1997年只有15

年的时间，你是如何考虑在这期间处理这个问题？”邓小平回答道，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包括新界，即整个香港，过去是不平等条约，实际上是废除的问题。他十分诚恳地告诉希思：“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如中国到时不把香港的主权收回来，我们这些领导人谁也交不了账。”

邓小平还向老朋友透露：中国政府已经确定了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这些政策与中国对台湾的“九条”方针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他问希思，英国是否同意按中国的这种路线来协商解决香港问题。邓小平还请希思把中国的这种考虑转告撒切尔夫人。

希思提到如何维持香港投资者信心的问题。邓小平对他说，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自己管理香港。

希思回国后，向英国首相转达了邓小平的话。

### 三提出用“一国两制”方式 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

中国政府多次阐明自己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即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对于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之前暂时维持现状。1972年3月8日，按照中共中央指示，黄华致信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主席，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香港、澳门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中国政府主张，在条件成熟时，用适当的方式和平解决港澳问题，在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联合国大会于当年11月批准了中国的要求，把香港和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删除。不承认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就可以从法律上堵塞将来香港独立的路，为它回归祖国奠定基础。

新中国领导人对香港未来的政治前途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都作了明确回答。至于香港回归祖国之后将实行什么制度，他们并没有给予明确说明。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对香港的经济制度发表了值得注意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周恩来的观点是“一国两制”构想的萌芽。但是，仔细阅读这篇讲话，我们认为这个评价似乎过高。

周恩来确实提出，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要采取同内地不一样的政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但他在这里并没有设想将来收回香港的主权后，也让这个地区实行与内地不同的制度和生活方式。

周恩来这次讲话的背景，是大陆已经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私营企业已经全部公私合营。那么，对我们在香港建立的企业是否也要进行社会主义

---

刘金田：《邓小平与希思》，载《世纪风采》，1996年第3期。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有关文献资料选编》，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版，第61、62页。

见晓晴：《“一国两制”的构想与邓小平的思想特色》，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改造呢？他正是就这个政策性问题的明确回答。他指出：“因为香港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对大陆在香港的企业不去变动它。但过去已经公私合营的，如南洋烟厂，再转回私营也不必要。没有合营的不要合营，否则在原料、市场、销路上反而吃亏。周恩来还认为，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它是个自由港，原料来的容易，联系的范围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

所以，周恩来在这篇讲话中宣布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不一样，首先是说只要香港还在英国的统治之下，那儿就只能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其次，特别指出大陆在香港的企业应该适应那里的资本主义环境，不要学内地。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政策，目的是为了在经济上充分利用香港。周恩来并没有去设想收回香港后我们是否仍然让它保存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他在这里显示出的务实态度，却可以给后人以很深的教益。人们可以沿着他的思路，大胆设想收回香港后也保留那儿原来的经济制度，以达到既有利于香港的继续繁荣稳定又有利于大陆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长远目的。

总之，毛泽东、周恩来制定的对港政策，虽然是以充分利用香港为宗旨，但也对将来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设想和原则。主要包括：1. 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国，英国占据是非法的，因此，香港不是英国的殖民地，这就是“一国”原则，即收回主权；2. 未来采取和平方式，也就是通过双方谈判来解决香港问题。可见，新中国领导人对香港未来的政治前途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都作了明确回答。毛泽东、周恩来在香港政策上的遗产，特别是他们长期保持香港现状以使多方受益的现实主义灵活政策，也为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战略铺平了道路。

1978年中共中央恢复和加强了对台湾和港澳工作。1月底，中央对台工作小组提出了对台工作的建议。8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港澳工作预备会议的报告》批示认为：开展港澳工作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工作都要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不能照搬内地的做法，要解放思想，大胆放手，多想办法，加快步伐，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港澳小组，协助中央掌管港澳工作。年底，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成立，廖承志为主任，主要研究香港政策问题，作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对香港大政方针的参谋部门。

“一国两制”方针是在1978年底和1979年初初露端倪的。但这个方针的要点首先是针对台湾回归祖国问题提出的。1978年下半年，在中美建交谈判中，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开始形成。邓小平1978年10月8日会见日本文艺评论家江藤淳时说：如果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在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比如说，美国在台湾有大量的投资，日本在那里也有大量的投资，这就是现实，我们正视这个现实。11月14日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时，邓小平也表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譬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1979年1月18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特别任务小组议员团时，又重申台湾回归后，首

---

《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2、354页。

《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第15页。

先它的社会制度不变，它的生活方式不变。他接着指出，我们对待香港问题、澳门问题的政策也是如此。邓小平在此提出的方针，实质上就是后来明确表述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战略。

在1979年3月会见港督麦理浩时，邓小平已经非常明确地宣布了解决香港前途问题中方构想的两大支柱：主权收回；但以允许香港在回归祖国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搞它的资本主义，而大陆搞自己的社会主义，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受到保护。这正是“一国两制”的构想。此后，中央根据这个基本构想，在内部逐步酝酿体现这一战略的具体方针政策。

80年代初，中国政府加快了统一祖国的步伐。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发表《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提出了九条政策，如台湾回归后，“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区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等等。对台政策系统化，加速了中国政府制定一系列香港政策的进程。

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廖承志等会见了十几位香港各方面人士，广泛听取意见，同时国务院港澳办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等有关单位配合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最后在廖承志主持下，起草了十二条基本方针政策（简称“十二条”）。“十二条”体现了两条基本原则：香港问题必须和平解决，解决香港问题必须坚持两条原则：第一，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这是主要的，这不能再晚了，否则中国政府将无法向历史、向人民交代，中国在国际上的伟大形象也将受到损害。第二，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要尽可能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保持它在经济上的地位和作用。这条原则十分重要。因为要收回香港主权，就要尽可能使它对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致于被搞成个烂摊子，变成死港，结果背回一个包袱。当时的一位领导人曾经说，香港“经济上不能垮。（万一）垮了，这个包袱太大，我们背不了。”当时有人计算了一下，香港年收入360亿港元，支出300多亿，按当时汇率计算，港府的支出相当于人民币100亿左右。假如香港经济垮了，中央不大可能拿出这么巨大一笔钱来支持香港政府。因此，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极其重要。

要实现这两条原则，就必须按“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式，采取一系列特殊政策。这些特殊政策的要点是：

第一，1997年后，香港在中国的主权管辖下高度自治，由香港当地人自己管理。收回香港以后，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除国防、外交由中央政府负责外，享有高度的自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财政独立，财政收入不上缴中央，中央政府不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征税。香港特别行政区还有一定的外事权，它可以进行经济、文化、体育、旅游等方面的对外谈判，签署有关的双边或多边协议。中央政府还授权特别行政区政府签发出入香港的旅行证件。

第二，恢复行使主权后，香港原来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

本不变。香港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私人财产受法律保护。居民还可以像过去一样生活。香港特别行政区仍为自由港和独立的关税地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仍然要保持。港币照常流通，自由兑换。继续开放外汇、黄金、证券、期货市场，保障资金进出自由。

第三，照顾英国和英资财团在香港的利益。英国在香港有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英资财团掌握着香港的经济命脉。要照顾他们的利益，使英国和英资财团感到在香港仍有利可图，有同中国合作、共同保持香港稳定繁荣的需要和愿望。恢复行使主权后，英籍的一般公务、警政人员可同中国籍人员一样，予以留用，薪金、津贴照旧。还可以聘请英国人担任顾问，或某些高级职务（最高可到副司级）。当然，他们只能以个人身份受聘，并且只能对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而不能由英国政府派出或对英国政府负责。特别行政区政府授权汇丰、渣打银行继续参与港币发行。

邓小平反复申明，在恢复行使主权后，上述对香港的特殊政策，50年不变。有的人提出，讲“50年不变”，时间太长了，不可以提短一点吗？邓小平说：“规定50年不变可以使香港人放心，减少他们的疑虑”。“使人们更加看到我们政策的可靠性和连续性，有利于和英国谈判，有利于收回主权，保持繁荣”。

1984年12月19日下午，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曾经问他，为什么“一国两制”政策要保持50年不变呢？邓小平回答说，之所以在1997年后还要保持香港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其根据是中国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和要在下个世纪中叶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宏伟目标。“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撒切尔首相感到，邓小平从中国自身利益出发谈保持香港制度不变和繁荣稳定，确实是可信的，是现实主义的。

的确如此，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并非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的政策。它是从中国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考虑了香港的历史和现状后制订的，是实事求是和合情合理的。这些政策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表现了极大的灵活性。既坚持了主权原则，又照顾到香港人民的愿望，同时适当照顾了英国和其他国家在香港的利益，条件是十分宽大的，实际上是一种赎买政策。这是可以为三方面所接受的、切实可行的正确政策。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香港，就做不到各方面都能接受。勉强接受了，也只能会造成一个混乱的、萧条的香港，这不是人们所希望看到的香港。总之，“一国两制”是唯一现实可行的战略选择。

#### 四坚持主权不容讨论的原则

英国决策者在不断试探中方态度，了解和咨询各方面包括港人在内的看法的过程中，也形成了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立场。以及与中国政府谈判的策略。

在香港前途问题上，中国的最高决策人是邓小平，英国的最后拍板者则是首相撒切尔夫人，她以态度强硬、决策果断甚而颇带个人专断作风而著称。

---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03页；玛格丽特·撒切尔：《唐宁街的岁月》，纽约：哈珀考林斯出版公司，1993年英文版，第493、494页。

在香港前途问题上，她虽然征询下属的意见，但有自己的立场。在处理殖民地问题上，她像当年的丘吉尔一样，坚持强硬立场，要竭尽全力维护英国的海外殖民利益。爆发于1982年春的英阿马岛之战，典型地反映了撒切尔夫人的这一特点。为了夺回这个居民不足一千人的群岛，英国出动舰船百艘，参战兵力达3.5万人，耗资7亿英镑，终于在6月14日迫使阿军宣布投降。

在香港前途问题上，撒切尔夫人当然不会像对付阿根廷那样对待中国，但也决不会轻易接受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提出的构想，同意在1997年交回香港主权。她是“以好斗的、不合作的精神”处理这个问题的。也就是说，她决心把中英谈判当作一场硬仗，只有在经过一系列顽强的抵抗失利后，才可以“在主权问题上作出某些让步”。况且，她还自认为手中有几张可以同中国对手讨价还价的硬牌，比如所谓香港的“民意牌”，“信心牌”等。

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她的丈夫丹尼斯·撒切尔、港督尤德、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首相首席私人秘书巴特勒、贸易部副次官格雷等陪同下，从日本抵达北京。

第二天，撒切尔夫人与赵紫阳主要围绕香港问题展开了会谈。英国首相用一份事先拟好的声明首先阐述英国的立场。她说：“香港是中英良好合作的无与伦比的典范。我注意到，中国观点的两个主要因素是关于主权和香港继续繁荣。繁荣依赖信心。如果香港的行政控制发生剧烈变化或者甚至现在宣布这一点，将必然导致资金整个外流。英国决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但是我们无法防止它。香港的崩溃对我们两国都是不光彩的。信心和繁荣依赖于英国的管理。如果我们两国政府能就未来香港管理的安排达成一致意见；如果这些安排可行并能维持这块殖民地人民的信心；而且如果它们使英国国会感到满意，那时我们就将考虑主权问题”。撒切尔夫人自认为她这番话可行和现实，因而具有说服力。资本主义的香港毕竟给中国带来了大量外汇和投资。她对赵紫阳说：我们应该达成一个在相当程度上不具备约束力的官方联合声明，表示我们共同目标是维护香港的繁荣，并且规定双方最初的官方谈判将围绕这个问题进行。她还始终坚持：“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在国际上仍然有效，任何修订应以三个条约为根据”。撒切尔夫人这篇讲话软硬兼施，颇有先发制人的味道。既赞扬中英在香港的合作，表示“关注”中国的立场；同时又强调港人的信心和香港的繁荣全仗着英国的管治；并威胁如果中国宣布收回香港主权，则香港必然崩溃。她抓住中国诚心维护香港繁荣稳定这一点大为利用，企图说服中国领导人，要做到这一条，最终得放弃主权原则。

中国总理坚决驳斥英国的错误立场，在主权问题上毫不妥协。他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收回整个香港地区。香港将变成一个特别行政区，由当地人自己治理，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变，自由港和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变，港币的作用和性质也不变。针对英国首相关于港人信心有赖于英国管治、如果宣布中国收回主权信心将丧失的论点，中国总理指出：如果非要在主权和繁荣稳定二者之间作出选择，那么不客气，中国宁愿首先选择主权。总之，收回主权是前提，决不能为了保持繁荣而不收回主权或推迟收回主权。赵紫阳还重申，中国政府不承认有关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不受它的约束。

在与邓小平会谈之前，撒切尔夫人尚存一丝幻想。她认为邓小平是现实

---

柯利达：《在华经历》，伦敦约翰·马利出版社1994年英文版，第174、175页。

玛格丽特·撒切尔：《唐宁街的岁月》，纽约哈珀考林斯出版公司，1993年英文版，第260、261页。

主义者，正是他有效地打开了解决香港问题的门，而且主张一国之中可以允许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存在。似乎可以为了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而在主权问题上作出某种让步。

9月24日上午9点，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撒切尔夫人。中方陪同会见的有外交部长黄华、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中国驻英大使柯华。英方陪同会见的有香港总督尤德、首相首席私人秘书巴特勒、驻华大使柯利达。会谈原定时间为一个半小时，但实际上整整延长了50分钟，足见双方较量的激烈程度。

撒切尔夫人知道这次会谈最为关键，早早就做好了准备，提前来到了人民大会堂。会见一开始，她就如前一天与赵紫阳会谈那样，按照事先设计好的方案，摆出强硬姿态，打出“三个条约有效”和“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离不开英国”这两张牌，坚持三个条约必须遵守。她恐吓邓小平说，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要想继续维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继续由英国来管治它。所以，任何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解决方案，必须以继续维持英国对它的管治为前提。

面对英国首相的挑战，邓小平寸步不让，表现得更为强硬而且更加有理有据。他首先全面概括中国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指出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1997年后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它的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英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邓小平坚定地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说，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他强调，如果1997年不收回香港，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无法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就应该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所以，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的时间了”。邓小平对撒切尔夫人说，中自宣布这个决策，从大的方面来讲，对英国也是有利的，因为这意味着届时英国将彻底地结束殖民统治时代，在世界公论面前会得到好评。所以英国政府应该赞成中国的这个决策。两国应该合作，共同来处理香港问题。

针对撒切尔夫人关于香港的繁荣离不开英国管理的观点，邓小平说：“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的政策”。这些政策的主要特点，就是基本上保持这个地区政治、经济制度现状。他告诉撒切尔夫人，之所以中国还要等一、二年才正式宣布收回香港，是希望在这段时间里同香港各界人士广泛交换意见，听取英国政府对我们提出的建议，以便制定我们在15年中和15年后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应该是香港人民、在香港的其他投资者首先是英国也能够接受，因为对各方面都有好处。邓小平还指出，中国不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他认为，如果香港不能继续保持繁荣，会影响中国的四化建设，

但是在程度上并不像一些人估计的那么大。

中国宣布 1997 年要收回香港，香港会不会发生波动？邓小平回答说：“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他还告诉英国首相，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时，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 15 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邓小平说，他所担心的就是今后 15 年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制造混乱的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但主要的是英国人。他希望从撒切尔夫人这次访问开始，两国官员讨论如何避免这种混乱。

邓小平最后说：“我们建议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前提是 1997 年中国收回香港，在这个基础上磋商解决今后 15 年怎样过渡得好以及 15 年以后香港怎么办的的问题”。

撒切尔夫人显然被邓小平这番极其坚定而严密的话杀去一大半锐气，以至于会谈结束后仍然神思恍惚，在大会堂门外的台阶上摔了一跤。她没有想到邓小平如此强硬。回去之后撒切尔夫人私下对驻华大使柯利达说：“哎唷，邓小平真残酷啊！”但是，她并没有被邓小平说服。相反，撒切尔夫人认为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法律条件和政治条件了解太少。因此，她觉得“需要慢慢地、彻底地开导他们”，让中国领导人知道要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需要怎么办。这位首相还认为，虽然她没有达到自己的预定目的，但她使邓小平同意发表一个简短声明，即“双方本着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共同目的，同意在这次访问后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可见，撒切尔夫人并不服输，还要继续同邓小平较量。

撒切尔夫人访华后，在主权问题上与中国政府抵抗了将近半年时间。而中国领导人始终坚持“主权问题不容讨论”，英国政府必须先行承诺交还香港主权，才能真正进入谈判。因此，从 1982 年 9 月底到 1983 年 3 月初，中英双方实际没有开始进行正式谈判。

1983 年 1 月 28 日，撒切尔首相召集政府高层官员和港督尤德开会，讨论香港。与会者表示，这年 6 月中国可能会单方面宣布其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计划。这种结果必须防止。撒切尔夫人提出，在谈判无进展的情况下应在香港发展民主体制，使它能在短期内获得独立或自治，正像英国过去在新加坡所作的那样。她还提议在香港搞全民公决。但其他与会者不赞成首相的设想。

由于撒切尔夫人不向中方让步，中国政府就加紧进行完善关于香港方针政策的工作，并准备提交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审议通过。

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和香港总督尤德深怕中国政府会以中英在主权问题上形成僵局为理由，而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单方面宣布解决香港问题的

---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15 页。

柯利达：《在华经历》，伦敦约翰·马利出版社 1994 年英文版，第 179 页。

参见玛格丽特·撒切尔：《唐宁街的岁月》，纽约哈珀考林斯出版公司 1993 年英文版，第 262 页；《人民日报》1982 年 9 月 25 日。

玛格丽特·撒切尔：《唐宁街的岁月》，纽约哈珀考林斯出版公司，1993 年英文版，第 488、489 页。

方案，中止两国间的谈判。他们急忙于 1983 年 3 月 5 日赶回伦敦，打算会见首相，劝她采取措施把中国拉回谈判桌上来。

3 月 7 日，撒切尔夫人在柯利达和尤德商讨对策时，最初仍然持强硬态度，甚至建议由联合国在香港主持一个全民投票，以向中国证明，英国的继续管治不仅是英国所希望的，而且受到港人的欢迎。柯利达不赞成这个办法。他主张由撒切尔夫人写一封信给赵紫阳总理，表示只要在香港的管理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她就愿意就主权问题“考虑”向英国议会“提出建议”。撒切尔夫人让柯利达起草这封信，并决定 3 月 9 日再次开会。在 3 月 9 日的会上，撒切尔夫人修改批准了柯利达拟出的信。这封信以英国首相的名义表示：“只要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能够就香港的行政管理安排达成协议，而这些安排能够保证香港今后的繁荣与稳定，又能既为中国政府又为英国议会和香港人民所接受，我就准备向议会建议，使整个香港的主权回归中国”。

柯利达回到北京后，立即将这封信通过姚广呈给赵紫阳总理。英国首相在这封信中并没有痛快地承诺交还香港主权，而是附加了一大堆条件。但尽管如此，邓小平还是决定适时地给英方一个下台阶的机会。准备与英国代表举行正式谈判。柯利达大使 5 月份接到赵紫阳总理的回信。此信肯定了英方新的态度，同意 5 月底和 6 月初举行两轮谈判商讨纯粹程序安排问题，并建议正式谈判可以先谈第二个问题，即 1997 年后怎么办。中国政府的灵活姿态，为双方开始正式谈判铺平了道路。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在 6 月 22 日，即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主持召开了上任后的首次港澳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对中英谈判策略的一些指示，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1. 谈判开始不先谈主权问题，先谈 97 年以后如何管治的问题；此问题解决后，主权问题自然迎刃而解。这是中方的一条主要策略。2. 谈判日期要设限，以 1984 年 9 月为最后期限，不能任由英国人无限期拖下去。要让英方知道，届时如仍未谈成，中国会单方面宣布收回香港方案。邓小平的这些策略，成为中英谈判过程里中方的主要策略。中英两国的谈判进程基本上依此设计展开。

1983 年 6 月底，中英两国代表就会谈程序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双方约定按以下顺序磋商香港问题：第一，先谈 1997 年以后对香港的安排；第二，商讨从现在开始至 1997 年过渡期的安排；第三，有关政权交接的事宜。至此，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近 10 个月的“第一阶段”谈判，以撒切尔夫人在主权问题上作出有条件的让步，以及中国同意暂时搁置主权之争而结束。接下来的是 20 多轮所谓“第二阶段”谈判，即正式谈判。

### 五邓小平请希思传话，劝英方 放弃以主权换治权的计划

撒切尔夫人新一轮进攻的主要目标，是运用各种方法来使中国同意在 1997 年以后由英国继续保持对香港的治权。英方为实现这个目标所采用的基本策略是，答应 1997 年交出对香港的主权，用主权换治权。外交大臣杰弗

---

王叔文主编：《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 页，玛格丽特·撒切尔：《唐宁街的岁月》，纽约哈珀考林斯出版公司 1993 年英文版，第 489 页。

王叔文主编：《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 页。

里·豪和外交部其他官员，却主张尽快在谈判中向中方表示不再谋求 1997 年后继续管治香港。但是，撒切尔夫人认为“没有理由作出这种让步”。她“要把每张讨价还价的牌都使用到最佳效果”。但她又承认，这些牌“太少了”。从 7 月中旬开始的第一轮会谈到 9 月下旬的第四轮会谈前后，英方软硬兼施，会场内外互相配合，大打“信心”、“民意”、“经济”这三张牌。在前三轮会谈中英国没有迫使中国在治权问题上让步，谈判形成僵局。中英谈判的僵持，使英国前首相希思深感忧虑，又开始他的第 6 次访华，要为打破谈判僵局作出努力。9 月 10 日，邓小平会见希思。邓小平批评英国当局说：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22 日要会谈，我希望不要再纠缠在治权问题上。我的意思是说，不要搞成中国单方面发表声明收回香港，而是要中英联合发表声明。联合声明的方式对两家都好，不是说对哪一家更好，特别是涉及到中英长期的关系。他告诫说：在香港问题上，我希望撒切尔首相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不要把路走绝了。邓小平最后再次强调，他希望英方在 9 月 22—23 日举行的第四轮会谈时，不要再纠缠主权换治权问题，要扎扎实实地商量香港以后怎么办，过渡时期怎么办。这对彼此最有益处。希思向邓小平表示，他回伦敦后将把这番话转告撒切尔夫人。

虽然撒切尔夫人暂时没有听进邓小平的忠告，仍然坚持以主权换治权的方针同中方举行第四轮会谈，但不久就改变了对抗的态度。10 月 14 日，赵紫阳接到柯利达为首相拟就的一封致中国总理的口信，在这封信中，撒切尔夫人实际上放弃了由英国“继续管治香港”的要求，同意在中国政府基本方针政策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中英谈判僵局再次打破。

## 六在驻军问题上的坚定立场

中英在主权、治权这些根本问题上的争论基本解决后，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就进入了按照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商量具体问题的新阶段。中英合作已经成了会谈的主旋律，但也出现一些不大不小的争论。在磋商 1997 年后的安排问题时，双方曾就中央政府驻军香港的必要性问题发生了较大争执。

在第八轮会谈时提出了中国政府是否在未来香港驻军的问题。中方代表提出，1997 年既收回主权，就必须驻军，因为这是国防的需要。但是，英方代表在谈判中多次提出中国不要去驻军。理由是：中国驻军问题敏感。人民解放军一到香港，港人就会惶惶不安，就会出现“灾难性后果”。

中方代表问，你们英国可以驻军，为什么我们收回香港后作为主权国不能去驻军？英方代表辩解说，这不一样。英国伦敦离香港很远，临时调兵很困难。你们离香港很近，驻军驻到深圳那边去嘛！后来英方又退一步说，你们有驻军权我承认，但平时不要来驻，只有在产生外来威胁情况下再去，没有外来侵略威胁不要去。有了外来侵略威胁要驻军，也要事先同特区政府磋商，特区政府可以否决。实际上要限制中国的主权。

邓小平对驻军问题非常重视。1984 年 5 月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有些领导人就此问题发表的意见，引起了外界的误会。香港记者公开报道了这一消息，

---

玛格丽特·撒切尔：《唐宁街的岁月》，纽约哈珀考林斯出版公司 1993 年英文版，第 489 页。

玛格丽特·撒切尔：《唐宁街的岁月》，纽约哈珀考林斯出版公司 1993 年英文版，第 490 页。

宣传中方在香港驻军问题上的立场有所松动。5月25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港澳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会见前，他了解到这一情况，十分气愤，在东大厅会场，港澳代表、委员们与邓小平合影留念。记者拍照三分钟后本来可以退场，但邓小平突然说，你们别走，我有话，你们要宣传出去。有人说中国不要驻军，这是胡说八道！英国外相跟我谈的时候也承认，中国政府既然收回主权，就有权在香港驻军。他接着说，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的主权后，有权力在此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没有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邓小平的话使报界哗然，香港恒生指数顿时下跌30点。

第二天，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跑到中国外交部去。他当时神经很紧张地说：听说昨天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为驻军问题发了脾气，我们很惊讶。周南说，你有什么惊讶的！我们在谈判中一直在讲要驻军。这件事我们已经决定，不要另外打算盘。中方在香港1997年后驻军的坚定立场，迫使英国最后只好作出让步。

## 七非常关注香港过渡期问题

按照邓小平的设想，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主要围绕三大问题：首先是主权问题；第二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第三个问题，是两国政府要谈好如何使香港从当时至1997年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简单地说，这三大问题就是1997问题、1997后问题和1997前问题。经过激烈的较量，到1983年年中时，1997或主权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从1983年夏至这年冬季，英方以主权换治权的计划失败，同意按照中方“一国两制”和“十二条”特殊政策治理未来香港，因此，实际上1997后的安排也没有原则之争了。进入1984年以后，邓小平最担心和关注的，是第三个大问题，即香港过渡期的安排问题。

事实上，邓小平一直对香港过渡期问题存有忧虑。早在1982年9月与撒切尔夫夫人谈话时，他就坦率地说：“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此后英国在主权、治权等问题上不断设障，特别是在1983年的八九两月大打三张牌，把香港搅得天昏地暗，使邓小平对香港过渡期问题更加担心，怕英国利用这十几年管治香港的机会，继续制造麻烦。他决定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或减轻这种可能性。

在1984年2月下旬举行第九轮会谈时，中方在提交的文件里，除了主要规定1997年以后的安排外，还涉及1997年以前的香港管理问题。尤其令英方不安的是，中方代表提出了设立中英联合委员会以监督过渡时期各方面事务的建议。所要监督的如公务员的任命、财政金融政策、土地拍卖和政制发展等。

设立这个组织，是邓小平的主张。他主要出于担心英国在过渡期内可能会搞点名堂。目的是在香港回归祖国前的13年过渡期内，有关执行协议的问

---

《人民日报》1984年5月26日。

《邓小平论祖国统一》，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题，双方通过这个专门小组进行联络和磋商，处理可能发生的事情。胡耀邦谈到这个问题时曾经说过，英国人过去撤出殖民地的纪录太差。香港回归还有十多年的过渡期，他们会不会不负责任，做些小平同志说的“拆烂污”的事？还是要防范它一手。设联合联络小组，主要考虑是这样。当然，还有些事可能需要两国商量解决，对两国都有好处。

4月18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杰弗里·豪。双方就有关香港的重大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很多一致的见解。但在1997年之前设立中英联合联络委员会问题，双方有较大分歧。不久前，香港的英资财团怡和宣布迁册百慕大，显然更使邓小平认为建立这个机构很有必要。他告诫说，1997年之前，香港政府不要把财源搞尽，比如卖掉大量土地，或用光政府财政储备，或进行大规模巨大的建设项目等。

中方关于设立联络委员会的建议提出后，英国和香港社会反应强烈，特别遭到了英方的坚决反对。港英政府不愿意当“跛脚鸭”恐怕在1997年前，联络小组会成为香港的“第二权力中心”，甚至凌驾于港英政府之上的权力组织。英方采用一贯手法，把中国这个提议的内容公开，广泛制造舆论，以此压迫中方收回建议。香港社会一时反对声浪不断。撒切尔夫人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当时英方在谈判中遇到的唯一最困难的问题，就是中方提出建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我所担心的是，这个机构会变成并列于总督的第二权力中心。更糟糕的是，它会造成某种英中‘共管’的印象，以至于摧毁人们的信心”。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僵持了四五个月。

中英双方关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问题的争论，是在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于1984年7月底第二次访华时达成协议的。中方采取了十分灵活的态度，作出了必要的妥协和让步。比如，决定把联合联络委员会改名为联合联络小组，决定这个小组推迟至1988年才进驻香港，还同意让它跨越1997年，在2000年1月1日之前结束工作等。双方的妥协和合作精神促成了共识。

7月31日上午，刚从北戴河休养返回的邓小平会见了杰弗里·豪。在会谈中，邓小平表示赞同已经达成的重要协议。他还重点谈了对13年香港过渡时期的忧虑和对英国的希望。他说，在香港问题上，我们非常关注13年过渡时期，只要过渡时期安排好了，我们并不担心1997年后的事情。邓小平希望香港在过渡时期内，不要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希望不要出现动摇港币地位的情况。港币发行量究竟多少？港币信誉好是因为储备金雄厚，多于发行量，不能改变这种状态。

第二，中国同意可以批出1997年后50年内的土地契约，而且同意港英政府可以动用这种卖地收入，但希望用于香港的基本建设和土地开发，而不是用作行政开支。

第三，希望港英政府不要随意增加人员和薪金、退休金金额，那将会增加将来特别行政区的负担。

第四，希望港英政府不要在过渡时期中自搞一套班子，将来强加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第五，希望港英政府劝说有关方面的人不要让英资带头转走资金。

邓小平指出，虽然我们希望过渡时期不出现问题，但必须准备可能会出

---

这是个美国俗语。新总统当选而旧总统尚未卸任时，旧总统实际上已难有所作为，被称为“跛脚鸭”。玛格丽特·撒切尔：《唐宁街的岁月》，纽约哈珀考林斯出版公司1993年英文版，第491、492页。

现一些不依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问题。

## 八鼓励港人增强治港信心

1984年4月20日上午，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由北京赶到香港，举行记者招待会，透露中英会谈的进展信息。他声明：“我认为我应该在这里告诉大家：要达成一份能使本港在1997年以后仍然继续由英国管治的协议，是不切实际的设想。”也就是说，香港到1997年时肯定要回归中国。这一声明打碎了某些香港人希望将来仍由英国管治的幻想。因此，一些人指责英国“出卖”香港，听到这种指责后，杰弗里·豪立即驳斥说，有人认为英国“出卖”（香港）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他还详细介绍了英方已接受中国领导人关于1997年后如何管理香港的构想，即“一国两制”，并准备赋予香港高度的自治权。但在1997年以前的13年中，英国政府还负责香港的管治，维持它的繁荣和稳定。

英国外交大臣的谈话在香港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普遍认为大局已定。但是，不少香港人对将来英国管治结束后，香港人能否自己管理好香港，中国政府会不会信守诺言，归根结底，香港还能不能继续繁荣和稳定，十分担心和怀疑。5月份，有几位香港知名人士发表题为《香港的前途》的声明，大谈香港与英国“宪法上的深厚联系”，说香港人“对于与英国的联系即将撤除”，“觉得非常失望”。声明还要求英国在1997年后还应在香港保留一定的地位。

针对一些香港人尤其是某些知名人士的悲观、怀疑心理和言行，邓小平亲自作了耐心诚恳的说服工作，以打消他们的疑虑，建立起坚强的信心。

6月22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以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唐翔千、总商会主席唐骏千和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倪少杰为首的香港工商访问团。他告诉香港客人，中国政府已多次讲过，收回主权后，香港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他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两个传统：第一是不信邪，在世界的狂风大浪面前稳如泰山，对什么样的风浪也不害怕；第二是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这一点也是被世界公认的。因为，不必担心将来政策会变，只要政策对就不会变。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6月23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邓如莲和利国伟。钟士元是香港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他们想反映自己及其他港人中存在的一些疑虑，如中国未来的政策会不会变，英国人走后港人能否治理好香港等问题。

邓小平对他们说，“欢迎你们以个人身份到北京”，“利用这个机会了解一下北京、了解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解一下中华民族是有好处的”。他强调，“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是符合500万香港人的利益的”。他还有针对性地说，“我听到好多不同意见，但我不承认那个是代表香港人的利益”。“香港真正的民意我们是知道的”。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决不会受到任何干扰”。“过去所谓

---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67、68页。

《人民日报》1984年4月21日。

《人民日报》1984年6月23日；另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8、61页。

‘三脚凳’，没有三脚，只有两脚”。

邓小平重申，“我们对香港的政策 50 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有人担心这个政策会不会变，我说不会变。核心的问题，决定的因素，是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不对，就可能变。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

针对他们提出对港人能否治理好香港的疑虑，邓小平说：“要相信香港的中国人能治理好香港。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管好香港，这是老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思想状态”。“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所谓香港人没有信心，这不是香港人的真正意见”。他还谈到，“港人治港有个界限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邓小平最后对客人说，“到 1997 年还有 13 年，从现在起要逐步解决好过渡时期问题。在过渡时期中，一是不要出现大的波动、大的曲折，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二是要创造条件，使香港人能顺利地接管政府。香港各界人士要为此作出努力”。邓小平的谈话亲切倍至，论证非常严密，极富感染力，使原先执有偏见的香港人士也不得不为之所动。

1984 年 9 月 18 日，中英双方就会谈全部文本达成协议，并于 9 月 26 日进行草签。香港问题至此圆满解决。中英联合声明受到了全世界舆论的一致赞誉。香港人民的反应尤为强烈，他们普遍认为，协议内容“比许多人所期望的好得多”，全港人“对香港前途重获信心”，并能“继续维持香港繁荣和稳定”。

### 九指导“基本法”的起草工作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于 1984 年 12 月 19 日经两国首脑正式签署，并于第二年 5 月互换批文生效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工作随即提上了议事日程。全国人大六届三次会议决定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员会，6 月 18 日起草委员会名单公布，共 59 人，其中内地委员 36 人，香港委员 23 人。经过 4 年多时间的努力，1990 年 4 月 4 日，全国人大七届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基本法”是对中英联合声明的进一步法律化。

在“基本法”起草的过程中，邓小平作了重要的指导。起草工作开始时，他强调，“基本法”不宜太细。1987 年 4 月 16 日，邓小平会见了正在举行第 4 次全体会议的起草委员会委员，作了重要的讲话，对“基本法”的意义和若干起草问题，谈了他的观点。邓小平说，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作出一个示范。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

在谈到基本法起草问题时，邓小平就香港未来的政治体制和中央与香港的关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香港的制度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既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也不是实行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对香港来说，普选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邓小平

很赞成港督卫奕信关于“要循序渐进”的主张，认为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总之，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至于中央政府与香港的关系，邓小平提醒说，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中央确实是不干预也不需要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但是，当香港出现损害国家根本利益和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北京就要过问、干预。“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邓小平认为，基本法要照顾到这些方面。

“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认真听取和采纳了邓小平的上述意见。

“基本法”公布以后，邓小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指出它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文件，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

从提出 1997 问题到中英谈判，从中英联合声明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问题获得了圆满的解决，消除了长期笼罩在中英关系上的一个巨大阴影。香港问题的顺利解决的客观原因是，中英国力对比有利于中国。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40 年代国民党重庆政府因国力虚弱而失去收回香港的良机。

然而，仅仅依靠国力强大，并不一定能圆满解决香港这个极其复杂敏感的问题。单凭实力收回香港容易，但保持它的繁荣和稳定却非常难。没有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也不能顺利完成解决香港问题的历史使命。

邓小平作为举世公认的战略家、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地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他提出的“一国两制”战略构想，在解决香港问题上起了最重要的作用。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客观地评价道：“我认为，从历史的观点看，‘一国两制’是最富天才的创造……是解决香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达成协议的关键。”“这一构想提供了一个典范，说明了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可以而且应该解决的。”不仅如此，邓小平从 70 年代末以来还身体力行直接参与谈判、会见英国和香港人士，做了大量工作，在每一关键时刻，都起了重大作用。总之，邓小平的战略决策，是促成香港问题圆满解决的关键。

（作者王红续：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在读博士生）

---

《邓小平论祖国统一》，团结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1、58 页。

《外国领导人访华讲话选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8 年版，第 203 页。

#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看俄罗斯 ——变革：从历史走向未来

姜长斌

以俄罗斯民族为主体的俄罗斯联邦现在正处于严重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危机之中。但是，这基本上还是一种发展过程中的危机——尽管这场危机的规模是空前的，具有很多新的历史特点，并且将在已知和未知的因素变化中决定该民族国家的未来。这也就是说，它将在相当的程度上决定欧亚地区乃至人类社会的新面貌。因此，在分析这场危机本身以及预测俄罗斯民族的未来时，我们还应该研究更多的东西。

现在，中国学术界对俄罗斯危机的跟踪研究基本上是及时的，研究领域也比较宽，这一点应予积极的肯定。但是，只是对具体领域、具体问题进行随机分析，也有其局限性的一面，那就是，对俄罗斯摆脱危机的前景、途径和时间无法进行有据有论的总体预测。我在一些研讨会上常常听到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俄罗斯会很快摆脱危机，这同俄现政府的说法一致；二是认为俄罗斯已经一蹶不振，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再会对国际社会产生什么重大影响了。当然，更多的人是对其前景表示茫然，不知该怎么看。

本文试图以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的科学论断为依据，从俄国历史传统和当代俄国发展进程两个角度，探讨一下俄罗斯的前景问题。

## ——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年轻的民族

直到 15 世纪中叶（1462 年），俄罗斯才在欧洲的边缘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莫斯科大公国：领土仅有 43 万平方公里，人口仅仅 300 万，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默默无闻的小国。但是过了一个多世纪，到 16 世纪下半叶伊凡四世在位时，其领土就扩大了 10 多倍，达 550 万平方公里，尽管连年征战，死伤人员不计其数，但人口还是达到了 1000 万（其中已有相当数量的非俄罗斯人）。按马克思说法是，当伊凡四世自行加冕为“全俄罗斯的沙皇”，庞大的俄罗斯国家“突然”出现后，当时的欧洲不能不“目瞪口呆”，甚至一向崇尚武力、使“欧洲发抖”的土耳其也都不得不第一次聆听俄国人“傲慢的语言”。此后，从罗曼诺夫王朝建立（1613 年）到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不满三个半世纪里，俄国（前苏联）的领土竟扩大到 2240 万平方公里，占了全球土地的六分之一。即使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联邦，也还拥有 1700 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众所周知，在国力和军事力量方面，到了 19 世纪初，俄罗斯帝国就已起着整个欧洲反动统治的宪兵作用。到了 20 世纪下半叶，苏联更成为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一度使从无畏惧感的美国也惧怕三分。

从一个小小的公国跳跃式地发展到称霸世界，不过用了 500 年的时间。这不能不令人深思。从一定意义上说，真有些像中古时期蒙古民族的征略。在近现代史上，俄罗斯的崛起特征是独一无二的。

俄罗斯的民族文化虽然只能说是开始于中古后期，但也表现非凡。过去苏联正史宣传的第一部文学和史学作品《伊戈尔远征记》是记载发生在现今

乌克兰境内的事件，已被证明当时俄罗斯民族还没有形成。15世纪莫斯科公国时代还一直是方言纷杂，连自己统一的规范语言文字都没有，直到1775年才出现第一部俄语标准语法。但在此后不久，它仅仅用了一个世纪，就涌现了一批世界级的科学文化巨匠：门捷列夫、托尔斯泰、陀思朵也夫斯基、赫尔岑等等。还须指出，许多非俄罗斯族巨匠，如，柴可夫斯基、果戈里、契诃夫等，也都是在俄罗斯的文化土壤上成长起来的。

还有一点，俄罗斯民族的繁衍力也是惊人的，比起其他斯拉夫民族来说，要旺盛得多。据乌克兰作家久巴统计，从1913年到1959年，尽管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遭受过斯大林农业集体化运动带来的大饥荒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大镇压等大规模的生灵涂炭，俄罗斯族人还是从6000—7000万增加到了1.14亿，增幅远比其他斯拉夫民族要高。俄罗斯农村一向是多子女和大家庭的繁衍之源。

俄罗斯民族的崛起是在发展危机与改革（变革）的交替中进行的。已知的著名危机和改革有：伊凡四世的等级代表君主制大改革（1549—1572）、彼得一世的社会制度大改革（1700—1721）、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君主专制”改革（1773—1775）、斯佩兰斯基改革（1808）、农民改革（1861）、斯托雷平土地改革（1906）、1917年2月推翻帝制及西方式自由化改革、1917年十月革命及列宁新经济政策改革（1921—1928）、斯大林的经济（社会）军事化大改革（1929—1939）、勃烈日涅夫的争霸世界战略改革（1966—1975）、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1985—1991）以及叶利钦当前还难以命名的改革。

为了研究俄罗斯当前的危机与改革，并且对其前景稍加预测，我们就不得不在更广阔背景下，从俄罗斯民族发展史的角度来研究问题。

## 二绝对独裁制度下危机与改革交替的跳跃式扩张

160年前，法国人托克维尔在其著作中预言：“当今世界存在着两个伟大的民族，尽管起点不同，看来都在朝着相同的目标前进。他们就是俄国人和英裔美国人……正当世界注意着其他地方的时候，他们却突然加入了一流民族的行列……美国人使用锄镐征服世界，俄国人则用剑戟征服世界。”

综观历史，俄罗斯的发展危机和社会改革，始终都是由一个总矛盾决定的，这就是领土及势力范围的扩张同社会内在发展的矛盾。这个总矛盾可以分解为三个具体矛盾：（一）国家战略目标同社会内在需求的矛盾；（二）独裁专制同适当分权的矛盾；（三）传统文明同外来文明的矛盾。

可以说，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是对这三个矛盾的暂时克服。所谓克服，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如1921年里加条约的签定和实行新经济政策，其余全部都是国家扩张战略目标压倒社会内在需求，独裁极权战胜适当分权，传统文明排斥外来文明；其中，尤以伊凡四世、彼得大帝、斯大林变革最为典型。当然，其他改革也不可忽略，因为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它们都是深刻理解三次典型大变革（或大发展）绝对不可缺少的“注解”，否则，不仅那些大改革不可理解，而且当今的危机与出路也变得不可预测了。

16世纪中叶，伊凡四世正式加冕，成为第一代“全俄罗斯的沙皇”，俄罗斯民族的割据状态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割据、分权的因素并没有消失，而

且俄罗斯人也不满足于只是得到“欧洲幅员最大国家”的地位。在此关键时刻，俄罗斯“真正的东正教”领袖们决心要完成两桩大业：（一）向东，征服全部异教徒邻国，不仅吞并鞑靼—穆斯林居民的领土，而且还要强迫他们皈依大俄罗斯人的东正教；（二）向西，夺取立沃尼亚及其毗邻地区，占领波罗的海出海口。为此，伊凡四世就必须进一步克服国内的软弱涣散。

伊凡四世登基后，首先整顿了朝纲，初步战胜分权势力，建立了以沙皇特辖制为基础的等级代表君主制。此后，他轻易地征服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两个软弱的汗国，对进行抵抗的喀山实行了全城大屠杀（因此，喀山鞑靼人至今仍怀有强烈的反俄情绪）。但是在向西扩张方面却由于邻国比较强大，以及俄罗斯内部不统一，不断遭受挫折，从而导致伊凡对内实行了长达7年（1565—1572）之久的血腥镇压，连他的儿子也未幸免。

伊凡的这种作法，既是对蒙古统治传统的继承，又开创了俄国后来独裁统治的典型方式。

1598年留里克王朝终结，1613年罗曼诺夫王朝建立直至1917年。这时俄国开始了由等级代表君主制向绝对君主制的转变。

17世纪是罗曼诺夫王朝成功地向东扩张时期，疆域一直达到额尔古纳、格勒必齐河、鄂霍次克海及白令海峡，但止于外兴安岭。俄国向东扩张的成功，撑大了它的胃口。它的更大兴趣和扩张重点在南面和西面，它要吞并黑海和夺占波罗的海沿岸及出海口。这个任务由彼得大帝完成了。

17世纪末，俄国曾两度远征克里米亚均告失败。彼得清醒地看到，俄国的失败是由于军事技术落后，以及支撑军事力量的国民经济严重落后。他认识到俄国必须向西方国家学习，进行制度改革（当时西方已经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他首先完成了对反改革派——大贵族和射击军的残酷镇压，为他的全面改革扫清道路。就是说，彼得大帝完成了向绝对君主制的转变。这次改革用了21年（1700—1721），大大增强了国力。但是改革并没有使俄国走上资本主义，反而强化了君主独裁的封建农奴制。用马克思的话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征服了俄国的野蛮”。改革带来的唯一“实惠”，是扩大版图，压倒西方强邻，征服高加索，威镇波斯，使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敢小视强大的俄国。为了表示俄国的雄心，彼得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到君临欧洲的彼得堡。

彼得大帝的事例，鼓舞着俄国后继的历代君主。他之后的几个君主尽管懦弱无能，却为叶卡捷琳娜二世下一步实现黑海扩张野心奠定了基础。

叶卡捷琳娜二世虽然出身于德国贵族，却是最成功最典型的俄罗斯皇帝。她向西方学习，实行“开明专制”，但是，使她真正著名于世的甚至不是她杀害丈夫，篡权夺位，或者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她的“伟大”在于：不仅实现了，而且大大超过了彼得大帝的一切梦想。她不仅制服了全部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等“边睡”民族，强制他们俄罗斯化，而且称霸整个波罗的海、黑海海上，三次瓜分俄国的宿敌——波兰，直至争夺欧洲霸权。大俄罗斯帝国欧洲部分的轮廓正是由她勾划出来的。而在东方，经过19世纪直至1945年，虽然几经挫折，但是大片大片的别国领土都划进了俄国（后为苏联）版图。

扩张，从根本上说并不能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相反却使俄罗斯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一直落后于西欧，即使在上述最强盛时期也是如此。从发展的角度看，完全可以把1808年的斯佩兰斯基改革、1861年的农民改革、1906年的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看作是一个过程的几个阶段。这个过程是俄国资本主

义从无到有，试图摆脱封建专制桎梏的痛苦过程，但是封建统治者牢牢地控制着主动权，几次改革都是从上向下的“恩赐”，变革必须服从于专制制度的国家战略目标——扩张；俄国的资本主义始终在压制下成长，非常脆弱。只有1917年的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农民一道从下而上地推翻专制统治的。可是俄国资本主义的脆弱性决定了革命（社会变革）的领导权飞快地转入了无产阶级手中，在同年就爆发了十月革命并且经过四年的血腥内战，巩固了无产阶级政权，使俄国真正踏上了社会转型之路。其具体表现就是列宁倡导的通向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路线。但这是一条漫长的发展道路，它要求俄国付出高昂而痛苦的代价，即彻底割断对外扩张、对内专制的历史传统，不再谋求什么欧洲霸权，更不要说世界霸权了。但这却是一条真正为俄国大多数居民谋福利并且受到他们衷心拥护的道路。斯大林领导的大变革以及确立的社会体制，说明要俄国抛弃与此相反的危害人类进步的坏传统是多么的困难。历史已经表明，斯大林搞的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是被马克思痛斥过的“完全粗陋的和无思想的共产主义”，在俄国的条件下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教条理解+俄国传统的统治方式+对俄国得天独厚的资源的肆意挥霍”。这种体制称之为左倾空想社会主义或者军事共产主义最为恰当。它最适合在战争时期发挥威力，苏联在二战中虽然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但却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其中，不能不说继承并发扬俄国旧传统的斯大林体制起了巨大的作用。

### 三如何看待俄罗斯当前的变革

在二战以后的和平时期里，苏联本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改弦易辙，对斯大林体制进行彻底改革，真正走“和平的社会主义”之路；二是轻车熟路，走扩张发展之路。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他们驾轻就熟，走的正是第二条路，即依靠武力争夺世界霸主。他们走第一条路的机遇曾是很多的，赫、勃也作过某些尝试，但都因改走第一条路对于他们来说，代价过于高昂，既要放弃整整一个社会阶层手中过多、过剩的权力和利益，又要彻底抛弃根深蒂固的旧俄传统的发展价值观，尽管这样做不仅符合俄国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而且也符合新时期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表面上看，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联手搞垮了苏联，但这正是对苏联坚持俄国恶劣传统的历史性报复。只能从这个角度看问题。

本文作者必须郑重地说明，前面列举的都是帝王将相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字，这只是为了行文简便，绝不是说，俄国的命运是由他们个人决定的。他们只不过是代表了每一个时期占优势的社会阶级、阶层和势力的利益及要求罢了；也是前述三大社会矛盾斗争结果的标志。

历史上，俄罗斯民族是否具有反对向外扩张及对内独裁专制的民主传统力量？有过。但是他们都没能战胜旧势。除了19世纪的一些杰出的思想家和社会运动之外，最优秀、最伟大的代表人物就是20世纪的列宁。但是即使是以列宁为代表的力量也不足以战胜传统的和现实的统治势力，尽管他们在一个时期内得以掌握政权，例如，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是一条充满希望之路，但是它实行不到10年就被优势传统势力葬送了。这是其一。

其二，俄国历史还表明，在每次鼎盛时期之后并进行下一轮变革和跃进之前，都有一段相当长时期的混乱、衰退或收缩期。例如，伊凡四世死后1598

年至 1613 年的“大混乱时期”；彼得一世之后的积弱不振和里海沿岸土地的得而复失（1730—1762）；从 1856 年克里米亚战争惨败到 1878 年丢失多瑙河三角洲及南部比萨拉比亚；1918 年至二战前 1938 年苏联丧失的由俄罗斯帝国掠夺来的大片土地。就是说，俄罗斯的每次收缩期都至少要用掉 20 年左右的时间。这还是在传统的统治方式之下发生的。

当前，俄罗斯的混乱、收缩与变革，除了含有上述两个因素之外，它还有全新的特点。这次收缩和变革，从本质上应该说是自下而上的，收缩的规模也是空前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整个庞大的苏共解散、苏联解体竟没有引起大的震荡和暴力冲突得到证明。另外，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它要跳跃式追赶的已不是西欧，而是全世界的超强——美国。这是在二战以后俄罗斯从头展开的第二轮激烈竞争，是社会发展质量的竞争，也是俄国社会完全转型势力同传统势力的激烈斗争。

俄罗斯的幅员、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已有的武力装备仍是不可否认的巨大的客观存在。同其他大国相比，俄罗斯现在确实是软弱的、混乱的，但是，由此绝不能得出结论说，俄罗斯会永远衰落下去。不是的。这是变革时期的“软弱”和“混乱”。

目前，俄罗斯社会上两种势力的斗争仅仅是开始，社会营垒的界线并不分明。苏联解体后，两次杜马选举就充分说明，传统力量仍然不可低估。1993 年 12 月第一次选举时，社会上几乎是一片民主改革的呼声，但得票率遥遥领先的却是号召以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进行历史性报复的自由民主党。1995 年 12 月进行第二次选举时，糅合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俄共拔了头筹。自民党的成绩已不如 1993 年那么辉煌，在走下坡路，但仍位居第二。1996 年的总统竞选中唯一能对现任总统提出挑战和真正威胁的仍是俄共。因此，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是否会直线衰落下去，还不宜作最后结论，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两年俄国的社会意识是在变化，大俄罗斯沙文复仇主义已经不像前两年那么猖獗了。它需要改头换面，乔装打扮。但是，反传统的民主派又怎么样呢？虽然总体来说，与传统势力不相上下，可它四分五裂，各有各的打算，短期内还难以形成有效的统一力量。

这种局面不仅反映了俄罗斯的政治力量对比，而且直接描绘出俄罗斯改革的进程。从更深的层次上看，还反映了俄罗斯要变革原有经济结构的艰难程度以及在新形势下各种社会势力的利益要求。这一次杜马选举拥护俄共的人增多了，但有相当一部分人首先考虑的不是俄共纲领的新变化，而是表达了对于本来就是低质量、低水平（同西方相比）生活的再次直线下降及社会贫富差距飞速扩大的忿感情绪。所谓怀旧，绝不是对旧的官僚独裁体制的依恋。

因此，对于俄罗斯目前的混乱、衰退和改革我们完全可以用历史类比的方法来观察它，并且推测它的前景。当然，我们不是算命先生，不能要求我们说得丝毫不差。但是我们应该而且可以根据事实，作出合理的推断。

一、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回到斯大林的老路上去，已经完全没有可能。因为，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已经把俄国的老传统推上了最高峰或者说推入了最低谷，也就是说，这个老传统已经走进了历史的绝路，再也没有什么活力了。

二、由于旧传统还拥有相当的影响，完全西化也不可能，在传统势力的影响同西方自由派的碰撞下，俄国为了求得最终的稳定，只能走妥协的道路：

既保持一定的传统，又实行一定的自由化。

三、实际上，这条道路已经初步显现了粗略的轮廓，而且可以肯定，俄国定会选择它，并且踏着这条道路重新振兴和强大起来。从俄罗斯这个年轻民族的素质、地缘和发展潜力看，目前的混乱和衰退不过是它再次强盛的前奏而已。当然，这个再度强盛将是另一种性质，另一种面貌，但我们也决不可低估它的威力和影响力。

我们说的再次强盛，不是指从衰退的谷底（俄的生产已经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多）缓慢地上升，而是指恢复到原有的综合国力（尽管它是严重畸形的，不利于社会大多数居民，但毕竟是存在过）水平上的再次上升。

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俄国真正走完这条道路要多少时间？

依我看，它要花费的时间至少不会比历史上克服历次混乱最短的时间更少，而历史上最短的时间是 20 年左右。就是说，从 1991 年算起，至少要到 2010 年才能完成。考虑到这次转型的一系列新特点，20 年是最保守的估计。但是从俄罗斯的发展史和它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看，它肯定是能完成这个转变的。对此不应该有什么怀疑。那时的东方和整个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对此要有思想准备。

因此，既不要相信俄罗斯现政权的说法，也不要相信那种认为俄罗斯将从此一蹶不振的说法。我们应该从中国的切身利益出发，更深入、更密切、视野更开阔地注视俄罗斯的变化。不要说等到俄罗斯完成转型，只要俄罗斯真正从衰退的谷底开始稳步地回升，就足够我们重视的了。而且在重视的同时，永远地、时刻地不要忘记研究它的转型过程和前景。

（作者姜长斌：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国际政治学博士生导师）

# 邓小平与中日和平 友好条约的缔结

王新堂

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这个条约的签订，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两国人民的需要，同时也是两国政治家辛勤努力的结果。其中，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从全球战略和中国根本利益出发，制定和实行了这一时期中国对日方针和原则，抓住机遇，推动中日缔约谈判最终圆满完成，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增添了光彩的一页。

## 一 邓小平对中日缔约的战略思考

邓小平考虑中日缔约的出发点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基于中国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需要。70年代初，世界形势和战略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美苏争霸态势易位，呈苏攻美守，在两强争霸世界的矛盾斗争中，苏联处于主要矛盾方面；美国放弃了长期奉行的僵硬的对华政策，为中美两国的接近提供了回旋余地；苏联成为中国安全最大的威胁。1974年，毛泽东根据变化了的世界形势，提出将世界各种政治力量划分为“三个世界”的战略，其核心是将苏联划入第一世界，使全世界清楚苏联是最重要的威胁。这一战略思想反映了这一时期“反对两霸、侧重反对苏霸”的客观要求。根据这一思想，中国制定了遏制苏联扩张的“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战略方针。

70年代中期以后，苏攻美守的态势进一步增强。苏联的战略武器大致与美国相当，常规武器已超出美国与西欧的总和，苏联加紧在非洲之角、红海口、加勒比、中东、印支等地区进行扩张，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构成直接威胁。苏联要加紧实施其全球战略。美国为了保护既得利益，对苏联的扩张进行抵制。针对这种变化，邓小平提出集中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思想。他指出，所谓反霸就是侧重反一霸，联合两霸中的一霸，即联美反苏，美国起码是间接同盟军。邓小平在1977年底至1978年的时间里会见来访的外宾时，反复谈到苏联在加紧全球战略部署，战争的危險在增长；但战争可以设法推迟，办法有三条：一是自己要有准备，二是破坏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三是不搞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绥靖主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制定了发展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战略，即：团结和依靠第三世界，联合第二世界和美国，集中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其目的在于推迟世界大战的爆发，争取尽可能长的时间的世界和平，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

日本属于第二世界，是同西欧、美国一样需要联合的力量，是间接的同

---

参见《邓小平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的谈话》，1978年1月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的谈话》，1978年1月4日以邓小平会见美国参议员杰克逊的谈话》，1978年2月16日；《邓小平会见西德议员齐默尔曼的谈话》，1978年3月12日；《邓小平会见挪威外交大臣弗吕登他的谈话》，1978年3月15日。

盟军。中日缔结的核心内容为“反霸”，是将日本纳入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形成中、美、日、欧联合抗苏战略格局的重要一环。1978年7月，邓小平告诉访华的美国客人：“目前的国际局势比几个月前不同。埃塞俄比亚问题、扎伊尔问题、南也门问题、阿富汗问题、越南问题，不仅摆在中国面前，也摆在美国、欧洲、日本、亚洲、拉美和世界人民面前。”邓小平指出，“中美关系正常化是认真对付‘北极熊’的一个重要步骤，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也是一个重要步骤。”

苏联对中日缔约十分敏感，千方百计地干扰中日缔约谈判的进行。苏联一方面，攻击中国搞“霸权主义”，指责中国“要把日本拉进反苏同盟”；另一方面，对日本进行“高压外交”，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日本施加压力，企图阻止日本与中国缔约。

苏联对日采取的手段，一是在政治上进行恫吓，称如果日本同中国缔约，将采取“相应措施”，“不能袖手旁观”，“将不得不改变对日政策”等。二是加紧对日本的军事威胁，在日本周围增强陆海空军实力，加速扩建军事基地，频频进行军事活动。三是通过实施二百海里渔业区、废除日苏渔业条约等手段，打击日本北洋渔业。四是撕毁1973年勃列日涅夫与田中达成的“两国悬案中包括北方四岛问题”的口头协议，称“领土问题已经解决”，反说日本要求归还北方四岛是“复仇主义”。乘实施二百海里渔业区之机，企图强迫日本接受北方四岛为苏联的领海基线。五是发动强大宣传攻势，攻击日本“加紧复活军国主义”，成为“中国反苏战略的一角”等等。

苏联的态度，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中日缔约是遏制霸权主义扩张的有力武器。

其次，邓小平考虑中日缔约是为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千秋大业。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近两千年的友好交往的历史。但是，从1894年到1945年的51年间，日本军国主义者屡次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惨痛的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传统的联系和友谊遭到严重破坏，在两国关系史上留下了不幸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当时的日本政府违背人民意愿，追随美国，承认台湾当局，敌视中国，使中日之间无法进行正常交往，两国关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仍然富于远见地主张，要把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严格区分开来。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制定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方针，即从增加两国人民交往，增进民间团体协商和开展民间经济、文化交流开始，来打开中日关系，恢复和发展两国人民的传统友好关系，进而推动日本政府改变政策。由于中国坚持以这一正确的方针为指导，不懈地为发展中日关系而努力，因而，尽管两国还没有恢复正常关系，而且按照国际法还存在着战争状态，但这些没有阻挡住两国人民的友好活动和签订民间协议。民间外交促进了两国人民间的相互理解和感情联系，尤其在日本涌现了一批致力于重建中日关系的人士，形成了一支包括各阶层人士的极其广泛的对华友好力量。

在大力开展民间外交的同时，中国还注意与日本官方的联系，及时做争取工作。一方面，积极促进日本官方对华友好力量的发展；另一方面，对日本政府的错误对华政策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反对恶化中日关系的

---

《邓小平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的谈话》，1978年7月9日。

逆流。到了60年代，两国关系由民间发展到“半官半民”的性质。“廖承志——高碕达之助贸易”的开始，双方互设贸易办事处，使两国间有了半官半民的联系渠道。进入70年代，随着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别是中美接近给日本造成很大冲击，日本各界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运动更加高涨，成了不可阻挡的潮流。周恩来抓住时机，积极推动愿为中日复交而努力的田中首相访华。1972年9月29日，两国领导人经过谈判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宣告两国结束不正常状态。

可以说，中日两国人民间的传统友谊构成了推动中日关系前进的巨大的内在动力，其中中国的民间外交策略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的作用。而中日邦交的恢复又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并增加了官方渠道，形成了官民并举的局面。

中日邦交恢复后，中日两国所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如何把两国关系进一步推向前进，如何巩固和发展业已建立起来的和平友好关系。一个非常现实而具体的任务，便是尽快缔结两国和平友好条约。

中日联合声明无疑是一个创举。在媾和条约一时难以签订的情况下，采用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的方式结束两国间的战争状态，恢复邦交，这是史无前例的。就日本方面而言，这样做可以绕过国会，无须经其批准，这就减少了障碍，不延误有利时机。

但是，联合声明毕竟是两国政府间的政治性声明，要使两国关系的基础得以进一步巩固，必须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再迈进一步，为两国关系奠定法律方面的基础，提供法律保障。这就要求必须尽快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国际法的角度讲，交战国之间战争状态的结束，应该是以缔结和约为标志。此外，从邦交恢复后两国关系发展的实践来看，中日缔约也是非常必要的。

更为重要的是，为了两国世代友好相处，必须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2年中日两国领导人谈到发表联合声明时，在要不要在声明中写上“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谈判”一条的问题上，日方曾觉得“既然有了联合声明，就可以不再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了”。对此，周恩来在举行第二轮首脑会谈时指出：“田中先生，这不单是为了你我友好下去，而是为了中日两国子子孙孙友好下去。”因为条约将规定保证两国和平友好相处下去的各项原则。

1978年6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广播协会访华代表团时，就有关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问题告诉客人：“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是众所周知的。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已有一千多年，两国不友好的历史仅仅有半个多世纪，而且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都要向前看。”他还说：“中日两国人民休戚相关，我们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前景是良好的”，“祝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这说明，中国对于中日缔约的着眼点不仅在于当前，而主要在于未来；不仅为着两国现在的人民友好相处，更是为着两国的子孙后代友好下去。相对而言，日本某些政治家出于上时的某种考虑，或者碍于某种外来压力，在中日缔约问题上表示

---

又称“备忘录贸易”或“L-T贸易”。1962年11月9日，廖承志与高碕达之助根据1962年9月周恩来和松村谦三关于扩大中日贸易的会谈的宗旨，签订了关于中日贸易的《备忘录》。

[日]永野信利：《日中建交谈判纪实》，时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52页。

张暄编著，《当代中日关系四十年》，时事出版社1993年版，第384页。

出瞻前顾后、踌躇再三的特点。

再次，邓小平考虑中日缔约是为中国的既定国策服务。除了前已提到的为国内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之外，还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所需的资金和技术方面的考虑。

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中共中央重申“全党要为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成了中国的既定国策。当时的状况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经济建设进程遭到严重干扰和破坏，科学技术水平与世界科技水平之间的差距更大了。在这样的基础上搞现代化建设无疑是非常困难的，然而也是非常必需的。中国领导人既对存在的困难十分清楚，也对实现“四化”充满信心。邓小平在1978年5月会见来访的外宾时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清醒地看到这是一件艰巨的事情，但是能够做到的。首先是我们有全党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我们的人民是勤劳的人民，有着艰苦奋斗的传统。其次是我们已经建立了相当的物质基础。还有就是我们制定了明确的方针，要利用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这就是说，利用世界上先进技术和先进成果，是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进行国内建设的一个明确的方针。同样，它也是中国开展国际交往的一个明确的目标。

70年代中期日本已是世界经济大国，也是科技较为发达的国家，日本向中国提供“四化”建设所需的资金和技术是可能的。从另一方面说，日本资源贫乏，国内市场小，而中国则有着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日本向中国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双方开展经贸往来，对两国都是必要的、有益的。1974年，两国政府正式缔结了两国间第一个官方贸易协定，双方相互提供最惠贸易国待遇，并设立“贸易混合委员会”，作为发展两国贸易关系的促进机构。自此，中日之间的贸易往来从过去的民间和半官半民，发展到官民并举的新阶段。

但是，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平。到1978年，双方的贸易总额也只有48亿多美元；两国之间没有资金合作关系；技术贸易虽然起步较早（始于1963年中国进口日本维尼龙成套设备），也为中国的技术进步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贸易额较小，而且存在着日方在转让技术上比较保守、转让技术软件少硬件多、技术先进性不强等问题。

中日经贸往来之所以没有充分展开，固然有两国各自国内的原因以及国际上的影响，但就两国关系的角度而言，两国之间没有一个正式的政治总结，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经贸关系的发展，要求必须由两国良好的政治关系作保障；稳固的政治关系则会为两国经贸往来开辟广阔的前景。

因此，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进一步发展两国经贸关系的前提；换句话说，中日缔约将会促进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为中国从日本吸取支持“四化”建设所需的资金和技术创造必要的条件。邓小平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上说，中日缔约“为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

---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1页。

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等方面的交流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还说，“中国现在在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我们的工业化水平还很低，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同时也要学习国外一切先进经验。我们愿意向伟大的日本人民学习”。“我们向日本学习的地方很多，也会借助于日本的科学技术甚至于资金。我们之间已经签订了一个长期贸易协议，但只有这一个还不够，那是两百亿美元，还要再加一倍至两倍”。

这说明，中日缔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寻求必要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也是邓小平的一个战略思考。联系到正是在中日缔约的 1978 年，中国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就更能体会到这一思考的意义。

不仅如此，中日缔约，从而促进中日经贸等关系进一步发展，还将对别的发达国家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产生影响，促进这些国家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开辟更为广阔的资金、技术来源。一些欧洲国家的人士曾问邓小平：“你们和日本搞得这么多，是不是我们就没有事干了？”邓小平告诉他们，“不要担心”，需要他们同日本“竞赛一下”。

## 二邓小平与中日缔约谈判

邓小平不仅对中日缔约作出了战略思考，制定了正确的对日方针和原则，而且身体力行，克服重重障碍，为中日缔约谈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 1. 抓住有利时机，促使日本恢复与中国进行缔约 谈判

中日缔约正式谈判始于 1975 年 4 月，在此之前，两国曾就缔约进行过历时 5 个多月的 5 次预备性谈判。到 1975 年 9 月，日本外相宫泽喜一向中国外长乔冠华提出所谓“宫泽四原则”，条约谈判随之中断。两年又 10 个月后，双方于 1978 年 7 月重开谈判。可以说，整个缔约谈判过程是一波三折。

中日缔约谈判之所以“山重水复”，历时冗长，主要原因在于双方在“反霸条款”问题上意见不一，一时又难以取得共识。中方坚持必须把中日联合声明的第七条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写入条约；日方先是反对中方的主张，继而又坚持如果条约中包含反霸条款，则必须再加上一个“第三国条款”，即：“本条约不是针对某个第三国的”，或者“本条约不是针对任何第三国的”。

照理说，既然两国在 1972 年的联合声明中写明了反霸条款，将其搬入条约对日方来说应该是不存在什么困难的。

然而，为什么日本在 1972 年同意在联合声明中写上反霸条款，而不同意将反霸条款原封不动地写进条约呢？

原因就在于苏联从中作梗，对日本施加压力，干扰中日缔约谈判。日本

---

参见《中日友好关系的新阶段》.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0、42 页。

参见《中日友好关系的新阶段》，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45 页。

1991 年 11 月任日本首相。

政府慑于苏联的威胁，谈“反霸”色变，怕开罪于苏，因而迟迟不同意中方的主张，或者对反霸条款作出附加，千方百计地抽掉反霸条款的灵魂，淡化其“反苏”色彩。

1974年，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邓小平在1974年联大特别会议上全面阐发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并说明了中国的对外政策。1975年，“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的反霸战略的目标，在60年代末为“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反霸的重点逐步转向苏联，“反对两霸、侧重反对苏霸”；70年代中期以后，反霸的目标变为“集中反对苏霸”。日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反霸”成了“反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同义语。日本奉行“对中苏等距离”的外交方针，极力避免卷入中苏冲突，尽管苏联对日本也构成了政治、军事等现实威胁，但日本政府坚持“不与苏联公开为敌”的政策。

日本之所以患有如此严重的“恐苏病”，其主要依据是：（1）在军事上，日本必须推行“不敌视任何国家”的“和平战略”。日本认为，苏联是超级军事大国，凭借它在远东和太平洋的军事力量，形成对日本战略包围态势，并严重威胁日本“生死攸关的海上通道”。日本是“战略上极其脆弱”的国家，为了“生存和繁荣”，必须争取同苏联维持“和平共处”的局面。如果日本完全“卷入”中国的对苏战略，必将给日本的安全“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2）在经济上，需要“从四面八方搞资源”，“和东西南北做买卖”。西伯利亚的资源和苏联东欧的市场对日本有不小的吸引力。在北冰洋渔业问题上，日本也有求于苏。因此，为了捞取经济实惠，日本也不愿把日苏关系搞僵。（3）在外交上，必须坚持日美合作，“同中苏都友好”的“自主路线”。日本认为，它多年来就是凭借其经济实力和“多边均衡外交”，得以迅速提高国际地位，同苏联保持关系本身就是一种谈判的实力。如果对苏外交不留回旋余地，不仅归还北方四岛无望，而且会给以后的日本外交留下“祸根”。同时，随着经济力量的壮大，日本政府越来越强调其所谓“自主性”。在同中、苏甚至美打交道时，极力避免给人以“完全屈服”或被别国“牵着鼻子走”的印象。（4）在内政上，防止由于对中苏外交的分歧引起政局混乱，防止自民党因此而分裂，导致一党执政的丧失。

因此，在中日缔约问题上，日本总是说“要搞，要搞”，但总是迈“踌躇步”，总怕进入“美、中、日对苏的联合战线”。

那么，到了1978年，日本缘何同意与中国恢复缔约谈判，进而在1978年8月完成了缔约呢？

总的说来，是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及两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形成了有利于恢复缔约谈判的时机。具体地说，有以下几方的原因：

其一，美国对中日缔约态度变化及中美接近对日本的影响。

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和美国实力的继续衰落，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的考虑，需要借助中国力量遏制苏联。因此，形成良好、稳定的美中、日中关系以维护亚洲的稳定，抵御苏联对亚洲的渗透，便成了美国亚洲战略的重要内容。1978年5月美日两国首脑会谈时，美国强调，维持日中、美中的友好关系是稳定亚洲的前提。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美国对中日缔约的态度变化很大。在以往的日美会谈中，美国只是说“没有异议”，而在1978年5月的会谈中，卡特对福田说，对日中友好关系的进展感到高兴，“预祝日中

缔约成功”。美国务卿万斯更是公开表示“赞赏和强力支持”。日本外相园田直在美日会谈后告诉记者，这次会谈的特点就是美国强力支持日中条约的进展。毫无疑问，美国的态度对于处于犹豫状态的日本政府是一个有力的促动。

到 1978 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脚步正悄然而迅速地迈进。中国出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考虑，努力促成中、美、日、欧联合对抗苏联扩张的战略格局，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共同的威胁面前，中美由于相互需要走得更近了。1978 年 5 月 23 日，美国总统助理布热津斯基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后，取道日本与福田会谈，介绍了中国对缔约持向前看的态度，并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说：“美中关系和友谊以及关系正常化是有益于世界和平的”，“从我们的观点看，一个强大而安全的中国是有益于世界和平的，我们认为，一个强有力并参与全球事务的美国也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给日本以中美关系已经取得进展的印象。日本政府估计，美国将在卡特任期内设法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日本政府担心会再来一次“卡特冲击”，因而决心中日缔约要走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前面。

其二，日本各界要求尽早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呼声逐步高涨，对日本政府形成了压力，反对势力分化。

自从中日联合声明发表以后，日本人民就要求尽快缔结两国和平友好条约，一贯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的一些民间组织和人士，一再举行集会，通过决议，向政府提出呼吁书，递交数万人签名的签名簿等，力促政府在缔约问题上向前迈步。

在执政的自民党内，围绕中日缔约问题，形成了“促进派”和“慎重派”两大势力，两派之间的争执日趋激烈，总的发展趋势是“促进派”逐步占取优势。1977 年 10 月，以田中、大平和保利茂为后盾的“促进派”，通过“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亚非问题研究会”以及“促进缔结日中条约协议会”等组织，集中力量，扩大影响，分化瓦解右派势力，迫使福田在缔约问题上向前走。他们还与绝大多数在野党保持某种程度的联合，形成对福田内阁的“内外夹攻”之势。这股力量对福田来说，既是一种公开的压力，又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另一方面，以右派为骨干的“慎重派”则逐步分化。面对朝野要求尽快缔约的呼声渐高的形势，极右派也不得不改变以往的腔调，称不是反对缔约，而是希望慎重。“慎重派”中的多数人，尤其是福田派的成员虽然态度谨慎，但与极右派不同，有的认为，为了支持福田政权，缔约也是不得已的，有的表示，只要福田作出决断就坚决支持。

日本财界的态度对于靠财界提供政党政治资金的政界的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以往，财界巨头中多数人对中日缔约都采取回避或消极态度。随着两国经济贸易往来日渐活跃，到 1977 年，情况出现了变化。绝大多数财界巨头都明确主张尽早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经团联”副会长、钢铁巨头稻山嘉宽说，“在经济界人士中，几乎没有人反对缔结日中条约。”另一位负责向政党提供资金的副会长花村仁八郎表示，把反霸条款原封不动地写入正

---

[日]永野信利：《日中建交谈判纪实》，时事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64 页。

吴学文：《日本外交轨迹》，时事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26 页。

即“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

吴学文：《日本外交轨迹》，时事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23 页。

文也不应成为问题。“经团联”会长土光敏夫和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永野重雄，以往对中日条约不肯明确表态，但到1977年却在给福田《要求早日缔约呼吁书》上签了名，土光敏夫对新闻界说，“日中关系应该友好地发展下去，应该尽快地缔结友好的正常的政府间条约，对此我们也抱有热忱。”对政府影响较大的三菱财团在1977年11月底访华时，也表示要为缔约作出贡献。

日本财界态度转变的原因在于其逐步认识到，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依赖于政治关系的稳定。1978年2月中日长期贸易协议签订后，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财界认为，中日经济上正常化的体制已完全齐备，下一步只差给它加上“灵魂”——签订条约了。

其三，日本“恐苏病”减轻。

苏联的“高压外交”曾“有效”地干扰了中日缔约谈判的进程，但是，苏联一味地施压却又从反面教育了日本，使日本各界对苏态度普遍发生了变化，不甘心屈服于苏联的压力，要求加强自主的倾向明显增长。到1978年，日本国内在议论中日条约问题时，反对苏联干涉的言论显著增多。多数人不再渲染中日缔约会恶化日苏关系，而是强调不能因怕苏联反对就不再搞中日条约。《每日新闻》和《东京新闻》指出，日中条约是日中之间的问题，无须征得苏联的同意，不管苏联施加何种压力，也应决心在日中问题上明确开展自主外交。《日本经济新闻》和《读卖新闻》，不仅反对在中日条约问题上“被苏联牵着鼻子走”，而且明确提出要苏联也接受反霸条款。一些日本学者指出，日本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由于苏联的压力，外交选择权受到制约，不就意味着缓慢地芬兰化吗！甚至连右派代表人物椎名悦三郎也表示，日中缔约是五年前的诺言，如果一味忧虑苏联的反应，就有损于日本外交上的独立性。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政府在外交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对苏联较过去硬了一些，日本政府曾打算在日苏关系走上正轨后再处理中日条约问题，但是日苏关系总也不能走上“正轨”。日本政府总结教训，采取“日中是日中，日苏是日苏”的方针。在1977年11月内阁改组时，对中日缔约态度比较积极的园田直被任命为外相。日本外务省、防卫厅、日本驻苏使馆等也纷纷发表意见，强调日本应着手处理中日条约悬案，认为只要说明反霸条款不是针对第三国的，即使日苏关系一时冷却也是不得已；并宣传日苏关系恶化对苏联更为不利，因此不必过分担心苏联“报复”。

其四，福田为了蝉联自民党总裁之职，需要在外交上有所作为，捞取政治资本。

到1978年，福田无意履行他与大平正芳在1976年达成的“执政两年后让位于大平”的协议，为蝉联党魁，继续执政两年，在1977年底就对党政人事安排作了较大调整，加强自己在内阁和自民党内的地位。但福田执政后建树不多，手里没有蝉联总裁稳操胜券的王牌。

为了战胜欲取而代之的大平正芳，福田打算采取两方面的措施。一是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以大选的胜利逼迫大平妥协；二是在外交上搞点名堂，若能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可算是日本外交上一大成就，便可为再次当选增加资本。福田上台后，在中日缔约问题上迟迟不下决断，踌躇不前，处境

---

吴学文：《日本外交轨迹》，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页。

时任自民党干事长，1978年12月1日当选自民党总裁，12月7日出任日本首相。

被动。1978年4月，日本驻华大使佐藤正二回东京述职时曾对福田说，这次谈判是最后机会，失去这个机会，就不可能由福田来缔约了。促使福田早下决心，恢复谈判，利用谈判缓和各方压力，改善自己的形象。谈成是其可以利用的资本，谈不成就把责任推到中国方面，并说是从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考虑才不得不把条约搁置起来，另一方面，外务省为了对付国内反对派和苏联的反对，还为中日缔约准备了如下解释：（1）日中缔约会得到东盟国家的赞成，对日本发展同东盟国家的关系有利；（2）外务省经过查找各种文件，发现1975年联大也通过一个有反对霸权主义字样的正式文件，把反霸写进国际文件是有先例的；（3）条约中写进反霸条款，对究竟什么是霸权，中国可以有中国的判断，日本可以有日本的判断，在这一点上，日本不会受中国的约束。

其五，两国政局的变化为中日缔约谈判也创造了良好的契机。

中国一直是中日缔约的积极推动者，即便是在“左”倾思潮仍风行的“文革”后期，中国政府也始终如一地努力争取中日早日完成缔约。因此，就中国方面而言，不存在阻碍中日缔约的因素。

无可讳言的是，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影响到了日本方面处理对华关系时的思考。这种影响又有两种性质的，一种是消极的，另一种是积极的。客观地说，消极影响非常有限，持续时间也很短；而积极影响则比较大。

1976年初周恩来逝世，紧接着邓小平被错误地解职，日本认为“中国形势动荡”。当年9月，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逝世，日本非常关注中国将“由谁来掌权”，“务实派能不能东山再起”等问题。恰在同一年，日本政局也出现了动荡，自民党内要三木武夫首相下台的人占了多数，围绕谁继任首相之职，党内派别斗争愈演愈烈。到10月底，福田和大平请福田派的园田直、大平派的铃木善幸、自民党元老保利茂到场，签署了《大福两年轮流执政密约》，规定由福田先担任首相两年，尔后把首相职务让给大平。这才结束纷争，福田纠夫当选新总裁，在12月组成福田内阁。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邓小平恢复工作后，日本认为，中国的“务实派”占了上风。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大召开，日本认为，中国“建立了第二代领导体制，做好了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准备”，认为十一大选出的领导班子“是一个向着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这一既定目标前进的、高效率的领导体制”，“在军内受到绝对信任的叶副主席、万能的实力人物邓副主席参加的支撑华体制的新领导阵容，将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稳定的领导班子”，认为“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的特点，就是起用党政军中大批老干部”。中国政局的稳定，促使日本做出考虑。日本认为，“对日本来说，出现了一种局面，即：必须加快同中国方面进行谈判，争取早日缔结成为悬案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以便把（日中）经济交流纳入稳定、平衡和扩大的轨道，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和平与稳定的环境”，“日中关系已经到了

---

[日]永野信利：《日中建交谈判记实》，时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122、123页。

[日]永野信利：《日中建交谈判记实》，时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126页。

《日本经济新闻》1977年8月23日社论。

日本共同社1977年8月21日电。

不允许再放置不管的阶段了”。日本外务省表示“要更加密切注意缔结悬而未决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时机”。——

善于抓住机遇对一个人的发展来说是重要的；抓住机遇，对于两个国家发展关系同样是重要的；抓住机遇，对于两国在某个问题上陷入僵局时打开僵局尤为重要。

对于国际形势和两国国内形势发展为中日缔约带来的机遇，邓小平是看得非常清楚的。他力促日本抓住有利时机，尽早与中国缔约。在他恢复工作后不久，他就告诉来访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福田首相表示要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我们对他寄予希望。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如果就缔结条约这个问题来说，一秒钟就可以解决。”意思很清楚，机会难得，要福田早下决断。

1978年3月，日本公明党第六次访华团团长矢野绚，带着福田的“口信”访问中国。矢野向邓小平转达了福田决心早日缔结条约的立场，要求中方给予理解。邓小平表达了中方的立场，并且表示“希望福田首相做出决断，欢迎园田外相访华”。

矢野回国后，将邓小平所表示的中方意见向福田作了汇报。一周后，福田终于下决心重开日中条约谈判，并开始协调自民党内意见。5月31日，日本驻华大使奉命会见中国韩念龙副外长，提出重开谈判缔结条约的问题。

1978年7月21日，时隔2年10个月后，中日缔约谈判终于恢复。

## 2. 针对缔约谈判中双方主要争论的问题发表见解，做日方的工作。

如前所述，中日缔约谈判之所以历时数年，主要原因是双方在反霸条款问题上的立场相去甚远，又一时难以协调。

1974年11月，赴日代表中国政府在中日海运协定上签字的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就中日缔约与日本外务次官东乡文彦进行第一次预备性会谈。韩念龙表示，条约的基本内容必须包含反霸条款。东乡则表示，反霸问题不属于本条约的范围。1975年1月，中国驻日大使陈楚与东乡文彦就缔约进行第二次政府问预备性会谈时，日方又借口“霸权”一词生辟，在过去很少作为条约术语使用，反对把反霸条款写进条约。

其实，日本反对把反霸条款写入条约，真正的原因在于日本由于受到苏联的压力，怕得罪苏联。1975年1月16日，就在中日第二次预备性会谈的同一天，在苏联的要求下，日本外相宫泽喜一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也在莫斯科就缔结苏日和平友好条约开始举行谈判，这显然是为了牵制中日缔约谈判。2月3日，苏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会见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对中日缔约谈判表示担心，说“日本正要缔结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不会给苏联带来好影响”，要求停止条约谈判。2月4日莫斯科广播则说，日中条约的谈判是在反苏的空气中进行的。2月14日，特罗扬诺夫斯基拜会三木首相，递交了勃列日涅夫的亲笔信。该信提出“一面进行日苏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

---

《日本经济新闻》1977年8月23日社论。

《邓小平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的谈话》，1977年9月10日。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 1945—199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26 页。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 1945—199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80 页。

一面进行缔结睦邻合作条约。”6月17日，苏联政府向日本政府提交声明，反对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中写上“反霸条款”这样，在随后举行的第三、第四、第五次预备性会谈以及陈楚与东乡文彦进行的正式会谈中，中日各持己见，谈判没有任何进展。

三木试图说服中国作出让步，不在条约中写上反霸条款。他指示日本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他的几点意见，主要是希望中方理解日本的立场，做出让步。小川会见乔冠华外长，请乔冠华“向周恩来总理转告三木首相对缔结条约的热情”。周恩来于1975年6月在医院会见访华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藤山爱一郎时，就三木的想法作了中方的回答。藤山一回国，三木就把他请到首相官邸，打听中方的想法。但中国的立场一如既往，而且藤山也表示“反霸条款应写入条约”。

由于中方原则立场的坚定性，三木在反霸条款问题上的态度有所变化，认为反对霸权“同主张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和平共处五原则，以及主张解决纠纷不得使用武力的联合国宪章一样，是全世界普遍适用的原则。”

但同时又认为，“这是一项全世界普遍适用的原则，不言而喻不是针对某个第三国的。”1975年9月，日本外相宫泽喜一在与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外长乔冠华会谈时，提出了所谓“宫泽四原则”，即：（1）不仅要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而且要在世界各地反对霸权；（2）反对霸权不是针对某个第三国的；（3）反对霸权并不意味着日中采取联合行动；（4）不得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发生矛盾。据此，日方于1975年11月提出一个条约修正草案，这个草案虽把不谋求和反对霸权写进了条约，但又强调“条约任何规定都不得解释为针对任何第三国”等。

很显然，如果根据日方的主张来缔约，反霸条款便成了几句空话。签订这样一个抽去了反霸条款实质内容的条约，是从中日联合声明倒退。在这样一个事关根本原则的问题上，中方当然不能让步，苟同于日方。至此，中日缔约谈判停了下来。

从此，中日在缔约问题上的争执便集中在了“第三国条款”问题上。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两国国内形势的发展以及日本“恐苏病”的减轻，出现了有利于中日缔约的时机。而能否抓住时机，了结中日关系上这一悬案，关键就在于如何处置中日双方所见悬殊的“反霸条款”、“第三国条款”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促使日方在原来的立场上向前迈步，邓小平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1）劝告日本领导人，要站在全球的高度看待反霸条款和考虑中日缔约。

邓小平在会见访华的日本客人时说：“在谈判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中日双方都要从全球战略和政治观点出发。我相信日本人民和日本大多数政治家懂得这一点。”他反复告诫外国政治家，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在中

---

吴学文：《日本外交轨迹》，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页。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1945—199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8页。

[日]永野信利：《日中建交谈判纪实》，时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110、111页。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1945—199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4页。

张暄编著，《当代中日关系四十年》，第384页。

苏边界地区，苏联只有一百万，挑起一些冲突有可能，要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不可能的。“苏联要进攻中国，一百万人算什么，它没有五百万，六百万，来不了，即使来了，占领了北京（这也不容易），占领东北某些地方，甚至更多地方，也只是战争的开始。”“我们中国自己是放心的，因为我们有明确的战略方向。”他还指出，欧洲和日本几乎所有战略物资都依靠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各方面的基本点是保护通道。苏联向欧洲国家施加越来越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更重要的是它想从侧翼，从南面包围欧洲。它企图在中东取得战略资源，建立或扩大军事基地，它想控制埃塞俄比亚、南也门、控制海上要道。如果苏联的战略部署得以实现，西方的石油供应将面临很大的威胁，对日本、美国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就亚大地区而言，苏联加紧控制金兰湾、观港和西哈努克港，进一步卡住太平洋，马六甲海峡紧急时很容易中断。如若苏联在阿富汗得手，就可以从陆上南下，配合控制整个中东地区，包抄欧洲。邓小平说，“有人讲，苏联的这些行动是为了包围中国。中国不怕包围，中国革命的历史表明，中国是从包围中冲出来的。苏联在越南大搞军事基地，当然包括针对中国，但仅是针对中国吗？金兰湾离中国很远，切断海上交通，对中国威胁不大，对日本、东南亚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威胁更大，美国第七舰队也不舒服。这不是针对中国的问题，也不是亚洲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问题。”“过去我们总是说，苏联在东方摆一百万军队，第一是对付美国的，其次是对付日本和中国。我们提出这个论据时，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还不大赞成。现在，至少相当多的人已经懂得了这点。”“过去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说苏联战略重点在欧洲，欧洲人不大接受，认为中国人危言耸听。现在美国人、欧洲人大概都懂得这点了，他们认识到中国人讲的是真话。根据客观的实际作出的正确判断嘛。”

因此，中日两国缔结包含反霸条款的条约，其意义远远超出两国关系的范围，中国考虑问题是从全球的观点、政治的观点出发的。如果中日都能从全球战略和政治的观点出发来考虑中日关系，那么就很容易在反霸问题上达成共识。相反，如果仅仅从自身眼前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就难免各唱各的调，谈不拢。

邓小平高瞻远瞩的分析，令许多外国政治家赞赏，对于中日双方缔约谈判在反霸问题上形成共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处理“反霸条款”和“第三国条款”问题。

如前所述，在中日缔约谈判中，日方先是反对将反霸条款写进条约，继而在中国的坚持下，虽然同意在条约中写上反霸条款，但又提出第三国条款问题，意在使反霸变得无内容，无对象。如何处理第三国条款问题，成了谈判能否取得进展的关键。

对此，中国方面一方面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不退让，另一方面，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也做出了某种妥协，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

1978年5月，日本首相福田委托日本公明党访华团团长矢野绚转达日方

---

《邓小平会见美国参议员杰克逊的谈话》，1978年2月16日。

《邓小平会见美国会议员困的谈话》，1978年7月9日。

《邓小平会见泰中友好协会代表团的谈话》，1978年6月15日。

对中日条约的立场，要求中方予以理解。邓小平向矢野明确表示：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遵照中日联合声明早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发展两国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变化；

中国方面认为，中日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基础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中日两国都不谋求霸权，也反对其他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谋求霸权。一方面说反对霸权，另一方面又说不是针对谁的，反对霸权无对象不合逻辑。事实上的霸权主义不但威胁着中国，也威胁着日本；

中日两国都有自己的外交政策，双方互不干涉对方的内政；

关于重开条约谈判问题，中国方面不存在任何障碍，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希望福田首相做出决断，欢迎园田直外相访华。

这就告诉日本，反霸不能没有对象，这一点中国的立场是一贯的。但是，毫无疑问，坚持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是干涉内政，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对外政策，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如同其对内政策一样，都属于内政，别国不应干涉。中国不会干涉日本的对外政策，日本也不能干涉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就是说，各自在处理与别的国家的关系时是自主的。

矢野回国转达中方的立场后，日方对邓小平“中日两国都有自己的外交政策，双方互不干涉内政”的说法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方已经考虑了日本的立场，就等着首相下决心了”这就为中日双方在处理第三国条款问题上达成不损害反霸条款精神实质的妥协，奠定了某种思想上和方法论方面的基础；并对日本政府早下决断，恢复缔约谈判，起到了推动作用。

针对日方害怕反霸“矛头所指”的问题，邓小平在会见为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而访华的日本外相园田直时说：“条约的中心内容实际上就是反霸。反霸不针对第三国，但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苏联反对这一条，正是暴露了他自己。”他还说：“在当今国际形势下，我们需要日本的帮助，日本也需要中国的某些帮助。”也就是说，霸权主义确实存在并威胁着中日两国，两国都面临着反对霸权主义威胁的共同任务，这是目前最大的政治问题。中国副总理耿飏在会见日本社会民主联合访华团时告诉客人“反霸权，我们也没有说指的是谁。约束就是约束我们两家自己。一条，要求我们中国自己不搞霸权主义，使日本朋友和日本人民放心。还有一条，坦率地说，我们也不希望日本再一次到我们中国大陆上来称霸。主要就是约束我们两家自己的一句话。如果里边也包含别的国家，就是说，如果别的国家到我们这个地方来称霸，我们两国都反对，这对我们两国都有好处。”中国对反霸条款的解释是人情人理的。反对霸权首先是约束中日两家，谁也不能称霸，两国世代友好下去；如果两国都面临霸权主义的威胁，自然要共同反对霸权主义。苏联之所以在反霸条款问题上“对号入座”，反对霸权条款，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它起草的苏日睦邻合作条约对日本条件苛刻，中日条约签订了，它那个条约就不好拿出来了；二是苏联占着日本北方四岛，不好交待。

---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 1945—199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26 页。

参见[日]永野信利：《日中建交谈判纪实》，时事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50 页。

《邓小平会见日本外相园田直的谈话》，1978 年 8 月 12 日。

《耿飏会见日本社会民主联合访华团的谈话》，1978 年 4 月 15 日。

中国在反霸问题上立场坚定，但也充分考虑到了日本的处境，并在条约文字上照顾到了这一点。邓小平对园田直说：“两国的处境不同，立场就不同，中国对苏联讲的话，日本就不能讲。”这一点，充分显示了中国一贯替朋友考虑，顾大局的宽广胸怀，也显示出中国领导人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外交艺术。

正由于如此，中日双方终于在第三国条款上达成妥协，最后在条约中将其表述为：“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

### 3. 对中日关系中存在的其它问题，主张求同存异，排除影响缔约的各种障碍

除了上述“反霸条款”、“第三国条款”问题之外，中日关系中存在的另两个问题如若处置不当，也将影响到条约的签订。

一是领土争端问题，即钓鱼岛问题及东海大陆架问题。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国台湾的附属岛屿，面积为6.3平方公里，根本不属于琉球，即现在的冲绳。16世纪中叶，明朝嘉靖年间的文献中就有关于该岛的记载，当时中国皇帝派往琉球的册封使的航行路线也是以钓鱼岛为航标的。钓鱼岛在明朝就已经在中国海防区域内。清朝光绪十九年（1893年），由于该岛能采集到名贵中药，慈禧太后发布诏书，将该岛赐与盛宣怀。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在日本政府强迫下于1895年4月签订了《日中下关条约》，即《马关条约》，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被割让给日本。其后，日本将该岛改称为“尖阁列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将其非法侵占50年的台湾归还给了中国，却将钓鱼岛私自交给美国。1972年美国将冲绳交还日本，该区域又为日本控制。1971年5月，中国《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坚决反对把钓鱼岛纳入冲绳区域内归还给日本。同年12月，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再一次指出：钓鱼岛作为台湾的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日本坚持其对钓鱼岛拥有主权，称该岛原为无人岛，是日本人发现并命名的；在历史上该岛既不属于琉球王国，也不属于台湾，而是“无主岛”，根据国际法中的“先占原则”，日本最早管辖该岛，理应属于日本，等等。

中日双方争执不下，中方以历史为据，坚持固有领土；日方以“先占”为由，主张拥有主权。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谈判及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均未触及钓鱼岛问题。

1974年1月，日本政府和韩国政府背着中国在东海大陆架划定了所谓“共同开发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所谓日韩“共同开发区”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中国政府绝对不会同意。1977年6月，日本政府强使“日韩共同开发大陆架协定”在国会获得“自然批准”，中国政府就此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1978年4月，中国渔民在钓鱼岛海域捕鱼，遭到日本自卫队的拦截。当时正值中日两国准备恢复缔约谈判之际，日本的报纸、广播大造舆论，苏联也趁机从中挑拨，说这是中国有计划的行动。这便是所谓“钓鱼岛事件”。耿飚告诉来访的日本客人，这纯粹是一个偶然事件，渔民不是去占领钓鱼岛，

---

《邓小平会见日本外相园田直的谈话》，1978年8月12日。

鲁义：《当前中日关系中的几个问题》.载于《现代日本经济》1995年第2~3期。

是为了捕鱼，追赶鱼群，到岛屿附近去，也没有上岛上去。“至于钓鱼岛问题，是早已明确的，是我们的。你们说是你们的，双方有争议，何必现在去争，将来慢慢解决，现在挂起来。”中国提醒日本，警惕有人利用这一偶然事件，借故拖延中日缔约谈判。日方接受了中方的解释。这样，日方鼓噪一时的“钓鱼岛事件”才算平息下来。

但是，来华进行缔约谈判的日本外相园田直，在福田的训令下，在与邓小平会谈时，再次提出“尖阁列岛”问题，说如果他这个外相不提出这个问题，就“无颜见江东父老”。

显然，如果领土争执问题处置不当，便可能影响到中日缔约。

对此，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求同存异。他在会见园田直时说：“中日之间不是没有任何问题，例如钓鱼岛问题，大陆架问题。这样的问题，现在不要牵进去，可以摆在一边，以后从容地讨论。”还说：“我们之间共同点很多，可以求大同，存小异，我们要寻求更多的共同点，寻求更多的相互合作、帮助和配合的途径。”这一处置办法得到了日方的赞同，可能会影响缔约的领土问题方面的障碍被克服了。

二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按照毛泽东“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为了废除国民党政府与苏联1945年签订的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适应中国革命胜利后国际关系的新形势和中苏关系的新变化，毛泽东、周恩来赴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谈判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一条约的签订和生效，使中苏关系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中国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以便放手进行国内建设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和平。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4月11日生效，有效期为30年。如果在期满前一年缔约的任何一方不提出终止该条约，则条约将自动延期5年。这样，到1979年，中国作为缔约一方，必须对条约是否延期作出决定，1978年中日进行缔约谈判时，日方提出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届时是否废除”的问题。

日本为何对中苏条约是否废除如此关注，并和中日缔约联系起来呢？原因在于，中苏条约的宗旨和主要目标是：加强中苏的“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条约第一条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努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略，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显然，中苏条约是50年代初期国际形势下的产物。在这之后，苏联和中国同日本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苏联早在1956年就同日本发表联合宣言，宣

---

《耿飚会见日本社会民主联合访华团的谈话》，1978年4月15日。

参见[日]永野信利：《日中建交谈判记实》，时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页。

《邓小平会见日本外相园田直的谈话》，1978年8月12日。

参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2页。

参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2页。

告结束战争状态，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与日本也在 1972 年 9 月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而且，从 60 年代起，苏联领导人粗暴地践踏了中苏条约的精神，导致两国关系的严重恶化。到了 70 年代，苏联又在中国的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加强军事压力，并支持越南反华。作为缔约一方的苏联不但不再是同中国一起共同捍卫两国的安全，而且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这就使得中苏条约名存实亡了。

尽管是“实亡”，但到 1978 年中日两国重开缔约谈判时，中苏条约毕竟是“名”尚存，还有形式存在。因而，日方提出会不会废除中苏条约的问题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园田直访华前，日本自民党曾做出规定，必须弄清楚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方可确定签约与否。于是，在与邓小平会谈时，园田直便提出了上述问题。邓小平告诉园田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是“名存实亡”，“那个条约规定，提前一年通知就可以废除。明年 4 月就到期了，我们将采取适当办法宣布废除。”

得到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园田总算放心了。

至此，中日缔约的所有障碍都被清除了。

### 三邓小平访日和中日缔约的意义与影响

1978 年 8 月 8 日至 13 日，日本外相园田直应邀访华，同中国政府举行缔约谈判，谈判取得圆满成功。8 月 12 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与中外历史上和约不同的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性质并不是战后处理的和约，而是规定和发展今后两国关系的条约。战后处理问题已在 1972 年两国邦交正常化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得到解决。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由前言和五项条款组成。

在前言中，最主要的内容是缔约双方充分肯定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确认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这些原则，包括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责任、中日战争状态和不正常状态的结束、中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和平共处五原则、反对霸权、台湾问题等。随着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上述问题中有一些已经得到解决；和平共处五原则和反对霸权在条约中另有明文规定，因此，前言中所说的应予严格遵守的原则，主要是指台湾问题，即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

条约的第二条即反霸条款是一个创举，是条约的中心内容，同时也是谈判中双方争执的焦点。在中美上海公报、中日联合声明以及中国同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联合声明中，都有反对霸权的内容。但是，在国际条约中写进反对霸权，这是第一次。它首先是约束中日两国，承担不谋求霸权的义务；其次是“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中日联合声明的反霸条款规定“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根据日方的建议，条约中增加了“或其他任何地区”，其用意在于表明反霸是所谓“普遍原则”。其实，扩大反霸的地区范围并不影响反霸条款的精神实质，因为在当时的国

---

[日]永野信利：《日中建交谈判纪实》，时事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00 页。

际形势下，苏联的霸权主义也确实不仅出现在亚大地区，在中东、非洲、拉美等世界各地都有表现；不仅苏联存在霸权主义，美国也有霸权主义表现。

条约的第四条规定“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这是双方妥协的结果，体现了中方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做了不损害原则的让步。如前已述，日方曾要求写为“本条约不是针对特定的第三国的”，日方的意思是反霸条款不是针对苏联的。经过双方反复磋商，做出了如上的妥协，既照顾了日本的处境和需要，对反霸原则也无损害。因为，两国各有自己的外交政策，并不因为缔结了条约而改变。

条约的第一条是关于和平共处五原则；第三条是有关经济、文化交流问题；第五条是有效期限和废除条款。

条约签订后的第四天，1978年8月16日，中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便批准了该条约。日本众参两院在条约签订后立即进行了审议，本来条约应由众参两院的外务委员会审议，可是，外务委员会以外的议员也提出希望进行质询，原因是，因为这是历史性的条约，进行质询可以“留名”于议事录中。

这样，审议的时间便延长了。到10月16日，众议院审议完毕，并立即送交参议院。参议院外务委员会当晚便开始审议。18日下午，条约在参议院也获得通过。20日，条约经日本内阁批准和天皇认证，完成了日本国内的全部批准手续。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应日本政府的邀请访问日本，参加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这是中国高级领导人战后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国土。邓小平是中日建交后访日的中国最高领导人。

日本政府对访问十分重视，接待规格非常高，给予极高的礼遇，为了保证邓小平访问的顺利进行，日本政府决定采取超过1974年保卫美国总统福特访日时的戒严体制。访问期间，警视厅每天动员1,2万名警察，在日本国会、首相官邸和政府官厅一带戒备森严。邓小平到千叶县君津新日铁工厂参观乘坐气垫船时，天空有直升飞机护航，船后有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艇尾随。日本报刊说是一切“陆、海、空横越东京湾的警备大作战”。日本各界对邓小平访日欢迎之热烈可谓空前。二百多家企业在邓小平访日前夕在东京五大报上大登“祝贺广告”，日中友好协会、日中经济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等组成实行委员会，举行庆祝缔约和欢迎邓小平访日的集会。访问日程一公布，各界人士纷纷向外务省提出会见邓小平的要求。为此，福田外相、安倍官房长官和外务省忙得不可开交。

访日期间，邓小平拜会了日本天皇裕仁，同日本首相福田举行了会谈，会见了长期为中日友好做出努力的各界人士。

10月23日，中日双方在东京日本首相官邸隆重举行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庄严宣告条约生效。

邓小平访问日本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在日本和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它标志着中日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起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具体他说，有几下几个方面的意义与影响：

#### 1. 对两国关系做出了政治总结

---

吴学文，《日本外交轨迹》，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129页。

吴学文：《日本外交轨迹》，时亨出版社1990年版，第129页。

1972年9月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结束两国间不正常状态，邦交恢复正常，从而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迅速。双方在1974年签订了贸易、航空、航海三个协定，1975年又签订了渔业协定。应该说，两国关系的发展是顺利的。尽管如此，从政治上说，由于没有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总是一大缺陷。正如邓小平所说，“这些年来，两国之间的关系本来相当频繁，但是政治上总有一点缺陷，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这个缺陷就弥补了。”条约的签订，为两国关系做出了政治总结，同时也是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新起点。

## 2. 改变了亚洲和世界政治结构，不利于苏联霸权主义

邓小平访日和中日条约的生效是战后世界史上一件大事，它不仅清除了半个多世纪两国处于战争的状态，而且远远超出了两国友好合作的范畴。在60年代末期，基辛格提出在国际政治中存在着美、苏、西欧、日本和中国“五个中心”。由于中国同西欧关系的发展和变化，中美的接近，特别是中日条约的生效，“五个中心”之中的四个逐渐趋向一致，结成对抗共同敌人——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西欧一些人士认为，中日缔约，在苏联的东方出现了另一条战线，减轻了苏联对西欧的压力。中日条约的生效，有利于抗衡苏联在亚大地区的霸权主义，对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同时也改变了世界政治结构。苏联之所以一再向日本施压，阻挠中日缔约，就是因为担心国际政治结构的变化不利于其自身。

## 3. 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

事物之间的影响总是相互的，在中美苏“大三角”和中美关系“解冻”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和日本由于相互需要也走到了一起。中美接近促进了中日关系的发展，美国对日本最终决心同中国缔约起到了促进作用。反过来，中日关系的发展也促进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随着中日条约的生效，美日安全条约的矛头就只对准苏联一家了。西方认为，中日条约实际上成了日美安全条约体制的一种“延长”。在中日条约的鼓舞下，美国也加快了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此外，中日关系正常化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创造了一个范例，即中美之间可以按照“日本方式”解决影响美中关系发展的台湾问题，在“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的基础上，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 4. 使两国间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产生了新的飞跃

中日间的经济合作与交流，是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要支柱。两国在经济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为了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日本的资金和技术；而日本则需要中国的原材料和市场，在经济上扩大与中国的交往，可以减轻其经济困难，缓和其同美、欧各国的经济矛盾。两国经济合作的潜力很大。邓小平访日和中日条约的生效，极大地促进了两国经贸往来。条约签订后，

---

《邓小平会见日本“论说”负责人访华团的谈话》，1978年9月6日。

1978年8月19日，日本通产省决定扩大中国原油的进口；10月，为了促进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日本通产省成立了“日本经济关系对策推进委员会”；1979年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时，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3,300亿日元（约合15亿美元）海外经济协力基金贷款，并从1980年4日起，向中国产品提供特惠关税待遇。双方还就中日合作勘探和开采渤海石油达成协议，并同意合作开发煤炭等资源（此前，在1979年5月，日本决定向中国提供第一批能源贷款4,200亿日元）。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的10年间，两国双边贸易额翻了两番，从1978年的48亿多美元，增加到1988年的近189亿美元。

邓小平访日和中日条约的生效，还极大地促进了两国在科技、文化和教育方面的交流与合作。1979年12月，两国签订了文化交流协定；1980年5月又签订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1985年7月签订了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等。在科技交流与合作方面，两国政府间合作的渠道从无到有，到1985已有四个渠道，即：根据中日科技合作协定进行的政府间科技合作、通过日本国发展中国家进行科技合作的执行机构——国际协力事业团（JICA）渠道的技术合作、两国政府对口部门间的合作、核能合作。在文化交流方面，从1981年起，两国政府间每两年召开一次文化交流协商会议，就发展两国的文化、教育、学术、体育等方面的交流交换意见，促进了两国的文化交流。在教育交流方面，从1979年开始，两国政府互派留学生。开始时人数只有几十人，以后逐年增多，形式也由政府出资公派发展到政府出资公派、单位出资公派和自费留学并举。到1991年底，在日中国留学生共达28,000人。

#### 5. 使中日友好关系由“吊桥”变成了“铁桥”

邓小平访日和中日条约生效在日本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应。日本各大报纸头版头条、电视节目从早到晚都作了大量报道和评论。访问活动成了日本舆论的中心。日本舆论一致欢迎邓小平访日和中日缔约，认为这是中日关系的一个“里程碑”，中日友好有了巨大支柱。

福田在与邓小平的会谈中，对过去的侵华战争表示“遗憾”和“反省”，认为不能再重演，两国要建立长久的、名副其实的睦邻友好关系。邓小平说：“中日两国人民要友好，要团结，中日两国要和睦，要合作，这是10亿中日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历史发展的潮流。”他希望两国“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为迎接中日关系更加辉煌灿烂的前景，为亚洲和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两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高度评价中日缔约的重大意义，表示要信守和履行条约的各项规定，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邓小平还会见了日本十个友好团体的人士，以及田中、大平和日本朝野各大政党的领导人，广泛接触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界代表人物。他

---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97页。

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80页。

《中日友好关系的新阶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0页。

对那些为中日友好披荆斩棘、开路架桥，为中日恢复邦交、早日缔约进行了不懈努力的各界人士的贡献作了高度评价，表示“饮水不忘掘井人”，并希望共同努力，使“中日友好之树苗茁壮成长、根深叶茂，万古长青。”

邓小平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各项庆祝、欢迎活动参加者争先恐后，济济一堂，盛况空前。中日友好气氛遍及整个日本列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热”，掀起了中日友好的新的高潮。福田将 1972 年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比作两国间搭起了“吊桥”，而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比作架起了“铁桥”，并相信“多么重的重担也能从这座桥上通过”。

为了对作为国家象征的日本天皇表示礼节上的尊重，邓小平在访日期间拜会了日本天皇裕仁。裕仁天皇首先对邓小平“在百忙中特意抽空来日本互换日中条约的批准书，感到特别高兴”，并表示“在两国悠久的历史中，也有不幸的事情”，希望“今后加深两国的亲善，长期维持和平。”邓小平表示，“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今后我们要以向前看的态度建立两国和平的关系。”裕仁天皇的谈话脱离了事先由外务省和宫内厅拟定的提纲，这还是第一次，过去天皇会见外宾时只是照稿宣读。宫内厅的人士分析，“大概在陛下的头脑里早就存在这个问题（日中战争），否则不会突然说出未经商量的话”。日本共同社认为，“陛下在首次会见中国最高领导人时，使用‘不幸的事情’这一措词，是从天皇的战争责任这个角度，间接向中国人民表示谢罪之意。”此外，邓小平会见天皇，对日本右翼势力是一个打击，因为天皇与邓小平紧紧握手，表示要同中国友好，使右翼势力的精神支柱崩溃了。

#### 6. 打击了日本国内的“台湾帮”和台湾当局

1978 年 2 月中日签订为期八年的贸易协定后，台湾当局担心日本可能与中国缔约，一再要日本政府“慎重考虑”，并接连派出何应钦、辜振甫、蔡维屏等到日本活动，着重拉拢日本的“台湾帮”，力图阻挠日中缔约。条约签字生效后，台“外交部长”沈昌焕发表声明，指责日本严重伤害了日台之间的“友谊”。台“亚东关系协会”驻日代表马树礼，自 1972 年后运用多种途径，力促日本政府“谨慎从事”，但终未能使日本“觉醒”，中日条约终于签署。为此，马树礼“极感痛心”地“电请当局准予引咎辞职”。台湾当局主办的香港《万人日报》认为，应该从福田政府的转变吸取对日关系教训，决不能寄希望于日本政府的“亲华派”（指“台湾帮”），必须消除“国府”内部若干亲日派官员及台湾内部某些亲日财团的影响力，以便在对日的政治态度、经济政策、外交措施等问题上，作出全面检讨与重大修正。这说明，中日条约的签订和生效对日本的“亲台帮”和台湾当局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邓小平在访日期间，对中日条约的意义和影响作出了概括。他说，在动

---

《中日友好关系的新阶段》，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8、19 页。

吴学文《日本外交轨迹》，时事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30 页。

当时任台“工商联合会”理事长。

当时任台“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荡的国际局势中，中国需要同日本友好，日本也需要同中国友好；中日和平条约的缔结从政治上进一步肯定了两国的友好关系，是 1972 年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继续和发展。它为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更加稳固的基础，为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交流，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也对维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产生积极的影响。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邓小平的概括是科学的，正确的。

（作者王新堂：中央党校在读博士生）

# 试论邓小平用和平方式解决边界领土争端的战略思想与实践

崔新界

作为伟大的战略家和具有巨大理论勇气的思想家，邓小平追踪观察分析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根据对时代主题的科学把握，创造性地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边界领土争端的崭新思想。这一战略思想的提出及其成功实践，对于指导我们做好周边外交工作，争取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和平外部条件，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 一 对时代主题的科学把握

对时代主题的正确认识，是邓小平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边界领土争端思想的战略依据。在建国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我们一直把“战争与革命”当作对时代主题的不容置疑的概括。许多内政外交的决策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然而，战后几十年间，国际形势从总的趋势上看，是由紧张愈来愈走向相对稳定与和平，特别是从80年代初开始，国际战略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从激烈的对抗转为全面的竞争和对话，整个国际局势开始趋向缓和，国际竞争的重点转向经济和科技领域，各国更加重视综合国力的提高。面对这种趋势，邓小平通过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分析，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重要论断，从而为我们认识时代，把握世界局势，科学地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

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在认识上是逐步明确的。1984年5月，他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说：“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同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进一步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1985年3月，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又精辟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在此基础上，到了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就明确指出：“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这一论断，既是

---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105、281页。

对当今国际形势的高度概括，是对时代特征的全新认识，又真实地反映出当代世界形势的客观实际和主流，体现了邓小平高瞻远瞩的胸襟和非凡的政治智慧。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世界上和平和制约战争的力量在增长，世界各国都不希望世界发生争端，都希望现有的争端能够得到合理妥善的解决，不仅如此，现代战争的巨大破坏和毁灭性的力量，使战争日益与争端各方的根本利益相违背。就解决争端本身而言，用战争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争端各方的分歧，相反还会进一步增加相互间的仇恨和隔阂，从而埋下新冲突和战争的种子。正是由于时代特征发生了重大变化，用和平方式解决边界领土争端便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需求，而国际形势的发展又为和平解决边界领土争端提供了现实可能性。邓小平紧紧把握住了“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以对历史、对中国和世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提出了具有独特内涵的用和平方式解决边界领土争端的崭新思路和具体办法。

## 二顺应时代潮流，率先提出解决 边界领土争端的新办法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思想，始终贯穿予邓小平新时期的外交战略理论。邓小平关于用和平方式解决边界领土争端的全新思路，正是运用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突出表现，是对世界和平事业的重大贡献。他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按照邓小平在不同场合的多次论述，这个新办法的具体内涵包括：

### 1.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对于历史上存在的主权国家间的领土争端和边界纠纷，邓小平认为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由于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年代久远，在当时还未以公认的国际法形式加以确认，因此各持己见。现在因开发价值重要，各方又重新争论主权归属问题，这便很容易激化矛盾，造成地区形势紧张，从根本上讲也不利于争端各方的切身利益。所以，邓小平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

在中日钓鱼岛问题和南沙群岛等问题上，邓小平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所谓搁置争议，就是把有争议的主权问题暂时放一放，避免争端双方激化矛盾。所谓共同开发，就是指从经济利益入手，用经济利益的纽带把争议中的各方连结起来，合资经营，共同得利，为合理解决争端创造和谐有利的气氛，最终达到消除争端。

---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87、68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

邓小平这里所说的“先不谈主权”，绝非“不谈主权”，而是一个如何选择“谈主权”的时机问题。在时机和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谈主权，不仅不利于解决争端，而且往往会把事情弄僵，相反，耐心等待历史的转机，在时机和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再来谈论主权，问题常常会得到较好的解决。邓小平这一化争议和潜在冲突为合作的战略思想，符合争端各方的战略利益，有助于争端的妥善解决。

## 2. 按照“一国两制”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面临着香港、澳门、台湾的主权与领土完整问题。邓小平提出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好的反响。不仅如此，邓小平认为，有些国际争端可以参照中国解决大陆与港、澳、台实现中国统一的“一国两制”的方法，去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他说：“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也考虑到解决国际争端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因为世界上这里那里有很多疙瘩，很难解开。我认为有些国际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是可能的。”实际上，“一国两制”也是一种和平共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最新发展。对于国际上的边界领土争端，争议各方要互相尊重，先着眼于保持局势稳定，避免武力冲突，然后坐下来谈判，在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办法。这样做，不仅可以向各自的人民交待，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而且也不伤害哪一方。因此，邓小平强调，解决领土争端要通过平等对话来解决，对话比对抗好。

## 3. 相互让步，合情合理解决边界领土争端

历史上形成的一些地区和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有的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政策造成的，有的是冷战政策的产物。针对这一实际情况，邓小平指出，解决的办法，一是双方相互让步，“‘一揽子解决’，你们让一点，我们让一点，就解决了嘛。”由于这类争端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牵涉民族感情，所以又必须能向各自的人民交待，说服自己的人民。二是一时解决不了的争端，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进行合作，发展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三是在和平解决边界领土争端之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四是尊重历史和现实，和平协商，不用吵架的方法；不用武力的方法。

按照邓小平的上述思想，中国同印度等国家就和平解决边界领土争端达成了原则协议或共识，缓和了边境紧张气氛。通过争端各方和平协商达成协议，订立边界条约，寻求合理的解决，是和平解决边界领土争端比较合理和有效的办法。

## 4. 联合国在和平解决边界领土争端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8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早在 1982 年，邓小平曾对来访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说，二战以来，大战没有，小战不断，其根源就是超级大国在挑拨、插手，在相互争夺霸权。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第三世界力量，爱好和平的力量在联合国中有了越来越多的发言权，联合国应该而且可以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中比过去发挥更大的作用。事实上，联合国在有些地方进行的维持和平行动，在世界冲突各地广泛开展的调停、调解与和平斡旋，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世界局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联合国目前仍未彻底摆脱大国的控制，联合国的一些决议未能体现真正的公平、合理，这样就不利于冲突和争端的和平解决。从全人类、全世界的角度看，联合国是非常重要的，联合国在和平解决各类争端上应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 三邓小平用和平方式解决边界 领土争端的战略思想在实践 中的成功运用，显示了这一 理论的科学性和生命力，为 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范例

邓小平用和平方式解决边界领土争端的战略思想，是从中国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他说：“‘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共同开发’的设想，最早也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这一思想在处理中国同印度、日本、越南和俄罗斯等国的边界领土争端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1. 关于中印边界问题。邓小平多次表示，这个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国人民绝不会承认“麦克马洪线”。同时，他又指出，只要双方采取合情合理的方式，边界问题是不难解决的。由此，中国提出了“平等相待、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全面解决”的五点指导原则，并明确提出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双方应保持实际控制线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根据上述指导原则，中国方面同印度方面从 1981 年到 1987 年间，共举行了 8 轮副外长级会谈。1988 年后，两国总理达成了“互谅互让、互相调整”解决边界问题的内部谅解，并成立了中印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最终解决办法，讨论制定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的措施。1993 年印度总理拉奥访问中国时，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协定。1995 年两国又解决了边境局部地区军队过于接近的问题，撤除了双方距离最近的 4 个哨所。在建立信任措施方面双方取得了一些进展，上述措施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有利于中印边境地区局势的稳定。

2. 关于中日钓鱼岛问题。在这一问题上，邓小平在多次重申中国拥有对钓鱼岛主权的同时，创造性地提出了将这一问题放一下，搁置起来留给后人解决的著名思想。他说：“这个问题可以挂起来，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能解决，下一代会比我们聪明些，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1978 年，邓小平在访问日本时，正式提出并在不同场合反复阐述了这一思想。

---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87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93 页。

遵循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中国政府清醒地对待中日两国间存在的领土争端，使两国在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基本上维持了现状，保持了相对平静，确保了两国关系未受领土争端影响而顺利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3. 关于南沙群岛问题。南沙争端比较复杂，涉及中国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之间的关系。1984年10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南沙群岛，历来世界地图是划到中国的，属中国，现在除台湾占了一个岛以外，菲律宾占了几个岛，越南占了几个岛，马来西亚占了几个岛。将来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按照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一方面，中国政府一再强调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坚决采取了维护主权的措施，对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反对把南沙问题国际化，坚持由直接有关国家谈判解决问题；另一方面，积极推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具体设想以及先在争议地区进行渔业合作的建议的实施。中国与越南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在领土问题上采取冷静和建设性的态度，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等。中国还与东盟有关国家多次就南沙问题进行坦诚和建设性的磋商，增进了相互了解与信任。1995年8月，中国与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就维护南沙地区和平与稳定达成几点协议。10月，在与马来西亚磋商中，中马双方进一步扩大了共识，马方表示坚持双边谈判解决争议。中国的主张和做法不仅有利于南沙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和理解。

4. 关于中俄哈吉塔五国边界问题。中国与原苏联有着长达7000多公里的边界线。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同苏联签订了新的边界条约。后来中苏进行边界谈判，中国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150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和现实的情况，中国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从50年代后期起，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开始恶化。当时的苏联领导集团从大国沙文主义出发，表现出严重的霸权主义，妄图控制中国。60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人数也不断增加，包括派到蒙古的军队，总数达到了100万人，局部地区还爆发了武装冲突，中苏边界局势异常紧张。70年代，为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霸权，中国提出了“一条线”的战略设想，并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期，它在当时对缓和中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所面临的极度紧张形势，起了重要作用。80年代，世界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变化了的情况下继续实行“一条线”战略，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对中国不利。基于此，中国适时调整了对苏政策，到1989年5月，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根据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和“多做实事，少说空话”的精神，中苏重开边境谈判。

苏联解体后，由中国为一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组成的联合代表团为另一方继续谈判，经过漫长的谈判，1995年11月，中、俄、哈、吉、塔五国草签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

协定。1996年4月26日，上述五国元首在上海正式签署了这一协定。它的基本内容包括：双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双方不进行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限制军事演习的规模、范围和次数；通报边境100公里纵深地区的重大军事活动情况；相互邀请观察实兵演习；预防危险军事活动；加强双方边境地区军事力量和边防部队之间的友好交往等，中俄哈吉塔五国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是亚大地区第一份多国双边政治军事文件。这一文件说明五国人民希望与自己邻国相互信任、友好相处，它对保持和进一步加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必将产生深远、积极的影响，也将会为五国双边和多边关系的持续和卓有成效的发展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这一协定的签署还说明，和平谈判具有强大生命力。

#### 四深入研究和认真领会邓小平用和平方式解决边界领土争端 的战略思想与实践，意义十分重大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几年时间里，中国的周边环境从总体上看，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段时期。从消除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到全面改善中国与所有周边国家的关系，从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以日本为突破口打破西方制裁，到大举拓展与周边国家经贸关系，中国周边外交取得了显著成效，安全环境大为改善。这与邓小平和平解决争端的战略思想是密不可分的。众所周知，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与不少周边国家间存在着边界和领土争端，并为此还爆发过武装冲突。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从国家利益出发，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系列处理边界领土争端的方针，既维护主权，又兼顾周边环境稳定，显示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与辩证统一。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邓小平用和平方式解决边界领土争端的战略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邓小平反复强调指出，要搞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是因为，“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和平是建设的前提。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提出要进行经济建设，但是始终未能真正将工作重心扭转 to 经济建设上来。除了在指导思想上有重大失误以外，严峻复杂的国际局势，特别是紧张的周边环境，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外因。历史经验表明，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就不可能安心地进行国内的经济建设。由此可见，邓小平在新时期确立用和平方式解决边界领土争端的方针，是以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谋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出发点的。

另一方面，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环境里才有可能。邓小平经常说，在世界舞台上，中国是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又是小国，是经济落后的穷国，是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和摆脱贫穷落后。为此，邓小平设计了“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宏伟蓝图。

但是，一打起仗来，这个宏伟蓝图就吹了，只好拖延。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是一个阶段，再加上 30 年至 50 年，这就是说，我们要实现这一宏伟蓝图，至少希望有 50 年到 70 年的和平时间。中国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不是在讲空话，是基于自己的需要，当然也符合世界人民的需要。所以，中国包括用和平方式解决边界领土争端在内的对外战略，都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个需要的。

当前国际上虽然冷战结束了，但世界并不太平。和平与安全依然是摆在各国人民面前的重要问题。我们仍然要坚定不移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崔新界：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

**新概念：“经济转型国家”**  
**引发的新思考**  
——试以俄共“崛起”为例谈决定社会  
“经济转型”成败的非经济因素

姜长斌

1996年4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中，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并列的，使用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即“经济转型国家”。

何谓“经济转型国家”？我个人理解，它至少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它既包括某些发达国家（例如俄罗斯），也包括某些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第二，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中，这些国家的经济构架和形态已不适应时代潮流，这类国家共同面临的都是“转型”问题；第三，旧经济构架的形成，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它必然要涉及促使旧构架成型的非经济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历史原因，即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等社会存在和价值观问题。它们的转型成败，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经济转型的顺利与否。

当然，各国有各国的国情，转型的具体内容也会千差万别，不过，只“转变”经济，不转变其他，成功的经济转型最终只能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

本文力求以邓小平的理论思想为指导，用颇具代表性的现俄共这个“非经济”因素实例，对上述观点作一探讨。

### 一问题的提出

1996年俄罗斯总统竞选中，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久加诺夫的崛起，是俄国政局变化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人们对此议论纷纷。当然，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俄共究竟是依靠什么力量赢得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拥护的？换句话说，俄共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党：是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型共产党？还是一个改头换面的坚持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政党？还有，也许是一个二者兼有的混合型政党？这个党能否担负起领导俄罗斯“经济转型”的任务？

列宁反复强调过：不能一般地谈论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有原则区别的，有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也有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从原则上说，马克思主义与大民族沙文主义完全不能相容，因为大民族沙文主义具有历史反动性；马克思主义只能与被压迫民族的求独立、求解放的民族主义相融合，因为后者具有历史进步性。这也是列宁晚年同斯大林产生尖锐分歧的关键问题之一。不可能设想，一个政党对内诚心追求社会主义公正，对外却热衷于追求大民族沙文主义目标，这两者是无论如何都统一不起来的，原苏共垮台的教训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俄共也不例外。

因此，在分析、讨论俄共的性质时，就只剩下两种可能了。它要么是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新型共产党，要么是（或者主要是）坚持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

《人民日报》1996年4月26日。

参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52、353页。

的民族主义政党。它如果是前者，那么它就能够领导俄罗斯完成经济转型任务，使俄罗斯成为现代意义的发达国家，它如果是后者，那么它不仅不能引导俄罗斯前进，反而会使俄罗斯联邦逆潮流而动，发生更大的倒退。

我个人认为，研究俄共的性质，不能单凭某一个文件（例如党纲）、一篇讲话或者一纸竞选纲领，就匆忙地下结论；必须不仅综合地研究书面及口头的声明，而且还应该把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社会状况考虑在内。

## 二虚线——精巧的马列主义词句

研究俄共的各种文件，会发现一种非常奇特的矛盾现象。在它的指导思想里，相互交叉地贯穿着两条线：一条是由连续不断的“精巧迷人”的马列主义词句组成的，另一条则是露骨的，甚至是毫不掩饰的粗暴的大民族沙文主义。

在运用马列主义词句方面，最典型的文件莫过于俄共《党章》和《党纲》了。1992年2月13~14日，俄共二大通过的《党章》指出，俄共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建立社会公正、集体主义、自由平等的社会，建立真正的苏维埃人民政权，它是俄联邦公民为了实现纲领性目标在自愿基础上联合起来的政治组织。1995年1月俄共三大通过的《党纲》宣布：俄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俄国共产党（布）——苏联共产党（布）——苏联共产党——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的继承者；其主要目标是：人民政权、社会公正、消灭人剥削人、爱国主义和族际主义的统一；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未来；俄共遵循的是“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资产阶级的社会存在方式已经难以为继”，“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一种群众运动和社会制度将会获得新的生命”，《纲领》还宣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未来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前提逐步形成并得到发展，在共产主义联合体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纲领》还提到了“国际主义”和“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保证党的纪律”等词句。

我们有些人可能就是根据上述的只言片语得出结论说，俄共基本上是坚持马列主义的新型共产党，或者至少是具有社会民主党色彩的共产党。

然而，事实究竟如何呢？

## 三实线——不加掩饰的露骨的大民族沙文主义

俄共成立于1990年6月，此前没有人认为有单独成立俄共的必要，因为有了苏共中央就完全可以代表俄罗斯的民族利益了。但是1988年6月末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以后，由于苏共政治路线的彻底改变，以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为代表的各民族共和国脱离苏联或向苏共中央要求独立自主权的潮流，迅速地呈现出不可阻挡的势头。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出现了甚嚣尘上的社会舆论：抱怨俄罗斯生活水平落后的根源，是民族共和国拖了俄罗斯民族的后腿。在频繁改组的苏共中央（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不论是人员组成还是发言权

都越来越有利于民族共和国。正是在这种政治形势和社会背景下，才成立俄共的，就是说它的成立不是为了捍卫社会主义，而是为了捍卫俄罗斯民族的传统利益。

苏联解体以后，作为政府反对派的俄共虽然历经坎坷，但它始终一贯坚持的是“民族爱国主义”、“废除别洛韦日协定”、“恢复苏联强国地位”、改善人民生活等口号，以此争取民心。如果认真地对上述《党章》，特别是《党纲》加以分析的话，那么就会发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词句不过是美化民族沙文主义的外衣罢了。在形势需要时，类似的词句也完全可以丢掉。例如，久加诺夫在1993年12月12日宪法公决及议会大选前夕发表的竞选纲领《俄罗斯复兴 和国际形势》，通篇都是在“高举爱国主义大旗”的口号下，谈如何继承并恢复旧俄国和苏联大国“所有宝贵而积极”的传统，谈如何保卫境内外“全体俄罗斯人的利益”的。再如，他1996年3月21日发表的总统竞选纲领，标题就是《俄罗斯，祖国，人民》，甚至不敢重提《党纲》中已经载明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而只是含糊地提出“对土地、地下矿藏、森林、水域、大陆架的全民所有权和国家所有权；对自然资源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商品的对外贸易实行国家垄断”。这实际是用“国家主权”偷换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概念。只要国家利益需要，“国家所有权”等等概念和措施，是一般资本主义国家也能做到的。列宁就曾说过，“土地国有化”是资产阶级也可以采取的措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正式通过的《党纲》里那些马列主义词句作出最深刻“反驳”的，还是久加诺夫自己在同一次俄共三大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的利益》。这篇报告同《党纲》形成了黑白分明的对比：又黑又粗的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主线完全压倒了马列主义虚线。

首先，报告人痛心疾首他说，由于苏联的解体，“（俄罗斯）国家的疆界逆转了400年，回到了16世纪；它丧失了许多世纪发展的成果；失掉了诸多通向世界贸易之路的出口；同世界经济的生命攸关的联系被切断了”。考据一下历史事实就会知道，报告人是按照自己的独特“逻辑”说这番话的。众所周知，早在15世纪，莫斯科大公国仅有43万平方公里领土。仅仅过了一百年即16世纪，俄国疆域就扩大了十几倍，顶峰是伊凡雷帝在位期间，但那时它的领土面积也只是达到了550万平方公里，而今天的俄罗斯联邦却还拥有1700万平方公里。但是，从民族扩张主义的角度看，任何“逆向”运动都是不可忍受的。更重要的是，伊凡四世不仅是第一个用暴力消灭俄罗斯民族割据状态的沙皇，而且是第一个在此基础上开始疯狂向外扩张、大举征服“异族人”（喀山、阿斯特拉罕国，等等）的俄国沙皇。俄罗斯大民族沙文主义和扩张传统正是由他奠定的。此后的400年里，俄罗斯扩张到了20世纪的拥有22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世界第一大国，并且尝试过称霸全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反复谴责过大俄罗斯狂暴的扩张政策，说俄国历届统治者都“不择手段”、“丧心病狂”地执行野蛮的侵略方针。一句话，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以在位期间扩张了多少领土来衡量自己的政绩的。而自称马列主义者的久加诺夫，却为俄罗斯失去某些扩张势头而难以忍受。他沮

---

注意：不是俄共复兴！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310、311页、第9卷第341、342页。

载于《苏俄报》1995年，月24日第1~3版。

丧他说：“因为失掉了自然边界和通向温暖海洋的出口，（俄罗斯）也就正在丧失国家自给力，它的一些区域，首先是那些原料产地，迟早会被纳入别国的经济体系并被分裂出去。”可见，他这里讲的不是具体的领土面积，而是遭受挫折的扩张传统。正因为久加诺夫等人如此坚决地维护俄罗斯的民族扩张传统和成果，所以他们对当今国际形势保有自己奇特的、完全脱离现实的看法，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他在报告里说：“遭到破坏的不仅是苏联的国家统一，世界舞台的势力均衡也被破坏了，而这种势力均衡是40多年来维持世界和平的基础。取代国际关系两极格局的，不是什么多极格局；所谓多极格局不过是那些幼稚的政治空想家们喋喋不休的梦话罢了（看来，特别有必要提请大家注意这句话！——本文作者）；现在只有一极格局，即美国一国称霸全球。”他甚至认为，苏联争霸世界的做法，是对人类作出的贡献。他说：“今天，全世界，特别是脑满肠肥的西方，都在享用俄国革命和胜利的成果。”接着，他把苏联的落后与垮台，主要归因于外部世界对苏联施加的压力。

俄共《党纲》里写道：“苏联是俄罗斯帝国的地缘政治的继承者。它作为国家和社会制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必然提出一个问题：如何恢复这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久加诺夫在政治报告里回答说：“首先要捍卫住俄罗斯和统一的俄罗斯人民的国家完整；接着是必须自愿地重建统一的苏联国家。”他把这一任务列为俄共“总目标”的第一条。党纲明确地提出，要在此基础上“巩固（苏联）的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恢复它在世界上的传统利益和阵地”，“不让世界新秩序的创造者实现攫取俄罗斯的自然资源和生产基地的企图”。为此，必须“废除有损俄罗斯利益和尊严的国际条约和协定”。这一切都是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的。

#### 四不可思议的“俄罗斯思想” 和“社会主义”

应该说，由于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作怪，俄共的社会主义理论也是混乱的、不可理解的。

首先，社会主义作为一门科学理论，不可能由各民族的传统思想自发地形成，这是其一。其二，从人类的发展远景来说，社会主义更不可能只适用于某些民族，而不适用于另一些民族，只不过是各个民族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可能不同罢了。

可是在俄共《党纲》里却写道：“可以大胆地断言，‘俄罗斯思想’其实就是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久加诺夫在政治报告里是这样展开这一观点的：“‘俄罗斯思想，其实就是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而它对西方来说，是神秘莫测的，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他提出，俄罗斯人民的前途要么是“强国和社会主义”，要么是“国家继续分崩离析并最终变成殖民地”。

实际上，像俄共这样把社会主义和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生硬地捆在一起，不仅西方人会感到神秘莫测、不可思议，就连正在搞社会主义的中国人也会目瞪口呆的。

退一步说，从政治报告阐述的俄罗斯历史事实来看，俄共所说的“俄罗斯思想其实就是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同样是不通的，是违反史实的。他一方面强调说从拉辛和普加乔夫起义开始，经过十二月党人，到了赫尔岑、

车尔尼舍夫斯基等就形成了“俄罗斯思想”。但这充其量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我们还知道，民主主义思想在俄国从来没有成为强大的思潮。另一方面，久加诺夫把俄国的村社说成是“俄罗斯思想”的社会基础，他说：“俄国不久前是个农民国度。农村劳动者在历史上就是左派政党和运动的强大基础。这是因为实际上不曾存在过农民土地私有制，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的是村社土地使用制。”俄国村社本是资本主义前的一种封建统治下的农民土地使用制，是一种历史落后现象。列宁对此已有大量论述。对俄国村社能否越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马克思也是持怀疑态度的。从历史事实上看，作为社会基础的村社只是产生过俄国民粹主义，但却不是社会主义。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时期，在俄国农村占统治势力的是俄国社会革命党，而不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

可见，俄共的“俄罗斯思想”即是“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无论如何是解释不通的。

### 五俄共势力为什么会崛起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不论怎么说，苏共是列宁创建的一个存在了近整个世纪的党，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深入人心的。不论对哪个民族的劳动者来说，社会主义理想都是有强大号召力的。从这一角度看，作为左翼力量的俄共的崛起，与东欧的形势是有相通之处的。

第二，但是俄共又与东欧左翼力量有巨大的区别，那就是俄共坚持的是进攻性的大民族沙文主义，而东欧左翼政党坚持的是防御性的民族主义。

第三，也正是因为这一缘故，俄国社会的转型必然异常困难和漫长。四五百年形成的俄罗斯民族发展价值观不可能不是根深蒂固的，价值观的转型必然始终伴随着整个社会的转型。可以说，在俄国社会整个转型期内，只要人民生活水平不得到普遍的提高，原有的价值观是会一直起作用的。

第四，因此在俄罗斯，不论哪个政党，只要坚持大民族沙文主义就会有“市场”，例如，日里诺夫斯基自由民主党的崛起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更何况是冠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俄共呢？！

第五，俄罗斯改革的困难和失误，导致一大部分居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他们对苏联的怀旧，也是俄共声望上升的社会基础。只要改革不出现蒸蒸日上的情景，只要已经出现的困难仍保持现有的社会规模，那么不论是俄共，还是自由民主党都会是政坛上持续活跃的力量。

第六，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俄共确实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不要只拘泥于俄共领导人在1996年的总统竞选中是否能够上台，而要看到俄共代表的社会势力是会长期存在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俄共真正新生的前提，是彻底抛弃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转而专心致志地从事国内经济的恢复，推进国内的社会改革。

因此，我们在分析俄罗斯的问题时，必须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上，不仅研究现实，而且要研究历史；一句话，要具有较为开阔的视野和比较深远的政治眼光。

总之，现在这个俄共所代表的沙文主义势力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它会在国家整个转型期内起阻挠作用。这期间，现俄共可能掌权，也可能不掌权，但最终它必将消失。

俄罗斯等待着一个全新的、彻底摆脱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共产党——它一定会出现，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前景决定的。

（作者姜长斌：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国际政治学博士生导师）

## 以发展经济贸易构筑 中美关系的新支点

宫力

中美建交之后，邓小平把发展中美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放在战略的高度加以认识，不仅为国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而且为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构筑了一个新的支点。他在打开中美经贸关系新局面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远见卓识，以及善于把握历史机遇的娴熟本领，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经济贸易关系起源于 1972 年。当时毛泽东和美国总统尼克松刚刚在北京举行了历史性的会面，中美关系有所缓和，逐步发展两国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开始提上两国政府的议事日程，中美上海公报曾明确指出：“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他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在此之后，中美经贸关系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总的来说，由于中美关系尚未全面正常化，发展中美贸易还存在许多障碍，再加上中国国内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对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重要性还缺乏认识，因此中美之间的贸易额一直增长不快，直至 1978 年年底，中美双边贸易总额还不足 10 亿美元，这与两个大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相比是极不相称的。

1978 年 12 月，在邓小平和美国总统卡特的亲自拍板下，中美两国政府排除障碍同时公布了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美两国在这一时刻宣布建交，固然有对付当时苏联威胁的因素在起作用，但除此之外，经济战略方面的考虑也是不应忽视的。从中国方面来说，打倒“四人帮”之后，国内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对外开放，需要扩大对外经济贸易，需要学习和借鉴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并从美国那里取得发展经济所缺少的资金和技术，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与中美建交、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几乎是同步，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1979 年 1 月 31 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对美国广播电视界谈到他访问美国的三个使命时曾经指出其中有一项就是要“了解美国人民，了解你们的生活，了解你们建设的经验，学习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邓小平还说：“我们期望发展我们之间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技术文化以及其他领域的关系能有广阔的前景。”

这番话说明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同中美经济贸易关系发展之间确实有一种有机的联系。从美国方面来说，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也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在中国为实现现代化而积极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

---

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7 页。

《世界知识》杂志，1979 年第 5 期。

和设备的情况下，美国也有意通过两国关系正常化来推动中国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这样中美建交伊始，双方开始为克服发展双边贸易中存在的障碍，尤其是为早日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进行了艰辛的努力。

1979年1月2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在谈到中美发展经济贸易关系时，邓小平指出：中美贸易有广阔的前景，美国科技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竞争力比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强一些，但还有一些障碍，既然两国关系正常化了，这些障碍就应排除，比如最惠国待遇问题如能解决，障碍就减少了。

随后，邓小平于1979年1月29日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为期一周的正式国事访问，邓小平访美的目的除了同卡特总统就紧迫的国际局势交换意见之外，就是要全面推进中美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为中国刚刚兴起的改革开放事业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1月30日邓小平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等团体举行的招待会上指出，中美建交“为促进中美人民的了解和接近，为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开辟了新的广阔的前景。今天中国正在加快现代化建设。我们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对于双方都有好处。”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在访问期间，邓小平副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卡特总统代表美国政府签署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方毅副总理、普雷斯总统科学顾问签署了两国在教育、农业、空间方面的合作的谅解的换文；方毅副总理、施莱辛格能源部长签署了两国在高能物理方面的合作协议；黄华外长、万斯国务卿签署了关于建立领事关系互派和互设总领事馆的协议。中美双方还同意为互派常驻新闻记者提供方便，并同意签订贸易、航空、海运协定，双方将就此进行商谈。这些协定的签订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有利于美国加强同中国的交流，它们是中美之间30年来签订的第一批政府对政府的协定，标志着中美之间的合作展开了一个新的时代。

在邓小平访美期间，中美双方还就解决两国被对方冻结征用的资产问题，签订长期贸易协定、航空协定和海运协定等问题交换了意见。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最惠国待遇问题，他说，你们不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我们偿还能力就受限制，最惠国待遇不只是中国的需要，也是美国的需要，而美国的需要并不比中国小。这番话点明了最惠国待遇问题是发展中美贸易亟待需要解决的要害问题。

1979年2月24日至3月4日，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访华。中美双方从3月初开始进行贸易谈判，但进展缓慢。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在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有分歧。国务卿万斯等人主张对中国和苏联应“一视同仁”，谨慎从事，两头都要照顾，都应该给予最惠国待遇。万斯等人的这种想法显然是怕得罪苏联，但布热津斯基认为，由于苏联当时在动乱的伊朗煽动反美并支持越南在东南亚扩张，因此，参议院必将拒绝给苏联以最惠国待遇，这样一来也将殃及中国，因此应分别解决。1979年4月，为了防止中美关系倒退，布热津斯基一再向卡特总统进言，必须对中国采取广泛的主动，特别应在最惠国待遇方面给予通融。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商务部长克雷普斯于1979年5月6日至15日率团

访华，再一次与中国方面商讨中美经济贸易实质性问题。在开始谈判时，双方存在着不少分歧，但通过共同的努力，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达成了一致意见，并于5月14日草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第一个贸易协定。协定规定，为了使两国贸易关系建立在非歧视性基础上，缔约双方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双方同意，采取一切措施，促进两国贸易持续和长期的发展。在克雷普斯访华期间，中美双方还正式签署了30年前遗留下来的关于解决资产要求的协议和互办贸易展览的协议；两国有关部门签署了大气、海洋和渔业、计量和标准、科技管理和科技情报等四项科技合作议定书；两国有关人员就海运和航空协定进行卓有成效的讨论，为签订这两项协定作了必要的准备；两国的企业管理人员也开始了有益的接触。克雷普斯到达北京时曾说，她这次来访的目的是：发展美中经济关系，扩大两国科技合作和建立两国企业管理专家之间的联系。

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于5月10日会见了克雷普斯部长，并就进一步扩大中美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交换了意见。双方表示要为保持中美经济贸易关系发展的势头作出努力。

## 二

随着中美贸易协定的草签，最终解决最惠国待遇的问题已提上议事日程。几年来，在中美双边贸易关系方面，中国的逆差越来越大，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势必影响两国贸易发展的势头。而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既有利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同时也利于中国从美国的进口。这一问题已引起了中美两国政府的注意。

1979年7月7日，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和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为期三年的中美贸易协定。根据这一协定，中美双方将在关税、手续税费用方面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向对方的商号、公司等贸易组织提供最惠国待遇，相互对等地保护专利、商标和版权，允许建立在本国领土内的对方的金融机构，根据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开展业务，协商解决双边贸易问题等。这是一个重要进展。

然而好事多磨，中美刚刚签订贸易协定，美国国务院的一些人就主张把这个协定推迟到美国同苏联关系走上正轨时再提交国会批准，以免中美苏三角关系失衡。这种把给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与美国对苏关系联系起来的观点在美国政府中引起了争论，美国政府中有不少有识之士指出，在苏联拒绝对苏联的移民入境作出保证之后，推迟向中国提供最惠国待遇简直就是因为苏联顽固而去惩罚中国，这是不公平的。卡特总统经过慎重考虑于7月27日决定，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在参议院一有进展便采取行动给中国最惠国待遇，他还接受蒙代尔副总统的建议，即在各种双边问题上都把中国与苏联明确区分开来。随后，经蒙代尔亲自向万斯国务卿呼吁，万斯应允宣布中国是一个友好国家，并允诺在1979年底以前建议给中国最惠国待遇。蒙代尔在1979年8月访华时，将这一基本决定告诉了中国方面。

此时，中国政府也在关注着这一问题的进展。1979年8月24日，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了正在访华的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时提到了这一问题。事后杰克逊在北京对报界说，中国领导人表示，美国推迟批准中美贸易协定，将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不利影响。

1979年10月22日，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访问美国，同美方进一步商讨中美贸易协定和纺织品输美定额问题。10月23日，美国总统卡特终于将中美贸易协定送交国会，签署了一项公告，指出根据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中国有资格获得最惠国待遇。同一天，美国商务部长克雷普斯在记者招待会上代表卡特总统正式宣布，中美贸易协定已提交美国国会要求批准，她还说：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间贸易关系协定包括双边贸易的条款，其中也有为两国进出口贸易提供不歧视的互惠待遇，即最惠国待遇的规定。第二天，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以74票对8票和294票对88票批准了中美贸易协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厄尔曼称，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中美关系的转折点。

1980年2月1日，中国外交部和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北京互换照会，确认各自已经完成的必要的法律手续，从而使中美贸易协定即日起开始生效。协定规定：为了使两国贸易关系建立在非歧视性基础上，缔约双方对来自或输出至对方的产品应相应给予最惠国待遇。协定有效期为3年。协定规定：缔约任何一方如未在有效期满前至少30天将终止协定的意愿通知对方，则本协定有效期延长3年，此后仍可依此方法延长。

中美贸易协定的签订和正式生效，中美之间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为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在这之后，中美贸易有了迅速的增长，1980年中美贸易总额达到48.1亿美元，相当于中美建交前1978年的4倍多。其中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额为38.3亿美元，输入产品主要以农产品为主，包括谷物、棉花、大豆，此外还有合成纤维、化工产品等；中国向美国的出口额为9.8亿美元，输出产品主要是纺织品，矿物原料等。这种状况是由于当时中美两国的经济需求所决定的。当时中国的农业经过10年“文革”尚未恢复元气，需要进口一些农产品以解燃眉之急；而美国自60年代后期纺织业逐渐萎缩，不得不从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地大量进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纺织品打入美国之后立即成为一个有力的竞争者。

中美两国政府及其官员对于中美贸易的发展也给予了有力的支持。1980年8月31日至9月28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率领中国机器制造业代表团对美国进行了长达四周的考察活动。在此期间，薄一波以副总理身份主持了9月12日在旧金山举行的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开幕式，并以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中方主席的身份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9月16日至18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9月17日，薄一波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卡特总统代表美国政府在白宫玫瑰园正式签署了中美民航协定、海运协定、纺织品协议和领事条约。

这三项协定和一个条约的签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民航协定将使中美两国之间结束30多年来没有例行定期直航班机的历史，海运协定将使美国的港口向中国的商船开放，而美国船只也将能够进入中国的停靠港口，从而进一步增加中美之间的贸易和商业机会；纺织品协议将使中国的纺织品更加有秩序地在美国推销，这不仅有利于中国扩大出口，也有利于美国的零售商和消费者；领事条约阐明了领事官员为两国公民提供服务的职责，将确保在对方国土上的本国公民的权益。以上的这些协定是中美建交以来，中美两国经过非常艰辛的共同努力才得到的，它们将造福于中美两国人民。

### 三

在中美贸易协定签定和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解决之后，邓小平又把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聚焦点转向技术转让问题，这是中美之间的又一个棘手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事关大局的关键性问题。

美国在对华技术转让问题上曾一度实行严格的限制，中美建交之后美方在此问题上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松动(美国商务部于1980年4月把对中国出口从“Y”类调整为“P”类)，但步子迈得不大。为了取得美国的先进技术为国内的现代化建设注入新的动力，邓小平利用多种场合对美国朝野做工作，敦促美方在放宽高技术对华出口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1982年9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指出：“我访问美国时双方签订了科技合作的协定，但是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没有把一样比较像样的先进技术转让给我们。我同黑格谈过，他也感到惊奇。就连联合国帮助我们普查人口的电子计算机也谈了好几年，拖到去年才最后批准。美国过去长期把中国放在‘Y’组，26个字母，是倒数第二个。以后稍微改了一下(改成‘P’组)。”邓小平认为，这种滞后的状况应尽快改变。

在中国领导人的一再要求和敦促下，美国作出了回应。1983年6月21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对华技术转让的新规定，将中国从美国出口管制分类的“P”组改为“V”组，即列入与美国友好的非盟国一组内，公布了七类电子产品向中国出口的绿区。这是一重要的步骤。邓小平抓住有利时机，继续对来访的美国政界人士“吹风”。1983年8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时表示，在技术转让问题上，美方有些松动，我们表示欢迎。但松动到什么程度，也还要看。邓小平还说，在技术转让问题上，重要的是中美能成为什么样的朋友，是普通朋友，还是比较好的朋友。

在此之后，美国方面进一步放宽了高级技术对华出口限制。1984年，美国批准向中国出口许可证项目比1983年的4445项增加一倍。1985年12月，美国又将向中国出口的绿区扩大为27类。由此促进了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其中高级技术的对华销售额比重有了较大的增长，而这对于促进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从1984年起，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高速发展阶段，中国的经济改革日益引起美国的兴趣。中美之间以经济贸易为基础的交流与合作大大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全面展开。1987年1月，美国总统里根指示内阁对出口管制政策作一次审查，要求进一步放宽对华技术转让，并于3月初提出报告。在此背景下，美国对中国产品出口的绿区扩大为31类，在发放的技术水平上，也有放宽。到1988年，中美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大关，美国已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美国在华投资项目已累计达630个，协议金额34亿美元，占外国在华投资的14%。中美之间的科学技术合作和文化、教育、新闻以及军事交流也有了长足的进展。

中美经济贸易的蓬勃发展成为支撑中美关系大厦的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支点。中国方面把吸收美国的资金技术看成是实现现代化的大局，美国则把开拓中国市场看作是振兴美国经济的重要目标。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的互相需求是显而易见的。1989年以后，虽然中美关系磕磕绊绊，但两国间的贸易却以每年20.7%速度增长，1994年，两国的贸易额已高达354.3亿美元。美国在华企业已达1.2万个，成为中国最大的外国投资者。随着近年来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迅速上升，经济优先成为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共识，在

这种情况下，中美经贸关系的持续发展必将对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作者官力：中央党校教授、法学博士）

## 邓小平新时期外交思想论析

迟爱萍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历史发展的契机，依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既继承前人，又勇于创新，对中国的对外方针政策作出一系列新的论述，表现出了开拓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新局面的宽阔政治胸怀和巨大理论勇气。

—

进入 80 年代，国际形势在紧张、动荡中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美苏两极体制受到强大冲击，逐步走向瓦解，东西方关系趋于缓和，世界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从国内来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从而完成了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变化了的外部 and 内部环境，引起邓小平深刻的思考，他在深入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对时代特征、国际局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

（一）对时代特征的新概括。对时代特征的正确认识，是制定正确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战略的依据。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论断，是符合本世纪初世界历史发展实际的。然而，战后几十年间，国际社会愈来愈趋于相对稳定与和平。对此如果仍是囿于列宁几十年前对时代特征的论断，就会大大限制我们的思路和视野。邓小平经过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分析，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从而为我们认识时代特征，把握世界局势，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在概念上是逐步明确的。1984 年 5 月 17 日，邓小平在会见厄瓜多尔乌尔塔多总统时说：“我看世界现在存在着两个最根本的问题，第一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就是南北问题。”同月 25 日，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又重复论述了这一观点，并用“和平”二字简略地概括了第一问题。1985 年 3 月，邓小平会见日本朋友时再次谈到世界两大主题，并以“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的概念代替“南北问题”的概念。1988 年 12 月 21 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明确指出：“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是对当今国际形势总趋势的高度概括，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过 50 年代前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立和 60 至 70 年代美苏争霸与第三世界崛起的局面，80 年代后国际政治开始逐步形成一种多极化的格局。这种新格局的出现，表明在国际政治中的各种基本矛盾更加突出集中在两大关系上，即严重对立的“东西关系”和极不正常的“南北关系”，它是国际间各种矛盾转化和激化的根本原因。邓小平把当今世界的这两对相互对立的关系用“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作了总体的归结。他说：“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

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

邓小平对时代特征的新概括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第一，精辟揭示了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和主要问题。第二，明确了新时期中国的战略任务，即中国主要应做好两件事：一个是经济建设，一个是维护世界和平。

（二）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判断。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是“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关于“要准备打仗”等论断曾长期作为中国工作的指导方针。自70年代末以来，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特别是美苏战略态势和军事力量的发展变化，对战争与和平问题逐步提出了新的见解。

——战争不可避免，但可以延缓。这是1977年10月至1979年邓小平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主要看法。这一时期，邓小平继承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一条线”的世界反霸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仍坚持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但他认为，搞得好，战争可以延缓，并提出延缓战争的三项办法：第一，提高警惕，加强战备；第二，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破坏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的战略部署；第三，西方对苏联不要搞经济上的绥靖政策，以防他强大起来。

——战争不可避免，但如果反对战争有力，争取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这是1980年至1984年9月邓小平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主要看法。1980年10月他先是估计战争五年之内打不起来，1983年3月他又作出了战争十年打不起来的论断。其客观依据主要是苏联在加紧全球战略布局的过程中，遇到了障碍、抵制和困难。

——战争的危險依然存在，但世界上和平力量和制约战争的力量在增长，战争可以避免。这是邓小平1984年10月以后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主要看法。邓小平这一论断是建立在对国际各种政治力量、经济发展因素的分析基础上的。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经济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深，经济上的共同利益也随之而日益扩大。这种趋势和走向，与战争政策是互不相容的，因而它将成为推动世界和平进程的有利因素。

应该指出的是，认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并不等于认为现在已无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邓小平根据70年代和80年代的国际形势以及出现的局部战争的实际，指出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这不仅使我们对可能导致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源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也使我们对由此而引发的不同形式和规模的战争保持应有的警觉。

（三）正确确定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对于中国的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曾有过许多论述。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又反复强调：中国既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弱国、穷国，经济很落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对中国国际地位的判定的基础上，根据国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新的论断。

第一，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

邓小平曾多次明确指出：“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邓小平的论断是有重要客观依据的。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疆土辽阔的世界大国。同时又是第三世界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在亚大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中起着重大的作用。中国还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决定国际社会重大问题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外，中国一直把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

义作为自己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并为消除或遏制有碍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因素作了最大的努力。

第二，中国是促进世界经济巨大潜在力量。

中国不仅人口众多，国土辽阔，经济和战略资源比较丰富，而且还有较强的民族凝聚力、生存能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具有许多国家所不完全具备的优势。特别是近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对外贸易的日益扩大，使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不仅会给亚太地区经济带来繁荣，也会极大地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因此，邓小平十分自信他说：“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

第三，中国在世界战略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

60年代末，由于两大阵营以外各种力量的崛起，世界局势发展逐步出现多极化的趋势，70年代，毛泽东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以分析和说明当时世界政治向多极化体系演变的三种基本政治力量。

那么，中国究竟在多极化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呢？国际舆论曾经认为，在世界趋于多极化的过程中，中国正在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世界的一极，而且是重要的一极。“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一时成为一种较为通行的说法。对此，中国一直持否定态度。毛泽东曾对索马里贵宾表示：我们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现在报纸上经常吹，美国、苏联、中国叫作大三角。我就不承认。他们去搞他们的大三角、大四角好了。我们另外一个三角，叫作亚非拉。进入80年代，由于实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曾使中国在中美苏关系中举足轻重。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有利地位和特殊作用，进而把中国人民的利益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人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并以此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依据和出发点。对中国在国际格局中位置的明确界定，邓小平仍坚持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是发展中国家，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 二

邓小平在重新认识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基础上，总结以往外交实践的经验，对中国外交政策作了一些新的论述。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不同任何大国结盟。中国过去曾先后主张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国际统一战线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扩张的国际统一战线。70年代后期，美国卡特政府对苏推行缓和政策遭到失败，使美苏关系由缓和转入冷淡。同时，卡特调整了对华政策，中美关系趋热，最终达至中美建交。邓小平认为这一时期美苏争霸态势，仍然是毛泽东所指出的苏攻美守，战争的主要危险在苏联，因而仍然坚持毛泽东联美遏苏，建立“一条线”的国际战略思想。在与外宾谈话中，他多次明确表示，中国侧重反对苏霸，要组成范围空前广泛的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对付“北极熊”。

进入80年代，中美苏战略关系有了明显变化。邓小平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第一，美苏关系由缓和变为全面紧张。里根政府对苏采取强硬政策，增加军费开支，不允许苏在第三世界大肆扩张，从而使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发生变化，“美国在某个点上取得攻势”。第二，中美关系出现曲折。里根政

府恢复杜勒斯主义，使中美之间矛盾上升，并突出反映在《与台湾关系法》和售台武器问题上。中美关系出现了重新认识和加强信任的问题。第三，中苏关系由全面紧张变为松动。由于中美关系倒退，勃列日涅夫又作出急于改善中苏关系的姿态，所以，中国以 1982 年 3 月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为契机，倡议举行中苏副外长级磋商，并于 1982 年 10 月在北京举行第一轮会谈。

邓小平的分析深刻揭示了中、美、苏战略关系的变化，这种情况表明“一条线”的联美遏苏的国际战略已不适应国际关系体系中的矛盾变化了。为此，中国适时进行战略调整，明确提出了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二）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80 年代中期开始，以美苏为核心的东西方关系逐渐走向缓和；国际形势从对抗转向对话。为了推动国际缓和趋势的继续发展，邓小平在 1988 年秋提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倡议。这以后，邓小平在与外宾的谈话中，反复强调这一倡议。在谈论这一主张时，他始终强调三个基本点：

第一，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这是邓小平这一国际战略思想中的一个根本原则立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带有普遍性的原则。这不仅适用于社会制度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可用以指导社会制度相同国家间的关系。它充分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多样性，兼及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因此，邓小平多次强调：“现在看来，最经得住考验的不是霸权政治，不是集团政治，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第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关键是不干涉别国内政。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应当从根本上区别于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旧秩序，应当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这一客观要求决定了国际“新关系的最主要的原则是不干涉别国内政、别国的社会制度。”针对近年来少数西方大国干涉别国内政，妄图把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发展道路和模式强加于别国的行径，邓小平严正指出：“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应由各国人民自己选择，任何外国不得干涉。

第三，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是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局的共同要求。邓小平认为，世界的发展决不能长期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世界经济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因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也是发达国家的需要。”当今世界经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政治新秩序很难建立在国际经济旧秩序基础上，而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建立，又将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提供保障。因此，要谋求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两件事要同时做。”

（三）把对外开放的外交方针确定为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是主张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内部和外部、主观和客观的多重因素的制约，这一方针未能得到全面而充分的实现。

在国际国内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提出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面向全世界的。他指出，在对外开放中，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要把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科学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与此同时，还要利用外国智力和资金来加快我国经济建设步伐。

在强调坚持对外开放方针的同时，邓小平认为必须注意三个问题：第一，要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第二，要使对外开放与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相统一。在对外开放中要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第三，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也要有自己的独创，我们既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要“翻版”和“提高”。

### 三

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强权政治相抗衡

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独具特色。邓小平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看作中国在这个世界上保持独立地位的政治保障。他说：“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在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中，中国只能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附庸，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所以，邓小平关于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主张，具有重要的国际战略意义。

另外，资本主义国家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中，仍抱有明显的分化、演变社会主义的企图；在两种制度的国家合作和交流中，暗含着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斗争。邓小平曾多次提醒全党，要警惕西方帝国主义正在打着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并没有放弃瓦解社会主义的企图。要想顶住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逆流，中国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在与西方国家关系好的时候，要注意思想上、政治上不模糊应有的界限；关系紧张的时候，又要注意斗争分寸。只要“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

第二，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

邓小平强调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但在具体处理国家关系问题时，邓小平则主张不应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好坏，更不允许以这种异同来作为干涉别国事务、侵犯别国领土和主权的借口。对内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对外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二者之间并不矛盾。

在国际上，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是符合当今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历史的发展已把维护世界和平，争取社会发展的新课题推到世界人民面前。邓小平顺应这一历史潮流，在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上，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不以意识形态为转移，强调国家利益，寻求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对话和合作，以和平和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的口号，开拓了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邓小平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外交方针，一方面有利于中国的对外开放，有利于发展中国的经济；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国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增强活力，扩大影响。然而，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在国家关系中超越意识形态与在国际阶级斗争中淡化意识形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国家间的正常往来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这是和平共处的具体要求。而后者是故意模糊国际阶级斗争中的阶级差异和意识形态差别，以便实现西方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对此，如前所述，邓小平的态度是十分坚定的，就是中国在

世界范围内要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绝不把社会主义制度强加于人，但是我们自身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是确定不移的。

### 第三，强调自身发展的意义

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的对外战略，是推进世界革命的战略。后来，斯大林进一步明确提出：苏联是世界革命的“强大的公开的基地”和“强大的公开的中心”。各国共产党应组织各国无产者联合被压迫民族建立世界反帝统一战线。斯大林的这些论述是对列宁对外战略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但由于他过于强调苏联利益高于一切，把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作为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的标准，以致走上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道路。

毛泽东继承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支援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的对外政策思想。但同时，他又坚定地认为，革命不能输出，各国革命主要依靠本国人民来完成。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关系上，毛泽东强调二者的“统一”和“结合”，他认为，坚持国际主义，必须首先搞好本国革命。因为一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搞好本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就是对世界革命事业的贡献。

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更为现实主义的态度。在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问题上，他更侧重于爱国主义，并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统一点主要放在中国自身的发展上。他认为中国自身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

首先，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是因为，如果中国发展起来了，那么就意味着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摆脱了贫困；中国由于自身条件的决定，是维护世界和平的稳定力量，中国每发展一步，对制约战争的力量和平的力量都是一个发展。

其次，可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87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明确指出：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要用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是优越的制度。如果中国实现了三步发展战略，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从中国的角度看，真正证实了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对的。”

再次，可以加重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邓小平曾坦率地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在国际上应该起更多的作用，但现在名不符实，因为我们的力量有限。中国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归根到底是要使自己发展。”“中国自己不发达，能够在国际上起的作用就有限。”

邓小平的上述思想顺应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流，进一步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和平本质，发展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思想，是中国新时期外交方针的重要基础。

总之，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既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又有策略的灵活性，是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充实和发展，掀开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

（作者迟爱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

